中外数学家传奇丛书——困苦玉成

主编　杜瑞芝　副主编　刘培杰　著者　陈竹如
李争光

中国数学家

王梓坤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苦玉成:王梓坤 / 陈竹如,李争光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1.10
(中外数学家传奇)
ISBN 7-80639-606-3

Ⅰ.困… Ⅱ.①陈…②李… Ⅲ.王梓坤-传记
Ⅳ.K8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296号

困苦玉成——王梓坤

陈竹如 李争光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170号
邮政编码:150006 电话:0451-6225161
E-mail:hrbcbs@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65千字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40套
ISBN 7-80639-606-3/K·22
(三册定价)48.00元

序　言

这是一套以传记文学形式介绍中外著名数学家生平的丛书，本来是要家兄钱临照写个序言。他对科学史有研究，也热心支持科学家传记的写作，但是他已年逾九十，不便握笔写作。所以，给我谈了些他的想法，勉励我代他写这个序言。

我对数学只有很肤浅的知识。但是我明白，数学这门学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大多数学科里，一代人创造的或树立的东西，往往被下一代人所更新或推倒。只有数学，前人创造的成果都能为后人所用。而每一代人都是在以前的建筑上添砖加瓦。今天，像我们从事技术科学或工程建设的人，有谁能离开前人创造的数学知识呢？不仅如此，前辈数学家的治学精神、思维方法和奋斗经历对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本丛书展现的数学家，有的是开拓者，披荆斩棘，勇敢直前；有的是继承发扬者，博采众长，继往开来。他们或少年早慧，头角峥嵘；或中年发愤，大器晚成；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或天性鲁钝，以勤补拙；或步踏青云，皓首穷研；或屡遭坎坷，英年早逝；或生于名

门望族，独树一帜；或出身贫寒，困苦玉成……总之，从不同侧面给我们以启迪、思考和奋发图强的力量。

丛书的主编杜瑞芝同志是一位年富力强的数学史专业工作者，她有志于从事这种看似简单实则很不容易的数学史传播工作，是值得称道的。各分册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研究的高校教师。他(她)们在研究数学家生平、学术贡献的基础上，注意探索数学家成才的因素，成功的契机。还特别记述了那些超出常人、能够动人心魄的事迹。各分册都配有数学家的肖像、生活照或插图，以展示这些大师的精神风采。

本丛书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与普及性。它对广大青年读者增长知识、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并立志献身科学是大有益处的。

钱令希

1998年春于大连

前　言

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数学家。他们的发明创造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巨大动力，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没有数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今天高度发展的数学。

然而，由于数学的抽象的符号与枯燥的算式，长期以来，使得数学家好像与外界隔离开了。外界的人们，特别是年青的一代，觉得数学家是那样刻板而神秘。而数学家却很少受外界干扰，干得津津有味，自得其乐。即使在数学高度发展、已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的今天，数学家与外界相隔离的现象依然存在。

其实，数学家既是数学王国的主人，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怎样使人们走近数学家，了解他们的科学贡献，成长道路和个人品格，把数学家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似乎应该是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哈尔滨出版社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多方的努力，决定建立一座连通科学、历史与文学三者的桥梁——推出一套《中外数学家传奇丛书》。在当前出书较难的情况下，该出版社能不计较经济效益，

计划出版这套丛书，宣传数学家的事迹，激励年青一代投身科学，实在是数学界的一件幸事。

丛书所选的数学家，考虑两个标准，即他们的学术贡献对数学发展的重要性和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品格的传奇性。当二者并不完全一致时，则更强调后者——人物的传奇性。

本丛书的编写，作为"著名数学家通俗传记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天元基金的资助，感谢中国数学会传播工作委员会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丛书的编写还得到著名科学史家，中科院院士钱临照先生和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力学家、中科院院士钱令希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钱令希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为丛书作序，使我们备受鼓舞。

编写数学家传奇丛书，在国内还是一种尝试，因此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同时，我也十分热切地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广大数学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繁荣我国的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而努力工作，以更新更好的作品迎接21世纪的挑战！

杜瑞芝

1998年春于大连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　子

敢于冲闯命运的是天才。

——雨　果

生活的目的在于有所成就，活着就要有一定的价值。

——里欧·罗斯顿

七律二首

赠王梓坤先生

几度春风几度霜，育人为学一何强
挥将才气压千古，斫就栋梁擎万方
不利不名何落落，有情有志自昂昂
青山绿水恒相伴，漫道崎岖路正长

雅量高怀夫子风，循循善诱发童蒙
志情仪采三春美，道德文章一代雄
务去华光求朴拙，求来妙谛见精工
壮心犹在人难老，即兴挥毫气似虹

李争光

1998 年 5 月

引　言

著名数学家、科学院士王梓坤先生，在当今我国教育界、知识界，无疑是个传奇式人物。从1977年王先生率先被破格由讲师提升为正教授之日起的20年来，他总是处在世人瞩目的中心。在概率方面的突出科研成果，标志着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而《科学发现纵横谈》的畅销，建立教师节的最先倡议，乃至汕头大学每月万元的高薪聘请，更成就了王先生在公众心目中的传奇。

然而，谁又能料到，这部传奇竟是在一间占地仅9平方米、阴暗、潮湿的“陋室”中“写”成的。而这传奇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部更大的传奇！

1993年，汕头大学以每月万元的高薪聘请著名数学家王梓坤先生为博士导师，开创了当时我国大陆知识分子工薪的最高纪录。它充分体现了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价值，为我国长期以来在劳动报酬上搞平均主义，甚至搞体脑倒挂的极不合理的分配

怪圈，投掷一枚重型炸弹。此事在我国教育界、知识界造成极大的影响，王梓坤先生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王梓坤先生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的事还不止于这一次。早在1978年11月，天津市政府在天津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隆重宣布王梓坤先生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正教授，这是十年文革浩劫后我国知识分子学衔的首次提升。将此事弄得如此隆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像一声春雷震响了神州的寒凝大地，标志着我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迈出了象征性一大步。为此，香港《文汇报》做了醒目的长篇专题报道，王梓坤先生的名字从此在海内外传扬。

1978年，王梓坤先生的科普著作《科学发现纵横谈》，像一枝傲雪的俏梅在《南开大学学报》上争先吐艳，激起了全国广大青少年和广大科学爱好者学科学、爱科学、为科学事业做贡献的极大热情。几千封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南开大学，顿使《南开大学学报》洛阳纸贵，创造了我国高等学校学报发行量达到空前的高纪录。紧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争先将此书出版，并在短时期多次再版，此书成为当时我国最畅销的科普读物，王梓坤先生由此而在全国名声大噪。

1985年，身为我国教育界名流和北京师大校长的王梓坤先生，以其崇高的威望和鼎鼎的名气，最先倡议在我国建立教师节，很快就得到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并被国家领导部门认可。从此我国破天荒地有了教师节，而将我国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历史性的水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教兴国的实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每当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到来之际，人们当不会忘记建立这个节日的首先倡议者王梓坤先生。

王梓坤先生为我国教育界和教学界、知识界做了如此许多的

大好事，每当人们提到这位德高望重的王梓坤先生的名字，无不为之肃然起敬。

王梓坤先生在我国教育界、知识界的影响，首先还是在于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名数学家，是他在概率论研究方面达到了国内外第一流水平。在他以前，中国并无概率论研究，是他第一批赴苏留学将前苏联先进的概率论研究带到中国，并在短期内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王梓坤先生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我国概率论的先导者之一，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谁若是论及当代中国数学的发展，论及中国乃至世界概率论研究的情况，将一定会提到王梓坤先生。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王梓坤先生的成长过程。王梓坤先生是在旧中国长大的，他青少年时代家境十分贫穷，连上小学都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却一直从小学读到中学，又读到大学，中间又从未休学，这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带有传奇性的过程。

王梓坤先生在成长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一道难关、一重险阻，如果是别人，则往往是无法克服、无可逾越而裹足不前的。而王梓坤先生却总是满怀着希望，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从而走出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迈向一个又一个新的、美的、高的境界。

人们不禁要问：王梓坤究竟凭借什么，既艰难又顺利地走过从贫农子弟、放牛娃到大学生，以至数学家、科学院士的历程？他为什么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无敌？为什么他总是能战而胜之，攻而克之，迎而解之，通而达之，求而得之呢？究竟为何他能像孙行者一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做到遇险难而不惧，临困境而不忧，经磨历劫、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转祸为福，终达彼岸而成正果？

难道命运对他特别关照，机遇对他特别垂青，理想对他特别

厚爱，事业对他特别钟情吗？不然，为何别人不敢想的他却想到了，别人不敢做的他却做到了，别人经受不住的他却经受住了，别人难以得到的他却偏偏得到了呢？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难解奇谜！

大辞家司马相如说："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难蜀父老》）。大文学家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留侯论》）。王梓坤先生确是一个有"过人之节"的"非常之人"。然而，其"非常"的深厚蕴含是什么？"过人之节"的具体表征何在？人们不能从抽象的逻辑推理去演绎，而只能从其生活历程的具体事实中去探求。所以，本书就是将王梓坤先生60余年的生活实况，撮其主要进行具体如实的描述，不敢有半点虚夸，而让人们实事求是地去具体深入地了解王梓坤先生成才的原因。

当我们得知他少年时代每天步行20余里去上小学而从未迟到的感人事迹时；

当我们得知他青年时代曾迈着两腿跋涉千里从家乡吉安到湖南长沙考大学的艰难之旅时；

当我们得知他曾手抄一本1000余页的《英文字典》的非凡之举时；

当我们得知避开"四清"干部的眼神，蒙着被子打起手电筒在偷偷地校对书稿的滑稽逸事时；

当我们得知他曾利用每天上班前的半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一本50余万字译著，而成就感人的惜时之篇时；

我们就会明白，王梓坤先生为什么总能够在学习和事业上不断地从一个层次迈上另一个高层次，从一个境界又开拓另一个新境界，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业绩的原因了；我们也会明白王梓坤先生为什么总能在失望中看到希望，在困境中振作精神，而扼住

命运的咽喉，把握住一个又一个机遇，取得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奥秘了。我们更会明白王梓坤先生在一生奋斗的历程中，总是能够吃大苦、耐大劳、藐视困难，不断克制自己，激励自己，不为利诱，不为名缰，始于一而归于一，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深厚的思想底蕴了。

大河奔流，汇众水、经曲折而致其远；
高山仰止，垒土石、蔚丛莽而就其大；
巨木森然，历寒暑、经风雨而参其天；
俊才雄杰，贫贱忧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目　录

自幼好学

第一章

1. 从零陵到庐陵

1928年4月21日，王梓坤在湖南零陵出生。零陵，又名永州，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九嶷山和阳明山的峰峰岭岭，耸峙在秀碧澄清的潇湘二水之间。传说我们最可敬的祖宗大舜曾到这里巡游，并以永州作为他生命的最后归宿。那美丽的潇湘二妃在此洒下了深情的泪滴，染成了美丽的斑竹。这美丽的传说，使历来无数的骚人墨客为之仰慕，为之倾倒。毛泽东有诗句说："九嶷山下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唐代大文学家，曾在永州用他的生花妙笔，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永州八记》，将永州的山水描绘得至胜至绝，至佳至美，更使永州名满天下。

古人曾经说到，人的才华发挥，多得江山之助。"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

多少，欲与风云而并驱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是的，美丽的山水风物，必孕育着美的文化，而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美的激励，而可以使人思想开阔，胸怀宽广，精神愉快；使人向往美，追求美，热爱美的世界，从而富有进取心和创造精神。

永州雄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深远优美的历史文化，不能不给王梓坤童稚的心灵以一定的影响。他的父母、他的兄嫂和周围的人们，生活在那优美的环境里，所受到的山水性灵和历史文化陶冶，也会间接地影响到王梓坤的心身。

一方山水，有一方人物；一方人物，有一方特性，具有一方才情。王梓坤力求进取，刚毅坚强，不怕困难的个性与开阔的胸襟及非凡的才情与创造力，显然也是受了永州山水与文化的哺育而形成的。

王梓坤的呱呱坠地，给他父母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望。在一个以男子为中心、重男轻女的社会里，一个男孩的诞生，意味着带来了实力，带来了运气和幸福。王梓坤的父母为自己家里生了一个男孩而认为是锦上添花。他们将这个儿子取名为“福儿”，在湖南江西一带又叫“福伢子”或“福毛”。因为老大叫“森（生）财”，这老二叫森（生）福”，是再好不过了。虽然，老大已经长大成人了，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好财运。但他们仍然希望这个老二将来能给家里带来幸福，不管这种希望是何等的渺茫，但希望的火花总是不会熄灭的。果然，几十年后，这儿子终于给家里带来了幸福，只可惜两位慈爱的老人，没有看到而已。

王梓坤的父亲叫王肇基，是一个忠厚老实而又十分聪明能干的人。王梓坤的母亲叫郭香娥，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为人热情、诚实、勤俭节约，个性强，脾气躁。

王肇基只读过4年书，但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

而常被本村的商人雇用到湖南去当店员。他为人沉静，说话不多，做事勤谨踏实，待人和气热情，所以深得老板看重。

王肇基虽然读书不多，但很爱看书，又很爱看京剧，还会下象棋、钓鱼。显然，他已不是纯粹的旧式农民了，而是农民与市民的结合。既有农民的淳朴、厚道、勤劳、朴实，又有市民的机智、聪明、洒脱、爽快。常年的店员生涯，使他身上有很多的市民成分。

他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讲究忠孝节义，又在城市里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影响，而眼界比较开阔，性格比较开朗，喜欢交朋友，喜欢接触新事物。他处事谨慎，待人谦和，乐善好助，心宽似海，义重如山。克己能忍，宁愿自己吃亏，从不占别人的便宜，不讲别人的好坏，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不浮躁，不虚华，任劳任怨，办事沉着冷静，遭受打击不自暴自弃，从不和别人发生争执，也没有和妻子吵过架，妻子发他的脾气时，他总是不做声，对儿子从不打骂，总是循循善诱，慈爱可亲。

王肇基在零陵，是为他江西吉安老家枫墅村商人开设的“恒和商号”当会计。他在“恒和商号”干了几年后，在1930年，就被湖南衡阳的“德成和绸缎店”雇去了。“德成和”也是枫墅村的一个富商开办的，但资产、门面都比“恒和商号”要大得多。况且衡阳在当时的湖南省的第二大城市，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王肇基在“德成和”的待遇也比在“恒和”高了许多，生活水平自然也提高了。

到了衡阳，福毛一家在一个叫“盐仓”的小巷子里租了间屋，住了下来。此时的王梓坤已经3岁，懂得一些事了。刚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没有小朋友和他玩，家里也没钱给他买玩具，他感到很孤独。在这里，最让他感到幸福和快乐的事就是到李妈家

里去玩。李妈是他们一家人的好朋友，他家住在谢家巷，两家离得很近。李大妈30岁左右，既美丽又温柔，而且热情爽快，又很讲卫生。她一看到福毛，就将福毛抱在怀里，并马上拿出饼干、糖果、薯片等好吃的东西来。李妈常常留福毛在她家里吃饭，她的菜炒得特别香，可口极了。福毛在李妈家总要多吃一碗饭。李妈还留福毛在她家里睡觉，每天早上福毛醒来，李妈还用糖水泡一个鸡蛋给福毛吃。吃了鸡蛋，福毛心里总是暖暖的。在李妈家里，他感到有一种十分难得的特有的人情味，比母亲的爱还更温馨，更叫人依恋。

李妈的丈夫李大伯，是一个十分和蔼可亲的大胡子，他每次从外面回来总要买一些糖果给福毛吃。福毛十分喜欢他们，把去李妈家当作过节日一样，每次去都十分开心。他把李妈的家当作自己的家，甚至认为比自己的家还好，一住就是好几天。在他幼小的心里，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人类的爱是多么的美好，他太需要爱了，是爱的温暖，才使这个世界更美好。

等到福毛大到6岁的时候，他父母送他到附近的“豫立小学”去读书。开学那天，是妈妈和李妈一同送他去报到的。福毛这时真不想去读书，在李妈家，邀一些小朋友来玩不好么？人要读书干什么？但他又觉得读书也不错，学校里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也十分好玩。

由于当时福毛的父母也不把儿子的读书当一回事，福毛也乐得好玩，所以在豫立小学读书两年，他的学习成绩都平平，只得过一次奖励，奖品是一张红纸。

福毛似乎并不太乖，丝毫没有显出比别的孩子强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倒是可以看出福毛是一个颇为机灵的孩子。一个假日的下午，福毛在家里玩得无聊，就走出盐仓巷口到大街上去玩，那里有很多人络绎不绝地往一个高大漂亮的楼房走去，原来

那是一个电影院。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还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福毛看到人们热闹地涌进去，也十分想跟着一起进去看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站在电影院旁边呆呆地看着，看到一个人在站口验票，没有票的人是不能进去的。他十分失望，一边看，一边想怎样才能进去呢？忽然，他看见一个牵着大人的衣角的小孩来了。守门的人并没有向小孩要票，就让他进去了。这时，一个中年的妇女走了过去，面容十分和蔼可亲，福毛灵机一动，马上学着前面那个小孩的样子，跟在那个妇女的后面，牵着她的衣角。那个妇女回头一看，见这个小男孩怪机灵可爱的，也就带着福毛进了电影院，并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看完了电影，那个妇女问福毛家住在哪里，福毛十分清楚地告诉了她，她便十分热情地送福毛回家。福毛的妈妈十分感谢，也为福毛的机灵大吃一惊。

在衡阳的好景不长，福毛 8 岁那年，就回江西吉安老家去了。1936 年，正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中国的灾难开始降临，物价开始上涨，生意很不景气，店员的工资也下降了，哥哥原来有事做，此时也失业了。于是父亲决定让母亲和兄嫂回吉安老家去租种田地以谋生计。福毛也就跟着母亲和兄嫂一同回吉安老家去。

吉安地方古称庐陵，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文精神很强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和很浓的读书风气。自从北宋一代文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伊始，这里的文风一直很鼎盛。历来人才辈出，名人灿若群星。除文豪欧阳修以外，还有文天祥、杨万里、胡铨、周必大、刘辰翁、刘过、解缙、杨士奇、罗洪先、贺贻孙等历史名人。谁不赞颂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谁不仰慕“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的风流文采？谁不欣赏杨万里“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佳句？谁不敬佩胡诠《上高宗封事书》提出斩秦桧的冲天胆量和高

尚节操？杨士奇由布衣而做过四朝元老却不失清廉公正；解缙的天才文笔，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当神话一般传诵着，还有周必大的诗话、贺贻孙的《诗筏》，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刘辰翁的爱国词篇、罗洪先的哲学，都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珍宝，如此种种，不可尽言。

在当代，吉安地区更有最光彩的历史篇章。井冈山的红旗曾经映红了广阔的神州的山山水水，黄洋界的隆隆砲声，曾经震响着中国广大的村村镇镇。“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赣水那边红一角”，“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毛泽东这些气壮山河的诗句，更将井冈山的光辉历史传扬中外，人们无不为之景仰，为之赞叹，为之激动！

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历史上走出了几百个进士、十几个状元，现代史上走出了几十个将军，当代又走出了一百多个教授。

或是欧阳修、文天祥等杰出人物给吉安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或是当地优秀深远的历史文化哺育着人民一种上进争先的精神，或是这里土地太贫瘠，而促使人们去改变面貌以求得更好的生活。这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对读书求学有一种特别的执著。这就是当今吉安、古代庐陵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这就是当年的王森福以后的王梓坤成才的土壤。

1936 年农历正月中旬，8 岁的福毛跟着母亲和兄嫂从湖南衡阳坐汽车回江西吉安枫墅村老家。那时的公路修得不好，汽车行驶得较慢，福毛张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不停地往窗外贪看。那连绵起伏的山岭，弯弯曲曲的河流，方方块块的田垅，大大小小的村落，都在车窗外一一展现出来，有时还看见一座小桥，和一丛丛的树林。这一切的一切，在福毛的眼前是何等的新奇，何等的美观。过去住在衡阳街上的小巷子里，天地何等狭小，除了房

屋和人群，什么也看不到。如今看到这许多景物，怎不喜煞？他为此而心花怒放、目不转睛，为此而沉醉、痴迷……以至连母亲几次喊他吃东西都没有听见。

汽车走了很远了，天色渐渐地进入了黄昏，远近影影绰绰的山峦，夜幕里的星星忽隐忽现，明亮似镜的月光，在车厢外边如跃如飞，如掷如腾。似乎清幽，似乎静谧，又似乎寂寞；似乎空虚，又似乎恐怖。母亲和兄嫂都在汽车上睡了，其他的旅客也睡了，只有福毛睡不着，他觉得从衡阳那热闹好玩的地方，来到这样宁静的乡村，他感到怅惘，感到孤独，感到寂寞，好象丢失了一件心爱的东西一样，有一种失落感。最使他怀念的是李妈和老板的儿女王培生兄妹。李妈，亲爱的李妈，对福毛如母亲一般地爱护，现在却见不到李妈了。记得分别的前几天，李妈几次问福毛："你愿意跟妈妈回江西，还是跟李妈在这里读书，由你自己拿主意。"福毛那几天为这件事难过极了，神不守舍的。他实在舍不得离开李妈，李妈是多么温柔和慈爱啊，同她在一起，就像小树苗沐浴着温暖的春风，小鱼儿游戏在三月的池塘。离开她，将是多么不愉快和难熬啊！但是福毛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妈妈，虽然妈妈管教得严，脾气也大，但毕竟是自己的妈妈呀。福毛想了好久，总是拿不定主意，直到动身前一天，他对着李妈大哭起来，李妈也抱着福毛眼泪不住地落，真是撕肠裂肺啊！李妈送给他的糖果饼干，他总舍不得吃掉，留着就会想起李妈。福毛也舍不得那老板的儿女王培生兄妹，他们常在一起玩，天天不离开。今后再也见不到了，这是么多珍贵的友情啊！

第二天中午，汽车在一片绿树丛生的地方停了下来，母亲和哥哥嫂嫂叫福毛下车，说是到家了。

"这就是家乡么?"

"是的，咯里就是我们的家。"

这就是江西吉安县固江镇枫墅村。这是一个大村庄，好象是一个城镇，许多房屋挤挤挨挨的，鳞次栉比，毫无次序，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排列着，好象一辆没有座位的汽车，乘客满载，一个挨一个，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没有丝毫空闲的地方。村的一头是一片茂密的松林，尽是些参天大树，大的有三四围，它长得郁郁葱葱，骄傲地迎着天日，摇着天风。松树下面又长着许多不知名的灌木，矮登登的，碧森森的，黑黝黝的，它们长在高大的松树旁，像一个小孩倚偎在大人的脚边。靠近村子最近处，有几棵古老的樟树，树干挺拔茂密，绿叶满枝，立地擎天，很有气势，很有风采，像几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哨兵，日日夜夜，时刻不息地守卫着村庄。吉安这一带的风俗，凡是村庄旁必有高大的樟树，有的已有几百年历史了，树干粗达十围。不仅是为了装点村庄的风光，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樟树是一种神树，可以镇邪消灾，它们保护着村庄里的安宁、吉利。

福毛和母亲、兄嫂四人，一走进村庄，就有许多亲邻好友前来迎接，问长问短，又帮着提东西，又牵着手。还有一位不知是伯伯还是叔叔，将福毛背在背上，一直送到家门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真令福毛很吃惊。房子虽然宽大，但却是何等的阴暗，何等的潮湿。住房里没有一扇窗子，只有一个砖头大的小孔，不能用它采光，只能用来通气，住起来将会多么憋闷，多么压抑啊。而且家家的房子都是同一模式，村庄又这么大，福毛几次到外面玩，回来时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好在村庄里的人都对他很亲热，都愿意送他回家，然而福毛却要在这个憋闷的家里生活，长大成人。

枫墅村是离吉安县城西 40 华里的一个村庄，村里有一百多户人家，600 多人口。村边有一条小河环绕，另一边有一片山林，村子里全是王姓人家。也不知哪朝哪代，王姓人家在这里修

建村庄，后来村庄渐渐扩大，终于形成偌大的格局。这村庄与其说是山环水抱，不如说是山寒水瘦，乃至山穷水困。这里的人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贫穷的农民，他们耕种自己的少许薄田，或租种别人的贫瘠土地，加上生产水平低，自然灾害多，年复一年他们老是和贫困打交道，没有富裕的希望。而且南方的耕作又是何等的辛苦，当春江还未水暖，就要下田赶着黄牛或水牛，冒着料峭春寒，下水田去犁耙那粘稠得如面团的泥土，双脚在水里搅拌，身子在冷风冷雨中摇荡穿行，等到犁耙完了，走上水田岸来，身子累得发慌，连生盐都吃得下一把。夏天冒着烈日，头上晒得火辣辣的，脚下烫得如汤煮，弯着背，双手不停地插秧，一天过来，累得一身像散了架。收稻子时，一整天弯腰割禾，围着木桶打禾，头顶烈日晒，禾芒从头上或衣衫缝中落下去，刺得如针扎。如此一年四季的繁重劳动，使人不堪负担，收入又很少，这样艰苦的生活，使枫墅村的农民很不安心，只图摆脱那艰苦的现状，以求比较好的生计，于是枫野村有不少人到外面去做生意。当时湖南因有京广和粤汉铁路纵贯，经济比较活跃，江西人大都到湖南去谋生，特别是赣西井冈山一带的人们。那时，枫墅村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就去湖南做生意，贫穷的人就为他们当店员。当店员对于枫墅村贫穷的农民来说，乃是一份美差。一方面，工作比较轻闲，日不晒，雨不淋，冬不冷，夏不热，无繁重劳动之苦。二方面，收入比当农民要高得多了，而且跟老板在外面闯江湖，见世面。

但是当店员也有一定条件，那就是要读一点书，能记账，并且要会打算盘，所以枫墅村人对儿女读书很为关心，希望他们早日学得谋生的本事。

春节过后，初春来到，人们开始忙于一年的生计，父母便想到儿女读书的事。枫墅村是个偏僻的乡村，文化十分落后，读小

学要到十里之外的固江镇去，这就困难了。读寄宿吧，经济上负担不起，走通学吗，路途太远。于是大家合计在本村办一所村学，请了本村的一位老知识分子——王少诚先生当教员。当时中国农民还是传统观念，认为读书以私塾为好，传统的教学，以学古文和写字为主，加上珠算，这对农民来说是最适用的了。校址就设在村东端祠堂里，祠堂是同姓村民祭祖和办理婚丧典礼公用之地，做为校址是再好不过的了。

所谓古文即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杂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千家诗》等传统蒙学读物。高级一点的就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一般说这样的启蒙私塾只学背书、识字和写字，不学习作文。因为农民们或是在家中种地，或是外出当店员，却不需要作文，何况作文是何等难学，那些私塾先生自己也弄不好。

开学那天，是一个春光融融、风和日丽的好日子。7岁的王森福，在兄长王森财的带领下，到祠堂里去报名，王少诚先生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兄弟俩。王森财说："先生，我弟弟也来读书，请报个名。"王少诚先生问："叫什么名字？原来读过书么?"王森财说："叫王森福，原来在衡阳读过1年。"王少诚先生说："好，读了1年书更好，只是这个名字要改一下，因为进学堂读书，不能再用家族里的班辈名字了。"王森财说："那就请先生给我弟弟另起一个好名字吧。"王少诚先生看着王森福，觉得这孩子虽然个子矮，身材单薄，但相貌十分不俗，额头宽宽的，耳朵大大的，鼻子也高高的，不但显得有些灵气，而且还透露出一点机敏，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一定可以为家乡宗族做出贡献而争荣添彩。于是他说："好吗，就叫梓坤吧。"王少诚先生一边讲一边写上"王梓坤"三个字。王少诚先生又说："桑梓的梓，乾坤的坤。你们说好不好?"王森财赶紧说："先生取的，还有什

么不好。”王森福却说：“先生，为什么要叫我梓坤呢?”这一句叫王少诚小小地吃了一惊。来报名的学生有几十个了，他为十几个学生取了名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谁也没有提问所取名的意义。连王森财也没有提出问题，而现在这个8岁的小家伙却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这个小孩确是有点不凡不俗之处。王少诚带着微笑高兴地摸着王梓坤的小脑袋说：“你问得很好，读书就是要勤学好问，才有出息。梓者，家乡也。坤者，大地也。你生长在这家乡大地上，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为家乡父老增光添彩。可谓生于斯，长于斯，乐于斯而爱于斯也。”王梓坤对先生的解释似懂非懂，但觉得这个名字也实在是好，和别人的很不同，莫说在枫墅村，就是在衡阳读书时，也没见过这样的名字，况且这两个字比原来的“森福”两个字笔划少多了，好写多了。

于是王梓坤这个名字代替了原来的“王森福”公布于世了，而标记着他一生成长发展的过程，小学生王梓坤、中学生王梓坤、武汉大学生王梓坤、留苏副博士王梓坤、南开大学教授王梓坤、数学家王梓坤、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科学院院士王梓坤，都起始于枫墅村的王梓坤。感谢王少诚先生给取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名字。王少诚先生虽然没有能看到王梓坤这个名字，后来是何等地令人敬佩，为世人瞩目，但他那一番美好的心愿终于变成现实，王少诚可谓慧眼识英雄。

王梓坤在枫墅村学堂，开始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杂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也许是在衡阳那城市里玩耍太多，浪费了聪明，也许是家乡深厚的庐陵文化灵气的影响，王梓坤在枫墅村读书比在衡阳读书大有长进，不到20天他就读完《三字经》和《千字文》及《六言杂字》，不到一个月就读完了《幼学琼林》。传统教育的读书方法和现在学校的读书不同，那时轻视理解重视记忆，不仅要做到背诵

如流，而且要字字句句默写得出。在这方面王梓坤表现了超人的聪明。王少诚先生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以及接受能力，对每人提出课读的任务，首先要求在学校里完成点读内容，放学后又有点读任务。所谓点读即先教学生认字阅读某一部分内容，然后用红笔划个圈，说明到此为止，要求能背诵并默写。放学后的点读任务，要求在第二天上学时背诵或默写，若没有达到要求，就要罚站，站着读书，严重的还要打手掌、下跪并记过。完成得好的，甚至超额完成的，则进行表扬、记奖。

王少诚先生对教学十分认真，对学生要求极严，赏罚分明。王梓坤在王少诚先生教育下进步很快，而且智力得到很大的爆发。读了半年，已将上述几本蒙学读本读完，第二学期就开始读《四书》了。

王梓坤家里经济困难，父亲做店员的收入只能供家里吃饭穿衣之用，买书是无法负担的，并且母亲不同意将钱用在买书上，她认为用钱买书是十分可惜的，于是王梓坤只得抄书，先是他兄长王森财为他抄，王森财以前在湖南读了几年书，字写得还不错，后来王梓坤自己抄。纸是当时农村通用的毛边纸，笔即毛笔。王梓坤每天回到家里借同学的书，用毛笔规规矩矩地抄在自己装订的毛边纸本子上。

《四书》是儒家经典著作，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书中的内容对于八九岁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外奇谈，莫知所云。但王梓坤也是按照老师所教的去记去背诵去默写。虽然王梓坤当时对书中的内容并不理解，然而由于《四书》写得很有文采，语言艺术性很高，它把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了。使王梓坤读着读着感到有一种琅琅上口的诗意和艺术的韵味，他朦胧地觉得那是十分美妙的迷人的，有一种生动的气韵在流动，其语言表达了世界上无比崇高无比美妙的东

西。是的，孔子、曾参、子思、孟轲这些先秦时代的圣哲贤达所写的文章是何等的妙不可言。他们用极其深厚的文化修养，站在哲理的高度观察分析着社会人生，又用准确生动美妙的辞句表达出来，既恰到好处，又优美形象，会意者可深人得其妙谛，不会的也可以受其焕然文采的感染。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第一》）

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王梓坤每当读到这些语句，心里就受到震动，受到感染，好似打开一个美好的天地，心里豁然开朗，令他无比向往。他觉得这里面的人物有一种令人敬仰的崇高伟大的形象，这里面的情景有一种迷人的远非俗比的美妙。他更热爱读书了，他似乎觉得书里面有一种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将他托起来，使他更高了，浑身也更有力量，心也更加充实了。这些东西不是他爸爸、妈妈、哥哥、嫂嫂所能给予的。

王梓坤在枫墅村是首屈一指的优秀的学生，他背书最快，也最准确，从来没有挨过罚，又很遵守校规，所以王少诚先生最爱他，常常在同学们中和家长们中夸奖他，多次正式表扬他。很快，王梓坤在枫墅村就以读书最好而出了名，村里人都说王肇基有个好儿子，王森财有个好弟弟。

王梓坤每天总最早到校，从不迟到早退。他一走进学校就感到特别高兴，特别幸福。他爱闻纸和墨的气味，他爱听写字的声

音，他爱在教室里听同学们读书的声音，他更爱听王少诚老师讲课。他每天最早到校，是想最早听到同学们的读书声。有天放学了，他的功课已经完成，书也背了，同学们也先后回家了，但是他还在教室里不动，原因是有几个同学还没有背完书，王少诚先生将他们留下来读书，一定要背完书才放回去。王少诚先生发现王梓坤还在教室里，就说："王梓坤，你已经背了书，放学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去吃饭?"王梓坤说："我不饿，我还想听同学们读书。"王少诚先生说："你还听他们读书干什么？快回家去吧！"王梓坤说："先生，我虽然背了书，但我还想听同学们读书，使我记得更熟，背得更快！"王少诚老师听了十分感动，心想，多么爱读书的孩子啊。王梓坤总是这样最后离开教室。

是的，琅琅书声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动听的声音，它像潺潺的溪水在流淌，流过山谷，流过石壁，流过丘阜，流到一片宽阔的原野。像山上的牧笛在横吹，响彻高天，响彻田垅，响彻家乡美丽的土地，彩云为之停遏，群鸟为之沉寂，林木为之战栗。像深夜谁家悠扬的琴声在鸣奏，是少女幸福深情的低诉？还是老人"流水落花"的逝叹？还是男子青春盛壮的歌吟？

琅琅书声，似乎把世界最亲切最可爱最幸福的声音集中起来了。那是小时候，母亲一边拍抚着他唱着催眠美妙轻歌，隔壁老奶奶亲切关怀的声声絮叨，临别那天慈祥的父亲再三再四的切切叮咛，是美丽温柔的李妈叫吃糖果的清脆呼唤和逗他玩耍的频频笑语。是父亲带他在京戏场里看演红娘的阿姨那婉转明艳的歌喉，使场下观众声声叫好，阵阵掌声经久不息。是村里小兄弟、小姐妹们，一齐跳起在村外的小河里打闹溅起水声哗哗，是他和哥哥嫂嫂踩在那如一条老龙的笨重破水车上，水车吱吱哑哑地叫，流水哗哗扑扑地响，跟着水车叶子，连连地涌上来，然后像小瀑布似地落在禾田里，田里的青蛙在叫，蚱蜢在跳，秧鸡在咕

罗咕罗地鸣，一阵猛烈的热风吹来，禾苗顿时被摇得不停地沙沙作响，似乎在预告丰收的消息。

琅琅书声，使童稚蒙昧的心灵开启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童话的幻想世界，走近它，就走近了知识，走近了文明，走近了美好，走近了高雅，走近了圣洁，走近了晶莹明亮，走近了光辉灿烂。它给贫困野朴农家孩子带来了聪明，带来了智慧，带来了幻想，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追求，带来了奋进。

仿佛是阵阵电闪雷鸣，骤然一亮，轰然一声，掀开了层层厚重的暗暗冬云，震醒了寂寞暗哑沉睡的大地，于是冰雪羞怯怯溜走，严寒战抖抖地遁退，落落大方地走来了一个微风煦煦、蜜蜂嘤嘤、蝴蝶翩翩、莺语关关、处处溶溶泄泄的美丽春天。

又仿佛是泼天洒地的阵阵暴雨哗哗而下，将天上的阴霾，地上的尘埃，人世的丑陋洗涤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天空更加澄碧，高山更加苍翠，田野更加媚丽，河流更加湛蓝荡白，人们更加神采奕奕。……

也许是王梓坤和书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是故乡悠久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熏陶，也许是一个天才早熟的男儿自幼就有志气有理想的精神个性。王梓坤对书声总是有最大的兴趣，他天天听得如醉如痴，如梦如幻，如迷如狂，而常常为之心花怒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胸阔气爽，精神振奋，忘了疲倦，忘了饥饿，忘了玩耍，忘了痛苦，忘了委曲，忘了一切。

王少诚先生并不是个封建遗老遗少，而是受过师范新式教育的人，而且喜欢去吉安县城走一走，会一会朋友，他的见识比较广，比较新。他想到办学校，使学生们不仅是读几句书识几个字而已，还要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些孩子中有像王梓坤这样聪明的，应该按新的教学内容培养，如果让旧的传统蒙学读物困住他们，不接受现代新文化，这将是个祸害，为此，到第二年，他对

教学内容做了彻底的改变，他为枫墅村学校的孩子们买来了新编的小学教材，不仅有语文课本，而且有算术和常识课本，不仅开设语文、算术、常识三门课，还开了音乐、美术、体育三门课。虽然任教六门课，门类繁多，负担沉重，但对于聪明而有能力的王少诚老师来说，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王梓坤对于新开的课程，都觉得很新鲜很有趣，他一点没有偏废，门门学得很好，成绩全优。王少诚对这个学生的超人智力十分吃惊，王少诚因自己有这么个学生而洋洋自得，踌躇满志，到处宣传。王少诚想起孟子的话："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君子最大的乐趣。王梓坤的聪明和勤奋及优异的学习成绩，在整个枫墅村传开了，不论是校内校外，男女老少都称赞王梓坤，喜欢王梓坤。大人看到他，还常常出一些算术难题给他做。

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有位老人高高兴兴地拦住孩子们说："我出个难题给你们算好么?"小朋友们说："好哇！你出吧，我们算不出的话，还有王梓坤呢!"老人说："有一百条鱼总共重一百斤，其中草鱼每条 10 斤，鲢鱼每条 1 斤，鲫鱼每条 1 两，问三种鱼各有多少条?"小朋们马上认真地算了起来，但是怎么算也算不出，总不对数。上课时王少诚老师从来没讲过这类题目，那时候的秤又是 1 斤等于 16 两，真是难极了。过了一阵，最后离开教室的王梓坤来了，小朋友像得到了救星似地迎住他，叫他算。王梓坤也想了好一阵才算出来，他说答案是：草鱼 5 条，鲢鱼 47 条，鲫鱼 48 条。在惊奇之余，小朋友们向他求教算法。王梓坤向小朋友们讲解了他的算法。他首先假设这些鱼全是草鱼，那么 100 斤鱼只有 10 条草鱼，这与 100 条鱼的总数不符。所以必须将大鱼换小鱼，若将 1 条草鱼换 10 条鲢鱼，总条数就会增加 9 条；若将 1 条鲢鱼换 16 条鲫鱼，总条数就会增加 15。于是，可以列出一系列可能的等式：

草鱼数+鲢鱼数+鲫鱼数=总条数

9+9+16=34

9+8+32=49

8+18+32=58

8+17+48=73

8+16+64=88

8+15+80=103

……

弄不出总条数为100，关键在什么地方？他想：9的几倍加上15的多少倍会等于100-34=66呢？他把各种情况试着算，当9取1倍时，不行，2倍3倍也不行，当9取4倍时试得15，取2倍得出总条数为100，即5+47+48=100。

当小朋友们陪拥王梓坤去将答案告诉那个老大爷时，老大爷顿时大吃一惊，摸着王梓坤的小脑袋不住地赞美说："了不起呀，了不起，你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了。了不起！"。小朋友们对王梓坤也更加佩服，更加友好了。

2. 书　痴

王梓坤读到小学4年级时，总觉得自己的求知欲望得不到满足，好像没有充分的食物来填满他辘辘的饥肠。那些似懂非懂的圣人名言，令他高深莫测，这种"忘年的交谊"不能满足他少年青春的渴求，而王少诚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新编课本内容他又觉得太少了。于是他只想找一些别的书本来读。仿佛是一次特别的机缘，春季的一天，他妈妈要他去谷仓里打扫，希望能扫出一点

稻谷，来解决度荒困难。王梓坤奉母命扫仓。扫出了一些谷子，令妈妈喜出望外，然而令王梓坤喜出望外的是，在那阴暗的谷仓的角落里发现一本书，拿出一看，封面已经没有了，扉页也已脱落，但仍有一个书名：《薛仁贵征东》。还有首诗："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海影无踪。三岁儿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王梓坤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书，他一页一页地看起来，虽然有些难字认不得，但可以看懂大意，原来是我国古代一个英雄的动人故事。那通俗明白的语言，曲折动人的情节，酣畅淋漓的叙述，栩栩如生的描绘，以及对忠义的赞扬，对奸邪的贬抑丑化，引起王梓坤极大的兴趣，使他看得如醉如痴，忘记了一切。妈妈和嫂子拿他扫出来的谷舂成了米做成了饭，那香喷喷的米饭引诱着饥饿了的人，然而王梓坤似乎不饿，他被另外一种填补饥饿的东西迷住了，以致妈妈几次叫他去吃饭，他都没有去。他想一口气看完这本书。薛仁贵那力大无比、无所畏惧、所向无敌、叱咤风云的气势，及其忠诚、厚道和质朴、忠义，令王梓坤敬佩得五体投地。他认为做人就要做薛仁贵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汉，有超群绝伦的本事，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王梓坤将这本《薛仁贵征东》看了又看，一连看了四次，还舍不得放手，他觉得这是天下最好看的书。于是他将这本书告诉了同学王寄萍。王寄萍比王梓坤大几岁，与他相邻而住，同一年级读书，两人十分要好。王寄萍也一口气看完《薛仁贵征东》。他们俩人还想多找些书来看，就到村子里去向兄弟叔伯们借书，互相传阅，越看越有劲，于是他们先后看了《忠义岳飞传》、《杨家将》、《说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清平山堂话本》等中国古典小说。

这一本一本的书，使王梓坤增加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勾心斗角的阴谋，莫须有的罪名，给

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人，也有一些坏人，但好人总是得到人民的爱戴，坏人总是没有好下场。一个人做人应该做好人为国尽忠，为民造福。

王梓坤看一本书，往往不止看一次，而是看一次又一次，他看得那样专注，常常把好的章节抄录下来，特别是书中的那些诗词，他最喜爱，而抄了很多。

王梓坤以书为伴，书不离手。据他嫂子回忆说，王梓坤一有时间就看书。白天一放学回来，王梓坤就摸出书来读，边吃饭边读。他妈妈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发现他在看书，就把收抢走，或者进行指责。最有趣的是，王梓坤为了抓紧时间看完一本书，以便及时交还别人，吃饭时他就不靠近妈妈坐，而是坐在远离妈妈的对面的桌子一边，靠近兄嫂，要兄嫂遮挡着他，使妈妈不知道他在边吃饭边看书。

农家的孩子，是没有多少时间看书的。不上学，就要跟着大人下田劳动，一方面好使他们从小就学会劳动技能，二方面也可减轻一点大人的劳动负担。王梓坤也不例外，不上学就要和兄嫂或母亲一起去劳动，或下地浇菜摘菜，或扯草、割禾，或放牛、砍柴，农活多得很。但王梓坤总是见缝插针，抓紧一分一秒看书。有一次他和嫂子抬着淤肥（即人尿）去浇菜，在路上他要嫂子扶紧抬淤的扁担，好让他的双手空出来，他就可一边抬着走，一边看书。

6月天，王梓坤和兄嫂一起去车水。南方的水车，是一个上架子有扶手的东西，双手扶在架了子上，用双脚踩踏板使水车转动。一般水车有3个位置，要3个人同时踩，才能把水踩上田来。10多岁的王梓坤就要参加这种重体力劳动。他看书心切，边踩车边看书，自然要分散精力，用力较少，但兄嫂爱他，也不责备。

王梓坤去上山放牛，手里也是拿着书，看书看得入了迷，忘记管牛，牛偷吃了人家的麦苗，回家不好交待，不敢告诉母亲，只好求嫂子去向人家赔礼说情，人家见是王梓坤的失误，也就笑着谅解了。

母亲要王梓坤去摘绿豆，王梓坤带着书去，坐在树荫下，打算看一段书再去摘，但不知不觉就看到太阳下山，绿豆还没有动手摘，王梓坤慌了，这样回去，必然会挨母亲的打骂。这时有一伙小朋友放牛回来，从他地边过，他灵机一动，大喊："兄弟们，快来帮我摘，回家后我讲个好故事给你们听。"小朋友们蜂拥而上，人多手多，一会便摘完了绿豆。

有一次，王梓坤弄来一本《杨家将演义》，看得十分投入，里面写的杨六郎、杨宗保、穆桂英等英雄人物，太令他喜欢了。白天他没看完，夜晚没有灯油。于是天才麻麻亮他就出来，走到村外，坐在那棵大樟树下，借着熹微的晨光，慢慢读起来。忽然一个老大爷走来。拿起一把锄头向他打去，他大吃一惊，那老人也吃了一惊。将出手的锄头马上停住，而偏了一点落在王梓坤的大腿边。那老大爷说："哎呀，福伢子，你如何这么发奋呀！天没亮就起来读书，害得我没看清，以为是一条狐狸，正要用锄头打呢？哎呀，真吓我一大跳呀！"

王梓坤成了村里的文化人，他看的故事书最多，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因为他自己要抓紧时间看书，所以往往要在晚上没有灯油看书的时候，或在山上看牛砍柴的时候才有时间给大家讲故事，小朋友们乐意并主动地给他看牛、砍柴，让他看书，然后将故事讲给他们听。这样，王梓坤做到了两不误，上山放牛也能看书。

王梓坤读了很多书，但他却越觉得自己读书太少，书上还有许多难字认不得，遇到难字他就抄起来，集中起来去问王少诚老

师。王老师也真厉害，王梓坤不认识的字都认识，而且能讲出意思来。王梓坤真佩服王老师，学问渊博，他立志长大了要做王少诚老师那样有学问的老师，也能教孩子们读书。

有一次，王梓坤将抄集的许多难字去问王少诚老师。不巧王老师外出了，他十分扫兴，恨自己认字太少。两天后王少诚老师回来了，告诉王梓坤凡是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并教他怎样查康熙字典。但王梓坤家贫，买不起康熙字典。他想鼓吹堂兄王寄萍买一本，王寄萍家里也嫌康熙字典太贵，买一本要半担谷，于是王梓坤到处打听，除王少诚老师外，村里还有谁有康熙字典，后来知道有个远房叔叔家里有一部，王梓坤想借来用，但那人对此字典爱如至宝，说去他家翻查是欢迎的，借走则不行，因为自己也经常要查字，从此王梓坤就有了第二个老师，不再怕难字了。

王梓坤对读书、求学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样强烈的求知欲，对一个 10 岁的小孩来说是少见的。他自己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也许就是天赋吧！也许是因他个子单瘦、力气不大，在田间劳动感到吃力，只有到了学校里读书，他才不仅比别人强，而且强很多，甚至连大人都望尖莫及。也许是一种好胜心，一种优越感，促使王梓坤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有位名人说：兴趣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推动力。这话是很对的，如果王梓坤小时候对学习没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以后他可能不会走继续读书深造的道路，他就不可能有更高的学习追求，更不可能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了。

读书能使人摆脱愚昧，摆脱落后，摆脱粗野，摆脱偏见，读书能使人进入知识的海洋，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只有当一个人把读书看成和吃饭穿衣一样需要时，才能从书中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像涓涓不断的泉流，时刻泻琼漱玉。像长满丛林的山原，年年遍地春草绿，今年花胜去年红。而读书的兴趣，

必须从少年时开始，从少年时代打下好基础。有很好的幼苗，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王梓坤 11 岁时，已在枫墅村读了 4 年，学完了初级小学的课程，再读就要到离家 10 里远的固江镇“吉安第三中心小学”去读高小。读高小每期得交一笔学费。按当时枫墅村的习惯，小孩子读了三四年书，就行了，再读已没有必要，没有用处了。所以王梓坤的母亲只打算让他读完枫墅村的初级小学就算了。这对好学上进的王梓坤来说，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恐慌、忧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对母亲再三请求，母亲总是不肯，他只好求救于王少诚老师。王老师出于对王梓坤的爱，亲自三次去到王梓坤家里，劝说王梓坤的母亲，说像王梓坤这样既聪明又勤奋的学生，不继续读书实在太可惜。还说王梓坤多读一些书，将来可能有一份公事干，家里经济情况就会松动多了。在反复说服之下，王梓坤的母亲终于答应让王梓坤到固江去考高小。

考试，对于王梓坤来就，乃是小事一桩，不在话下，他顺利地进入了固江镇读高小。这第三中心小学当时是固江镇的高等学府，凡是家远一点的学生，都在学校寄宿，王梓坤也不例外。在固江小学读书，他更努力认真了，老师教过的内容他都掌握得烂熟，毫无一点差错，每次考试都是全优，是班上第一名。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刘莲英，总是第二名，总分成绩常是相差 20 分以上。有次全吉安县的高级小学为了检查教学质量，进行统考，王梓坤的成绩总分全县第一，数学是 120 分的题，他得满分，语文也是全县最高分。此事在全县教育界影响很大，特别是固江镇和枫墅村，人们都把王梓坤当神童，但王梓坤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他除了聪明之外还有勤奋，他的成绩是辛苦换来的。

3. 慈父的爱

王梓坤的父亲很少回家，在外面做店员，很忙，为了做事，一切要看别人的眼色，况且工资收入微薄，维持一家用途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哪有多余的钱回家探亲呢？

父亲对王梓坤是很爱的，他觉得这第二个儿子性格十分象自己，又十分机灵，天分好，将来会有出息的。当然，对于当小店员的他，决没有将王梓坤培养成大材的非分之想，他只想，这个福毛，将来读一些书，找个比较好的差事干干，就不错了。

父亲对王梓坤的教育是十分费心的。他觉得自己虽然能识一些字，但是还很不够，他十分羡慕那些读了很多书的人，于是他把多读书的希望寄托在王梓坤身上，他曾把王梓坤送进衡阳的豫立小学读书。又以后亲自教王梓坤写字认字，并买来《柳公权玄秘塔》字贴给王梓坤学习。他去看京剧，带上王梓坤去，一方面将京剧里古代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故事讲给他听，使王梓坤对京剧产生了兴趣，对英雄豪杰敬佩不已。他教育王梓坤做人要做英雄豪杰，要做有才能有用的人，不可甘居落后，要当男子汉大丈夫，要当富人，我们家穷得太可怕了，必须埋头苦干才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七八岁的王梓坤虽然还不明白父亲所说的许多意义，但觉得父亲说的不会错，一个人就是要聪明，能干，要自强。

30年代的旧中国，时局变幻，在外糊口很不容易，王梓坤父亲打算把家属送回江西吉安老家。在王梓坤随母亲和兄嫂离开衡阳回吉安之前，他父亲心里曾进行过反复的矛盾斗争，父亲很

爱福儿，希望福儿留在自己身边，好好读书，快快成长，为此他曾与自己的好友李大胡子商议，请李妈托管一下福儿的吃穿，留住李家。李家夫妻也很喜欢福儿，特别是李妈，很痛爱他，满口答应接受他。但是父亲王肇基又觉得这样不好，一则，长期如此，会给李家增添很多麻烦，而自己又无法更多地报答李家，这将是十分内愧的事。二则，福儿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母亲，是的，儿子得不到母爱是十分不幸的，不管这个母亲对儿子的爱采用何种方式。留与走各有利弊，父亲心里十分矛盾，委决不下，于是只好由福儿自己来选择。当时福儿也很矛盾，他爱妈妈也爱爸爸又爱李妈，甚至李妈对他的温暖不亚于妈妈。想来想去，福儿最后下了决心，跟妈妈回吉安去！福儿回家了，父子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一年顶多一二次。但是为了生计，实在没办法。临走前一天，王肇基将福儿叫到身边说："福儿，你舍得离开爸爸吗?"福儿说："我舍不得，爸爸，我很想你教我多认字。"父亲说："你还是跟妈妈回去吧，到家里读书，不要贪玩，只有多认字多读书，才有出息，爸爸对你说过多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要怕吃苦，我们这样的穷人，不吃苦，就没出息。"福毛不住地点头，看着他那懂事的样子，王肇基更心酸了，流泪了，作为父亲，不能将儿子留在身边，好好受教育，这是何等歉疚的事。

王梓坤回到吉安老家以后，4年间父亲仅回家两次，其间只有一些书信来往。父亲两次回家，对王梓坤来说，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一般人说严父慈母，而在王梓坤家里却是慈父严母，母亲脾气很躁，性情很刚，父亲则十分随和慈祥，不仅从来没有打过他，而且连责骂也从未有过，这对于一个正在成长需要人疼爱的小孩来说，简直是花草逢春风，鱼儿有了水，是最幸福了。

父亲第一次回家，是腊月二十四下午，正逢过小年，王梓坤

接到信知道这天父亲会回来，一大早就到村边等待，到下午3点钟左右，才看见远处来了一辆汽车，汽车驶到村边停下，车上下来一个人，真的是父亲回来了！王梓坤高兴极了，牵着爸爸的手高高兴兴回家。父亲这次不仅带回来许多吃的东西，还带回了王梓坤最喜欢的东西，《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他早就听说这两本书十分好看，总想弄来看看，但本村只有一个人有一本《西游记》残卷，《三国演义》则无处可找，王梓坤得到这两本书，比得到好吃的糖果更高兴，马上打开看起来。

父亲给王梓坤编了本同音认字材料，里面将许多同音字分类，写在一起，如："衣、依、益、医、伊、夷、椅、揖"；"王、汪、枉、罔、惘、往、旺、望、妄、忘、魍"；"里、李、礼、浬、厘、漓、篱、梨、犁、鲤、荔、历"。这样，只要认得其中一个字，其他的字都能认出来，这实在是好。在那材料的后面，还抄了一些谜语和有趣的对联。谜语是：

两人两土两张口，普天之下处处有。
若是有人猜得着，半斤猪肉一壶酒。

（打"墙"字）

曹操门内两干戈，云长就把弓来夺，
孔明一人用个计，吓得周瑜把皮剥。

（打"开张大吉"四字）

头戴八卦诸葛亮，满身带箭关云长。
比干大臣挖心死，先苦后甜李三娘。

（打物"金樱子"）

抄的部分对联是：
白水泉水十口田，五口为吾
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成柴

青草桥下青草鱼，口衔青草
黄花岗上黄花女，手执黄花

燕子飞山，山飞子燕
天洞流泉，泉流洞天

处处飞花飞处处
潺潺碧水碧潺潺

水车车水水来自车，车随水转
风扇扇风风出于扇，扇动风生

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王梓坤的的父亲在家住了十多天，除教王梓坤读书、写字之外，还教他钓鱼、唱京剧，并讲了许多故事，如《狸猫换太子》、《徐策跑城》、《三关摆晏》等，最使王梓坤难忘的是讲吉安古代名人文天祥和解缙的故事。文天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令他万分感动、敬佩，文天祥真是一个勇敢的英雄人物，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有天下午，父亲要王梓坤背对联，背完以后，王梓坤要父亲讲故事。父亲给他讲吉安古代才子解缙写对联的故事。解缙是吉安附近的吉水县人，离枫墅村不过几十里，解家也很穷，像我们王家一样，但解缙小时候很聪明，读书非常认真，七八岁就写得一手好字，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尤其是对联写得更好。有年春

天映山红开得喜人，解缙摘了一枝，上课时仍惦记着那美丽的映山红，不时看看，被老师发现了，因平时解缙很听话，且会作对联，所以老师不当场责骂他，而是随口讲了一句："小子暗藏春色"，解缙此时虽然十分不安，但见老师说了这句带有诗文对联的话，他马上一句："大人明察秋毫。"表示自己决心改正，这句说得实在巧妙，又对得十分工整，老师听了十分吃惊，就谅解了他，而解缙就因此出名了。又有一年过年，解缙的父亲买红纸去请人家写对联，小解缙自告奋勇来写。他家对门的高楼大院是当朝曹尚书（相当宰相）的府第，其花园里栽满了秀美的竹子，于是写道：

门对千竿竹

家藏万卷书

这对联实在写得好，但解家很穷，并没有万卷书，虽然父亲祖父读了许多书，可惜官运不通被曹尚书瞧不起。曹知道了对联之事，马上派人把竹子砍掉，解缙马上提起笔在对联上加两个字，成了：

门对千竿竹短

家藏万卷书长。

曹尚书又命仆人把竹子的根都挖掉，想解缙就没办法了，谁知解缙又在对联上加两个字：

门对千竿竹短无

家藏万卷书长有

这下曹尚书就没有办法了，觉得解缙实在聪明，忙派人清解缙来相见。但又还想捉弄人家，故意不开正门开小门，解缙说：门太窄了，我不能进。曹尚书取笑道：

小犬无知嫌路窄

解缙马上反击：

大鹏展翅恨天低

曹尚书见对得这么好，十分赞赏，又出句很难对的句子：

岩狮子头顶石时炉，何日得下

解缙马上对曰：

泥制官手执生死簿，几时勾销

曹尚书见对得又快又好，即叫人开大门迎接解缙，此时解缙身穿绿袄，曹又讥笑他：

出水蛤蟆穿绿袄

解缙也毫不示弱地针锋相对地说身穿红袍的曹尚书：

落汤螃蟹着红袍

就这样曹尚书不得不认输，佩服，招待解缙唱酒，然后又要解缙下棋、弹琴，再试他的才华，并说一联：

天当棋盘星当子，何人敢下？

解缙对曰：

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敢弹？

到此，曹尚书完全了解了解缙是个了不起的才子，事后到处宣传，于是解缙就大大出了名。

王梓坤将以上对联一一抄下学习；并从解缙的故事中明白，要不受欺侮，必须自己有真本事。可见父亲的用心何其良苦。

王梓坤父亲第二次回家时，王梓坤约 10 岁，这次父亲主要是教他打算盘，把父亲当店员的技艺教给王梓坤，他父亲是算盘能手，可以双手同时打算盘。父亲教给他乘、除法，斤两换算，还教了“飞归”（开方）。王梓坤对这些，一学就会，可惜以后没用，现在也忘了。

4. 埋头苦干

1940年下学期，王梓坤正在固江读书，在第三中心小学寄宿。有天，忽然有人告诉他："你爸爸生病回来了，现在正在镇上'918'商店"。王梓坤马上请了假，跑向"918"商店。父亲坐在凳子上，脸上十分消瘦，王梓坤叫他，他只是有气无力地答应，没有一点精神了，渐渐地闭着眼睛，昏昏欲睡，坐着坐着，忽地一下摔倒在地。王梓坤扶也扶不住，这时兄嫂也来了，大家一起把父亲抬回枫墅村。父亲病得很重，已不能吃东西，请来医生，也毫无办法，过了几天，就不行了。王梓坤守在父亲身边，父亲对他说："你要自强，要努力争气。""要埋头苦干，埋……头……苦……干。"说完两个"埋头苦干"就去世了。

"埋头苦干，埋头苦干"就是父亲给王梓坤的遗嘱。这是一个饱经风霜、备受艰辛、尝够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人的切身体会，这是一个农民、雇员的人生经验和总结，虽然通俗，但并不肤浅，它和历史上古今中外的俊杰、名流的人生经历如出一辙。

>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
> ——《孟子》

>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
> ——高明《琵琶记》

>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在那崎岖山路的攀

登上不畏劳苦、不惧艰辛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幸福不过是梦，而辛苦才是现实。

——法·伏尔泰

这些古今先贤的箴言，不都是强调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重要？人类自从产生以来，就要苦干，就要与天斗，与地斗，与其他动物斗，甚至还要与人类自身斗。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创造，就是人类一部搏斗苦干的历史，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苦干奋斗的沉重代价。而由于不断地埋头苦干，人类才赢得美好文明的今天，并将得到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对于人类的每一个体，也是这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境遇，全在于自己埋头苦干。拿破伦是这样，匡衡是这样，马克思也是这样。任何伟大的人物是这样，平凡的人也是这样，历史上无数的事例皆证明了这一点，王梓坤以后的成功更是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时幼小的王梓坤，虽然并不全懂得“埋头苦干”的深刻内涵，并不知道这四个字凝结了父亲一生的多少酸甜苦辣，然而他懂得，这是父亲对他的最重要的遗言。一个人在生命就要结束的时候，有千条万条放不下的心事，而集中起来，只说出这四个字，也许王肇基先生在感到自己生命之火就要熄灭之时，前几天，甚至前一个月，他就在考虑，对自己可爱的儿子，应该说些什么，他自己盛年夭折，是如此的不幸，他还没走完正常的人生历程，儿子还没有长大，世界在小儿子面前还是一片洪荒，叫儿子怎么迈步走出这一片洪荒呢？以他自己的一生经验，他认为最好是这四个字了。

是的，正是这“埋头苦干”四个字支撑着王梓坤的一生，王梓坤成长的每一个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无不是埋头苦干的。没有

饭吃、没有衣穿、没有钱交学费，他埋头苦干。没有路费去长沙考大学，他埋头苦干。在武大除吃饭以外，另外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他埋头苦干。在苏联留学，他埋头苦干。在南开陋室里，他埋头苦干。在“文革”期间，他埋头苦干。到北京师大当校长，他埋头苦干。以至今日，到了垂垂老矣的古稀之年，他仍然在埋头苦干。

父亲溘然长逝，对于王梓坤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全家都沉浸在悲痛里。父亲是支撑全家的顶梁柱，父亲死了，全家就失去了支撑，将如何能在这个苦难的人世上占住位置。父亲也太累了，他长期地一个人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把自己的一切精力，一切爱都付出在这个五口之家中。为了这个家，他不远千里去湖南为人作嫁，做牛做马，而惨惨劬劳，不遑起处，担负着一切烦恼和忧愁，忍受着无限的艰难和困苦，一年不能回来团聚一次，心中的话儿无处可诉说，沉重的精神负担得不到慰勉，伤心的眼泪只能往肚里落。这是何等的痛苦又痛苦啊！父亲分明是累死的啊！无穷的役使，疲劳的奔波，使得他心力交瘁；不尽的困苦，无穷的忧虑，使他像流干的河水，再也涌不起一个波浪，像烧完了柴火，再也闪不起一个火星。从此王梓坤失去了父亲的庇护，父亲慈祥的爱，父亲热情的教育和鼓励。一个幼年丧父，对于整个人生将意味着什么，那是用不着多加想象就可以完全知晓的。在一个以男子为中心为主力的社会人生里，一个家庭没有这个中心，没有这个主力，这个家能成为一个什么样可怜的家，也是可想而知的。王梓坤此时还是一个没有翅膀的小鸟，在嗷嗷待哺，将何以能长大，何以能展翅飞翔？更不用说心灵的孤苦无依了。当父亲躺在床板上不能再说话而双眼紧闭时，王梓坤的眼泪就像泉水般地涌出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真是瞎了眼，不然为什么这样残酷无情？为什么这样反常违理？难道天命注定

我王梓坤必须孤苦吗？难道我王梓坤只有在困苦的环境中艰难地磨炼吗？

两天以后，当父亲的灵柩在哭声嚎啕和鞭炮钝响声中抬向村外去埋葬时，王梓坤哭得更伤心了。他和母亲一步步地在地上踉跄，已没有力气站住了。村民们只好扶着他们娘儿俩，到了墓地，王梓坤爬在墓穴旁，不准人们将父亲埋葬，母亲已哭得呼天抢地、披头散发，不成人形了，哥哥嫂嫂已哭得声嘶力竭，跪在地上不能起来了。村里人的同情和悲哀的气氛笼罩整个枫墅村的里里外外，笼罩着墓地方圆的一片广大田野。母亲毫不犹豫地送父亲的灵柩去墓地。全村都感动了。按照我国汉民族的传统习惯，妻子若送丈夫的灵柩到墓地，就表示自己矢志不嫁，她从今以后决心艰难地支持着这个家，决不让这个家破碎。这对于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来说，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虽然现代社会已不再提倡为夫守节的封建礼教，但是王梓坤母亲如此的心志，对王梓坤的成长来说，将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的，她这个脾气刚暴的女人，原来个性也是这样刚毅。为了儿子，竟如此毫不迟疑地去做出人生中最大的牺牲。难道这个女性，还不可敬可爱吗？

父亲死后，王梓坤家里已完全没有钱了，已无法交伙食费在固江小学读寄宿了，就只好走通学。走通学谈何容易，10华里的路程，其中有5里山路，山上森林密布，狐狸、豺狼出没。他母亲实在放不下心，就要王梓坤不读书了，在家里帮助干些农活，等长大了，就凭王梓坤现有的文化知识，也可以到城里去给老板当店员。母亲将王梓坤叫到身边说："福伢子，我看你这个书就莫读了，你爸爸去世了，我们没有钱给你交学费了。"王梓坤说："娘，我走通学。""走通学！10多里路，路上尽是山，你就不怕野狗吃了！""我不怕，娘，我带一根大竹棒子打野狗。"

“不行，你不怕，娘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叫娘怎么活呀。”这样三番五次地争论，母子俩各执己见，虽然互相理解，但是各不相让。还是聪明贤慧的嫂子有办法，她说：“娘，我每天早上早点起来煮饭给弟弟吃，并且每天再送弟弟过山，下午又去接。”母亲说：“这个办法倒好，只是太辛苦你了。”嫂子说：“这有什么辛苦，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来就是。”“好吧，照你说的做吧。”

嫂子比王梓坤大 15 岁，可谓长嫂当母，这个嫂子的确不是一般的嫂子，中国农家妇女的优秀品质都集中在她身上。她那种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伟大自我牺牲精神，她那种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无限宽容别人的品德，明显地反映中国农民的忠厚、老实与赤诚。她对这个聪明可爱的小弟弟，不仅有一种兄弟姐妹般的亲情，而且体现了一种伟大的母爱。这个弟弟太小了，小得可以作自己的儿子，而且这个弟弟实在又太可爱了，他是那样勤奋努力，那样听话，从不挑剔什么，对兄嫂又是那样的尊敬，兄嫂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她觉得自己没读书，不识字，丈夫也读书不多，只能靠租种别人的田土过活，成年累月在泥里水里劳累，而永远无法摆脱贫穷。这个弟如此聪明，又如此好学，说不定会有出息。自己做为长嫂有责任有义务为弟弟的成长做出牺牲。凡是为弟弟成长的事，乃至这个家庭的一切事情，她都愿意承担，任何困难她都忍受。

第二天早晨，5 点钟左右，嫂子就起了床，将饭菜做好，还没到 6 点，叫王梓坤起来吃饭，并用一个竹筒做的饭盒，装了饭菜给王梓坤做中餐。天刚亮他们动身去上学，出门不久就走进一片黑黑的树林，嫂子手里拿着一根大竹棒，王梓坤背着书包提着饭，同时也拿根竹棒。一方面为了防止野兽的袭击，二方面可以当拐棍帮助走路。大约 20 分钟，才走出树林山路，前面有个小

宝塔，在宽广的平地上，嫂子说："我就送你到宝塔边，下午再来这里接你。"王梓坤表示感谢，叫嫂子往回走，但嫂子一直站在塔边看着他走，走远了，嫂子才往回走。下午放学回家，走了4里多路，果然见嫂子在宝塔旁等待他，王梓坤十分感动。嫂子陪伴他穿过树林，确实心里有些紧张，秋天的太阳下山很快，到家时已是黄昏了。

一年多来，都是这样由嫂子接送，不管刮风下雨或霜雪冷冻，他们都是按时起程，从不耽误，王梓坤从不迟到，这是王梓坤遵守校规的好作风，但嫂子的接送实在是立下了大功劳。

这样走通学确实不容易，不用说山上树林里有蛇，有狐狸，有豺狼，甚至有人说山里有过老虎，不过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老虎，只是碰到几次豺狼，那家伙见人拿了器械，还是不敢近前的，只是在前面装模作样吓吓人罢了。

最难的是大雨天，春天南方雨水多，夏天又多雷雨，枫墅村到固江之间有一块很大的平地，在平原上遇上雷雨很吓人，就像在你身边不远的地方闪电、炸雷，又刮大风下大雨。王梓坤说，有一次晴天下大雨，他打的伞根本顶不住，衣服全淋湿了，但他不能后退，一口气坚持到学校。幸亏老师同学关心他，借了衣服给他换，班主任还为他烤干了衣服。

然而，10里走通学也有好处，锻炼了身体，锻炼了意志，还有无穷的乐趣。春天山林里一路野花照眼，香气袭人，空气特别新鲜，夏天田野里的禾苗抽穗扬花，稻花的清香，青蛙的蹦跳，秧鸡的鸣叫，是十分迷人而怡情的。有一天，嫂子刚送他出了树林，就因事急着回去了，王梓坤一人往前走，到塔边，看见一个须发全白的老头向他招手说："伢崽哩，你到哪里去，吃了饭么?"王梓坤说："我上学去，吃了饭，您老人家吃了没有?"老头说："我没有吃。"王梓坤见这老头一副很可怜的样子，就将

自己手里提着的“中饭”给他吃，老头全没推辞，就大口大口地吃，很快就把饭吃完了，然后把装饭的竹筒还给他，谢谢都没说一声，王梓坤感到很奇怪，村里有好多老人，他都认识，这个老人怎么没见过，于是想仔细看看这老人，然而这老头象一阵风似地不见了，也许他走得快，跑到树林里去了。王梓坤回家，将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说：“你把饭给他吃了，是好事，我看这老头不是凡人，是土地菩萨。他看你可怜，他来保佑你，你不要怕。”第二天母亲特意另外装了一碗饭，叫王梓坤给那老头吃，但再也没有碰上这老头了。

王梓坤跑通学的事在枫墅村传开了。一年后王梓坤读6年级时，同村的王顺纪、王崑山和王楚真同学也走通学，于是他们3个人有了伴，互相帮助，一路有说有笑，好不快活。

5. 也算顽皮

说王梓坤小时候是一个十分循规蹈矩的儿童，有时他也很顽皮，这也许是小孩子的天性吧，尤其是男孩子。

王梓坤在固江小学读书时，有天放学回家，正值夏日炎热，路边有口大水塘，他和两个同学就放下书包一同跳下去游水，一直玩了一个多小时，忘了回家。母亲见天色将晚有些着急，打发嫂子来接，嫂子见塘边有三个书包，分明是弟弟几个人的，但向塘里一看，却毫无动静，连波浪都没有，是淹死了吗？嫂嫂急了，3个人总不会一起都淹死吧！正当嫂子发愣的时候，他们三个一同钻出水面，哈哈大笑，弄得嫂子又惊又喜。原来是他们见嫂子来了潜到水底不动，有意吓嫂嫂。

有次放学，他和几个同学在路上碰到几个穿黄衣服的大兵，开始他们害怕，怕大兵会把他们抓走，但是逃走也已经来不及了。谁知这几个大兵却很和善，向他们招手说："小学生，来，来这儿歇一会儿。"这一下就缓和了气氛，他们好奇地走近大兵，大兵摸着王梓坤的脑袋问："读几年级了，学习好吗？"一个同学说："他读六年级，成绩顶呱呱的，第一名。""小弟弟，真了不起呀，比我们读书多，将来一定有出息。"这下王梓坤心里完全不紧张了，他看着当兵的那支枪，真可爱，手痒痒地想去摸，大兵说："你喜欢枪吗？想当兵吗？不！将来要当官，当兵才可怜了。"王梓坤说："叔叔，我最喜欢枪了。"于是边说就边去拿那支三八式的步枪，学着当兵的样子抬起枪，对准一个同学，口叫："投降，缴枪不杀！"那同学毫无服从表示，他就扣动扳机，口喊："叭，叭，叭。"那当兵的急了，马上将枪夺过去，看了看说："哎呀！幸好我上了保险机，枪没响。不然，就打死人了。那我们几个就倒霉了。"吓得王梓坤不知如何是好，他现在回忆这件事，还心有余悸，他说："幸好没响，要是响了，我的命运就不是这样了。"

王梓坤还有一个小弟弟比他小5岁，十分聪明伶俐，怪可爱的。但很爱哭，又总是缠着他讲故事，要他做这个做那个，就象他的尾巴。有个这样的弟弟诚然幸福，但年纪相差太大了，兴趣相差太大了。王梓坤要看书，每天抓紧时间看书，所以弟弟天天缠着他不放，实在是个累赘，他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总是拿弟弟没办法，他只好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来对付了，每当弟弟缠着他不放的时候，他就打弟弟的屁股，打得弟弟哭，哭累了就睡觉，这下他就好看书了。弟弟一天天长大，也实在可爱，没想到有一天，一个晴天的下午，他和妈妈在磨面粉，弟弟在旁边玩耍，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弟弟跑出去了。他们也没注意，等他

们磨完了面粉，来寻找弟弟，却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听有人叫弟弟掉到塘里了，赶快捞上来做人工呼吸，已经不行了。王梓坤十分伤心，以后和小朋友一起玩，总是想起弟弟，有时暗然神伤，有时眼泪夺眶。

枫墅村紧靠着一片山林，节假日小朋友都上山放牧或砍柴，这些人大都是枫墅村和固江小学的同学，他看过《西游记》，对孙悟空十分敬佩，他想孙悟空的本事也是修炼出来的，从中悟出一个大道理，只要自己好好炼，学问和身体都可以炼出好本事。他一到山里，就带领小朋友爬树，他身体瘦削、轻巧，爬树最快，又爬得最高，小朋友们更佩服他了，公推为“大王”。王梓坤说：“我不当大王，当大王不好，应该象朱元璋那样广积粮，高砌墙，不称王，我只愿意当军师。”于是小朋友们就推他当军师，他们常常搞军事训练，打野仗，抓俘虏，不过王梓坤决不上前去动手，而象诸葛亮一样的军师，指挥大家打仗，等那些“将军们”抓来了俘虏，就来审讯。饿了就叫大家去弄吃的，树上鸟窝里有鸟蛋，山树上有野山楂、野酸枣、板栗、苦珠子、野柿子，花样繁多，弄来大家一起吃，多么有味道。

在小学读书，王梓坤无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他偶尔也会调点皮，不经常地流露出他天真童心。在固江读书的时候，他班上流行一股取外号的风，根据各人的特点，起浑号，譬如叫瘦人为猴子，或美猴王，胖的叫大黑熊、大肥猪，个子高的叫南岳山，性情急躁的叫李逵，肤色黑的叫黑旋风，脸红的叫关公等等，叫浑号本来是一种玩笑，互相关系很好的叫浑号有亲切感，但是有些浑号也含有不雅的一面，有嘲笑的成份。所以这个问题被老师发现以后，校长在全校集会上宣布，以后谁叫浑号，谁就要受处罚。处罚有各种各样的；罚站、罚跪、打手板、记过等等。王梓坤从来没有受过处罚，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只当这是

小事一桩，过了一段时间，取浑号的风也已淡化了，他似乎也忘记了校长的警告。他班上有个同学很胖，不仅脑袋又大又圆，而且耳朵又大又长，身子也圆滚滚的，且皮肤是白白的，真象妈妈养的那头可爱的大肥猪，他越看越觉得好玩，就情不自禁地叫大肥猪，大肥猪。有一天，他来校最早，就用纸写了“大肥猪”三个字，贴在那同学的课桌上，那同学看到好气，马上气冲冲地去报告老师，老师一看，很明显是王梓坤的手笔，就把王梓坤叫来询问，王梓坤满口承认，老师也没多说话，即要王梓坤伸出手来，拿竹板打了几十下，打得手都肿了，几天都痛得难受，好在是左手，不影响写字，不然这几天的作业是无法完成的。

还有一件事，王梓坤显得有些顽皮，他的前面坐着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很爱打扮，娇里娇气，同学们都有些看不惯，王梓坤也有些讨厌她。有一天，王梓坤把她的坐凳一只脚下面的泥土挖掉，她没有发现，坐上去跌了一跤，弄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事后他又觉得自己做过头了，实在不该。

王梓坤少年时期的调皮故事，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他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独特追求。小孩子犯错误固然是不好的，但全不许他犯错误，就培养不出开拓性思维的人才，而只能培养谨小慎微的君子，无所作为。

迎难而进

第二章

1. 借光苦读

光阴荏苒，1942 年，王梓坤在固江小学毕业了，这对家境贫穷的他来说，意味着读书求学阶段的结束，他家里实在无法再供他读书了，他家仅租种地主的几亩田，交了租已所剩无几，一家四口吃饭都很紧张，兄嫂虽然年轻力壮，母亲也很健康，但当时处于穷乡僻壤的枫墅村，人们有力无处使，找不到一点可以增加收入的门路，只能在田地里打转，他母亲早已不同意他读书了，还能让他继续升学么？兄嫂也是爱莫能助。

在放假前几天，同学们都谈论着如何去考初中的事，王梓坤在一旁默默无语，情绪很低落。回家以后，整个假期他都闷闷不乐。他真羡慕好些能够升学的同学。

王梓坤自从父亲死后，家境每况愈下，他能够读完小学，已经很不错了，莫说考上了交不起学费，连去报考所需的费用也没有。可是王梓坤

不甘心，陷于极端的痛苦之中，他就象一只落荒的小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只在黄昏的天空中徘徊，又好象一叶折了风帆、坏了橹板的小船，随波漂流，不知漂向什么地方。

考期一天天接近，王梓坤心中愈来愈焦急。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一天晚上，他梦见父亲，从湖南带回来一笔钱，给他去读书用，他高兴得跳了起来。突然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王梓坤心里更加悲哀了。

几天来，兄嫂多方借贷也借不到，那些有钱的人家，认为他们借了还不起，那些同情他们的人又穷，爱莫能助。没办法，只好看看家里有什么东西可卖，当时农村是除了粮食就没什么可卖的，兄嫂打算卖些稻谷，母亲坚决不肯，况且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卖掉了明年怎么度荒。后来想到家里有一床毛毯，是父亲从湖南带回来的，大家舍不得用，放在衣柜里，还有一把铜水壶。这两样东西值几个钱，另外嫂嫂出嫁时得的2块银元，上次王梓坤去固江读书用了一块，现在还有一块。考试前几天，兄弟俩去吉安城里卖东西，瞒着母亲去的，那天趁天未亮母亲还没起床，嫂嫂做好了饭，让他们兄弟俩吃了上路。兄弟俩来到吉安城里闹市一带叫卖，那把铜壶卖得还顺利，价钱还好，但那床毛毯，卖不上价钱，因为商店里毛毯多的是，要卖就得折价，但折价太多又划不来。兄弟俩一直想等能出较好的价钱的买主，等到中午过了，他们还在等。忽然有个人走来，拍了拍王梓坤的肩膀说：“福伢子，你们兄弟在这做什么？吃了饭没有？”原来是欧阳伯康大伯，是父亲的朋友，家住离枫墅不远，约10里路，他是在湖南做生意的老板，曾几次邀请父亲给他帮忙，只因为父亲和原来老板也很要好，不好辞退，而作罢。王梓坤马上说：“大伯您好，我在这儿玩。”但欧阳伯康看见王森财手里拿着一床毛毯，就引了疑心，用目光扫视他们。王森财说：“不瞒大伯说，我弟弟要

上学了，想卖掉毯子去凑点学费。”欧阳伯康说：“嘿，一床旧毛毯能卖几个钱，能交起学费么?”王森财说：“我们只想凑几个算几个，我父亲去世了，也弄不到钱了。”“哎，你们怎么不早说：交学费一共要多少钱?”王森财说：“还不知道要多少，据说要8块银元。”欧阳伯康从袋里摸了摸，拿出8块银元：“这几块你们就拿去用吧，若少了再来我家拿。这几天我正好在家。过一段时间我就去长沙了。”王梓坤说：“大伯，这……多谢大伯愿意借给我，我将来一定还给大伯。”欧阳伯康说：“借什么，要还什么。帮这点忙算什么，我和你们父亲很要好，他去世了，你们有困难，我应该帮助，只是太少了。”王梓坤兄弟不好意思接受。欧阳伯康硬要他们收下，同时又另外拿出几张纸币说：“这点钱，你们拿去买饭吃，我还有事，没时间陪你们兄弟了。”他又拍着王梓坤的肩膀说：“福伢子，你是个好学生，既聪明又发愤。我早就听说了，你好好读书嘛，古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会读书，一定有出息啊，交学费有难处，就来找我吧!”兄弟俩对欧阳伯康大伯万分感激，他觉得真是遇到天上的福星下凡了，这下子王梓坤升学的问题解决了。

有了钱，报名，交学费。王梓坤就顺利地考入了吉安中学，学校开始在吉水县，后又搬到遂川县藻林，最后迁到吉安市白鹭洲。白鹭洲在吉安市，是赣江中间的一个沙洲，因办学历史悠久而出名。据说这里原是白鹭洲书院，是文天祥的老师、当时吉安府知府、后来当南宋宰相的江万里创办的，文天祥在这书院读过书，此后一直作为吉安的学府不断培养优秀人才。洲上环境十分幽雅，校舍是一所四合院加上几栋楼房组成。洲长约有2里，宽约1里，洲上树木葱郁，浓荫匝地，与四周的碧绿江水和谐地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白鹭洲与吉安市城区有200米的江水相隔，城市的喧闹声影响不到洲上，成了世外桃源。早晨太阳升起的时

候，阳光照着洲上的树林，随风轻飘，好象一群披上了纱巾的少女在婆娑地频频起舞，伴奏的是赣江水面上机轮的突突声和不时鸣叫的汽笛声，及水波的响声，组成一曲别致的乐曲。白天强烈的太阳照在水面上时，闪耀着十里金光，有如一条金鳞耀眼的巨龙在跳跃欲飞。而落日的余晖照着白鹭洲，则形成无数斑烂的色彩。此时师生成群在洲上漫步，如置身在花团锦簇之中。如此优美的校园环境，使王梓坤开拓了眼界，对前途充满了向往。这里的老师都是全省有名的优秀教师，有“八大金刚”之美称。这里的同学来自全地区各地，有不少是外县来的，王梓坤感到一种新奇感，幸运感，这里比固江小学好得多。在学习上，王梓坤始终是个强者，进入吉安中学后，每次考试，他都得第一名，而且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然而在生活上，他却是一个处处不如人的弱者，贫者。他穿的、用的都差得简直不敢让人看见。城市的学生，一般比农村学生穿得好得多，当时，有的穿学生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长袍，有洋布做的，有线卡、纱卡做的，样式也比较新颖，特别是女同学，穿彩色裙子，好漂亮。只有王梓坤，穿的是土布衣，布是母亲自己纺的线自己织的土布，染成黑色或灰色，而且由母亲自己缝成的对襟布纽扣的普通平民装。穿这样的衣服，在固江小学还过得去，到了中学，就显得十分土气，真是一个十足的乡巴佬。其次是晚上自习，因当时学校是用煤油灯照明，油是个人用钱买票自备，王梓坤哪有钱买煤油，所以晚上无灯自习，只在一旁默记英文生词。班主任高克正老师看在眼里，马上将王梓坤安排在一个姓刘的同学那儿坐，开始这同学还欢迎，过了一星期，渐渐显得有些厌烦。王梓坤是绝顶聪明绝顶敏感的人，一见苗头便主动退出，又回到自己的坐位上默背英文。这时同班另一个姓张的同学马上叫他去，本来他们有两人共一盏灯。这样就三个人共一盏灯了。显然有点影响，但这两个同

学很厚道，他们在一起很融洽。每天都是他们安排好灯油，并将灯盏靠近王梓坤，王梓坤眼睛相当好，常常故意远离一点，让他们两个多照些光亮。这两个同学的学习不如王梓坤，每有疑问，王梓坤总是耐心给他们解答，成了他们的小老师。在王梓坤的帮助下，他们2人半期考试考得很好，他们二人也毫不讳言地说："这是王梓坤帮助的结果。"此话在班上传开了，于是大家争相邀请王梓坤去他们的灯下学习。没办法，他只好轮流着坐，甚至有几个思想开通的女同学也请他去共灯，他却不好意思去。王梓坤对同学的热情和友爱十分感激，也十分自豪，他常常自称"我是借光的匡衡"。实际上与其说是王梓坤借了同学的光，倒不如说同学们借了他学习好的光。

还有一件事，要说一说，王梓坤的洗脸巾不是同学们使用的那样漂亮的毛巾，而是一块家织土布，就是妈妈给他缝衣服剩下的土布，这样的洗脸巾实在拿不出去。他洗脸时，常常远远的在一边洗，洗完就挂在寝室的角落处。谁知有一次大扫除，有几个同学打扫寝室，以为他的洗脸巾是抹布，拿去擦窗子。王梓坤发现了，也不好做声，只好等大扫除结束了，拿到河边去好好洗干净。真是无可奈何，哭笑不得。

最使王梓坤为难的是学费问题，第一个学期有欧阳伯康先生支援，倒也勉强够了。第二个学期，就为难了。欧阳伯康已经到湖南去了。他不好意思再去借。怎么办，休学不成？他鼓起勇气去找高克正老师，高老师知道了他的情况，二话没说，就带他到总务处去，给他写了个欠条，对他说，"你照样地读书吗，等以后弄到了钱再来交吧！"当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得厉害，开学的一担谷钱的价值到期末只值一碗面钱，就容易交了。他就是这样，度过了学费难关。不仅这个学期，以后每个学期都是这样。由高老师给他写欠条过关，而学校领导因他成绩实在优异，也就

睁只眼闭只眼，有意关照他。

高克正老师，是一位中年女教师，语文教得很好。她常戴着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一副严肃的脸色，走着缓慢的步子，很少讲话。乍一看来，的确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但其实是“色厉内荏”，她对学生是十分和蔼可亲的，很是关心爱护学生，特别是对王梓坤这样学生，更是倍加关怀。王梓坤后来回忆初中阶段岁月说：“每逢期末，我心中总是充满了忧虑，为下学期的学费发愁，不知能否继续升学。一开学时，我只好忧心忡忡地去找高老师，请她允许我缓交学费。高老师深知我的困难和学习成绩，总是毫不犹豫地批准。就这样，在她多次的帮助下，我才有幸念完初中。”（《百年树人亦英雄》）

2. 考中了

1945 年冬，王梓坤 3 年的初中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北风呼呼的严冬岁月来到时，学校对毕业生进行了毕业考试。王梓坤此次每科的考试成绩都是十分优异的。在毕业典礼的大会上，校长特别对王梓坤进行了表扬，然而这个优秀毕业生，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原因是拿毕业证书要交几块钱，王梓坤没有钱，拿不到毕业证书。

当王梓坤到班主任高克正那告别时，一方面对高老师怀着十分难舍难分的心情，一方面又十分惭愧，自己没有钱拿到毕业证书，这是很不好意思的事，高克正老师也为此事很难过。

放假那天，王梓坤的哥哥来接他，帮他挑行李回家。王梓坤的行李很简单，一床薄棉被，一只木做的旧箱子，那箱子是他家

祖宗传下来的，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箱子里面放的是王梓坤自己的教科书，还有一些同学看完不要了送给他的旧小说。这些东西，王梓坤把它们看作至宝一样好好保存着。因为他深知，这以后，他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进学校读书了，这些书将会成为他以后生活的最好伙伴，他会把这些书一次又一次地认真阅读的。

一路上，王梓坤十分伤感，他舍不得学校，舍不得白鹭洲那美好的环境，舍不得那么多爱他的老师，尤其舍不得班主任高老师和那位校长，他们是他的良师，是他尊敬的崇拜的偶像，如今却要离别了，以后难有见面的机会了。还有那些可爱的同学，这3年与他生活在一起，大家都互相爱护互相尊重，如今各奔东西，也无法再见面了。当大家离别的时候，一个个心里都象堵着什么似的，十分难受。然而也有的强颜欢笑，“男儿有泪不轻弹”么？几个与他很好的同学与他谈到今后的打算时，他们都说还要继续读高中，王梓坤家里这样穷，再也没有办法读高中了。然而他又不死心，因而对打算继续念高中的同学十分羡慕，心里又十分难过。自己本是学习上的优胜者，以往在同学们中间都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而今后，同学们都能继续深造，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将会由一个强者变为一个弱者，以后处处将落后于同学们。

此时他想到这些，心中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和悲伤情绪。他只埋怨自己的命不好，埋怨老天爷瞎了眼睛，为什么会让父亲去世，不然自己就还会有继续读书的机会。

天道是这样不公平，社会是这样不合理：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少年人，往往不想读书；而想读书的少年，又因家庭贫困而无法上学。天啊！为什么让王梓坤这样小小的年纪就要有这样的思想负担，要是一个无心向学，甘于愚昧的人多好。

回到家里后，按理王梓坤应当是高兴的，因为他毕竟读完了

初中，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十分不简单的了，换了别人，这样也就满足了，然而王梓坤却心比天高，只希望能有机会读更多的书，只想实现这个无法实现的愿望。这个假期，他度日如年。以往他在校念书时，一到假期正是多读书的好机会，因而十分愉快，时间也过得飞快，而这个假期，他虽然也在看书，但是总觉得没有意味，书本不像以前一样令他感兴趣了，他只感到一种失落。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到底还要读多少书，王梓坤自己还不清楚，心里只有一个朦胧的感觉，只觉得自己读的书太少，不用说与吉安中学的老师相比，就是与固江中心小学的老师相比，与枫墅村小学的王少诚老师相比，他也是少得多啊。读书做什么？只想做一个老师，做一个象王少诚先生那样的老师，每天按时从家里走到学校，一本书，一壶茶，一袋烟，过年过节喜庆时，村里人请他在席上坐，对他很尊敬，也就够了。或像高克正那样的老师，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能这样真不错啊！但是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他只能在家里劳动，每天早晨一大早起床，踏着露水赶着黄牛去山上放牛，上午则跟着兄嫂，在田间干农活，车水、收割，样样都得干。烈日当头热辣辣地晒着，暴雨倾盆哗哗地淋着，狂风猛烈地呼呼地刮着，未到收工，已是饥肠辘辘，精疲力尽了。脊背弯得僵硬，简直难以伸起。休息时，便想睡在田埂上不再起来。有时干农活时豆大的汗珠将衣服湿透了，连热辣辣的太阳也无法把衣服烤干；有时晚上回到家里，腰酸背痛，吃过饭，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晴天总是没有一点空闲地忙着，只有某些下雨天才有一点时间看书，或到邻居家里走走。王梓坤此时心情不佳，看书的兴趣已不如从前。尽管如此，但是对他来说，也只有看书，才能打发时间，他将自己仅有的一些书，读了又读，抄了一遍又一遍，许多地方都能背诵下来，同村的同学王淦生、王寄萍不时到他家来

玩，带一些借来的小说给他看，他也不时地到他们家里去读书，互相交流读书的感受。

一天，王寄萍来到王梓坤家里，告诉王梓坤在吉安青原山有个办了不久的国立十三中学，有高中部，考上后不用交学费，连吃饭也包了。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王梓坤听后又忧又喜，忧的是想到自己没有初中毕业证书，怎么能有资格去参加考试呢，喜的是毕竟又有机会可以读书了。但是，要到吉安参加考试，吃住费怎么解决呢？王梓坤对王寄萍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我没有钱，文凭也拿不到！"王寄萍说："这没问题，我爸爸给了些钱让我去考试，估计还有多余，你的文凭由我出钱帮你拿回来，一路考试的费用，也都由我包了，我们一同去考，还有邻村的罗嵩森同学，我们3个人同行，过几天就动身。"

王寄萍素来是个爽快的好心人，言出必践，这一次他说资助王梓坤去考高中，王梓坤心里十分感动，但他满腔感激无法表达，只好对王寄萍说："寄萍兄，那就太谢谢你了。"王寄萍听了王梓坤的话，说："梓坤老弟，不用道谢，我看着你不能继续读书，心里也实在难过。"

王梓坤将王寄萍资助他考十三中的事与哥嫂商量，哥嫂听后十分赞成他去。细心的嫂子还嘱咐王梓坤说："梓坤，这事要瞒住母亲才好，不然他是绝对不会让你去的，她总以为读书多没有用，不如早点出来做事挣钱。"嫂子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3人商量好，对母亲就说吉安招邮电工人，王梓坤和王寄萍等3个是一起去考邮电工人的。

母亲为此十分高兴，那天杀了一只鸡，祭了祖宗，希望能保佑王梓坤考上邮电工人。于是，王梓坤3人上路了，他们到了吉安城，首先到百鹭洲吉安中学，找到了高老师交了钱拿回王梓坤的文凭，然后3个人才一同去了十三中的报名处报了名。紧接着

第二天就开始考试，总共考了两天。考试时王梓坤碰见了原本班上的一些同学，听消息说，十三中的录取要求很高，因为十三中是国家为难民子弟办的，经费由国家负担，主要招生对象是难民子弟，本地人只招一小部分，名额有限，所以特别难考。虽然考完后王梓坤感觉良好，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

一天傍晚，王梓坤正在家里看书，然而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仿佛还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忙扔下书本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村里人个个兴高采烈，其中一个年轻人手里还挥舞着一封信，一边跑，一边喊着："王梓坤中了！中了！"王梓坤叫住他，一把夺过那封信，展开一看，原来是国立十三中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村里人围上前来纷纷向他道贺，好像范进中了举一样高兴热闹，王梓坤一再对他们说，不是中了别的什么，是考上了高中，他们却说："管他是考中了什么，总是有出息了！"他妈妈先以为是考上邮电工人了，后来得知是考了高中，很不高兴，等得知是不要交钱的高中，她又高兴起来了。

王梓坤这次考上国立十三中，可说是他生命中一次大转机，也不知道是他命里注定有继续深造的机会，还是某种机缘巧合所促成的。总之，这对王梓坤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当然，他为此特别感激王寄萍，是王寄萍帮他走出绝望，而走到希望的彼岸。没有王寄萍的帮助，王梓坤可能就只能做一个没有毕业文凭的初中生，中国数学界也就可能不会有他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了。王梓坤对王寄萍的帮助可说得上是没齿不忘的，虽然后来他上大学，在大学任教，出国留学，成为数学家，一步步踏上人生的光辉历程，但总是没有忘记王寄萍对他的帮助，不论是在与朋友交谈时或是面对记者的采访时，还是在自己的有关文章中，他总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谈到王寄萍。

3. 见山不是山

国立十三中是一所十分特殊的学校，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因为它出现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日本人侵中国，人民四处逃难，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以拯救民族危亡，前方将士与敌人生死搏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着祖国领土，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保卫每一寸土地，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何等地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动人事迹将永垂于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同时有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保卫祖国的优秀文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使祖国科学事业后继有人，他们也费尽了心力。当时，祖国的山河在沦丧，科学文化被摧毁，大批的青少年在流亡中得不到正常的教育，为了在一定范围内不让战乱影响祖国下一代的成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想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由国家出资办校，招收流亡中的聪慧的青少年，使他们有机会得到很好的培养，战时可以成为战争中抵抗外来侵略者的优秀的后备力量，战后又可以很快地担负起恢复祖国建设的重任。这个建议，是十分具有远见卓识的，得到了政府的采纳，并很快付诸实施，创办20余所国立中学。

国立十三中的特殊，还在生源方面，这学生来自祖国各个地方，天南海北，各省各地都有，只要成绩优秀，能通过入学考试就行，不分地域，不论贫富贵贱，一律以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第3个特殊的地方，是学校的师资力量好。凡在此校任教的老师，也是来自全国各地，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还有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大都是知识水平很高，教学能力很强的优秀教师，不少人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有些人是当过大学教师，或从事过文艺新闻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国立十三中的领导级别很高，不归属地方政府领导，而直属于中央政府。所以，国立十三中是一所十分特殊而质量很高的学校，可以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国立中学的功绩很大，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能够考上国立十三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招生，既不用交学费又包吃住，所以许多外省外地的优秀学生都不远千里来报考，被录取的希望只有百分之几。

王梓坤能够考上国立十三中，乃是他一生中一大幸事，他不但从此不用再为交学费和膳食费而发愁了，还可以受到第一流的教育。

国立十三中校址位于吉安县城郊十里许的青原山净居寺。净居寺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寺院，唐代神龙年间（公元 705 年），曾被封为庐陵王后当皇帝的唐中宗李显在青原山建寺，命名为“安隐寺”。唐开元年间（公元 713 年）禅宗七祖的行思禅师，来到青原山，秉承六祖衣钵，在此讲经传道。后来行思圆寂，由唐玄宗“敕赐建弘济禅师归真之塔”于青原山，即建塔埋葬行思禅师，从此青原山名扬四海，到了宋代时，宋徽宗改名为“净居寺”，成为佛教圣地。

在这样一个好地方创建国立十三中，本身就是有很浓厚的文化意味，且不说国立十三中其他方面的条件了。

王梓坤踏入国立十三中，犹如踏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美丽迷人的世界。首先，是那里的自然风光十分迷人，净居寺所在

的青原山，可以说是一座典型的秀丽的雄奇的江南名山，整座山就好像一幅幅翠绿生辉的画屏，呈现出马蹄形的山势，从三面围绕着的是一片平野，一片田畴。山上绿树丛丛，山石嶒嶝嶙峋，平野上绿草如茵，山脚下有绿树掩映着古寺庙的建筑群，那逶迤的山势，如龙盘虎踞，那曲折的小溪，流淌着一股由山脚喷溢而出的清泉，如泻琼漱玉，如鸣珮琼。还有小桥，有水坝，有飞腾的瀑布，水声潺潺，浪花飞溅，合唱着一支动听的歌。

那古寺庙群，飞檐翘瓦、耸翠流丹，掩映于绿丛之中，格外清幽，格外飘渺，格外古雅，更有古韵悠扬的钟声，叫人忍不住驻足聆听，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个别有天地的美丽世界。来到这里，人们会忘掉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和不幸，一切的苦闷、忧愁都随着古寺悠远的钟声烟消云散了，什么贫穷、困苦、坎坷、失意，都会置之度外，也不知道何谓过去，何谓现在，何谓将来，什么也不会多想，什么也不会多说。什么名利、嫉妒、争夺，都被踏在脚下，踢得老远。哪里有这样安心适意的所在？哪里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在这里，可以一心一意专心尽力地在书海里尽情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飞翔。

这里的老师和同学都有着绝顶的聪明智慧和杰出的学问才情。

校长，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并留学国外，对教育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且为人正派，厚道，礼贤下士，尊师重教，求贤若渴，他千方百计地将许多毕业于名牌大学，执教多年，享誉很高的优秀教师从外地聘来。语文老师中有《论语》、《孟子》的译注者；数学老师中有全省代数的“四大金刚”之一；地理老师中有对中外地理风情深有研究的名人；生物老师中有对遗传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英语老师中则有在外国留学多年并从事翻译工作的名流。真可谓人才济济，各科都有名师。

同学们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认真选择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全班乃至全年级的同学的成绩都十分整齐，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总分差距并不太悬殊，而每次考试的名次也往往动荡不定，除个别很拔尖者以外，大都是有人这次考试名列前茅，下次又跑到了后面，一时这个同学强些，一时又是那个同学强些，不过王梓坤总是第1名，别人不能竞争，在这样的学习的圈子里，大家都是你追我赶，刻苦学习，毫不松懈。

这一切，对王梓坤来说，都是一种幸运，一种激励，他原本聪慧过人，又刻苦好学，从来都觉得“力有余而心不足”，在学习方面好像是一个吃不饱的孩子，他需要大口大口的补充营养，梁山好汉一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才够爽快，他需要用无穷的知识来充实他的头脑，满足这有无限的求知欲望的“贪婪的心”，如今机会来到了。

国立十三中的老师们，向王梓坤打开了更加丰富的知识宝库的大门，更使王梓坤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知识之多，学问之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浩瀚若海，深雄似山”。语文老师懂得那么多，记得那么广，仿佛古今中外无所不晓，无所不通，诗词歌赋文章无一不是拿手好戏，“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通”。英语老师可以全用英语来讲话，似乎比我们讲汉语还来得更顺畅更流利更自如。最令同学们敬佩的要数数学老师了。他讲课是十分精彩的，不仅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能恰到好处地抓住学习中的要点，让同学们跟着他的提示进行思考，对所有的重点难点，往往不点自破，无论同学们遇到什么难题，只要问一问他，他就马上能启发同学们沿着正确的思路去想，很容易顺利地得出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这位数学老师这么厉害呢，只是备课认真、准备工作做得好么？似乎不止这些。有一次，王梓坤和班里有几个数学成

绩最好的同学弄来一本《中学数学难题集》，找了几个难度很大的几何题，等数学老师来上辅导课时，提出来请老师当堂演算。同学们满以为可以难住老师了，谁知数学老师胸有成竹地马上解答了出来，王梓坤和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国立十三中的教学是十分认真的、严格的，每天除了正规的文化课以外，还有军事课，早晨操练一小时，下午也操练一小时。既操练队列，又学习兵器和战争知识。对德育十分重视，经常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国。一方面为抗日战争培养人才，以优秀的人才去挽救祖国危亡，驱逐日寇，誓雪国耻；一方面为使祖国的科学文化不因国难而丧失，以便在抗战胜利后仍有人才，以为中华早日恢复振兴。国立十三中的校训是孙中山所作的名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副对联十分醒目地写在校门口，时刻给师生以激励。学校还经常运用本地历史上的名人事迹为教材教育学生。出生于吉安县的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一个最好的教材，学校不仅组织学生参观文天祥的故乡吉安县富田乡文家村，而且将文天祥的《正气歌》做为国文教材，要求学生们背诵。王梓坤对《正气歌》是十分熟悉的，早在固江小学读书时，他就听老师讲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好诗，读了可以避邪，当夜晚遇到鬼的时候，只要大声朗诵《正气歌》，就可将鬼吓走。只是当时王梓坤古文水平太低，解释不通，有些字也认不得，王梓坤虽然抄起了《正气歌》却没有背熟，现在老师当作国文教材，每一字词、典故都讲得清清楚楚，读起来就带劲了，每当他读《正气歌》就感到精神特别振奋，志气浩荡冲霄汉。而且他又反复抄写好几次，其诗是：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清。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霜。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 ……

文天祥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一种正气。所谓正气，就是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日月星辰运行不息；河流山岳，万古长新，乃是正气的象征，且为正气所维系。在人，乃是一种凛然浩然的不可屈服，不可动摇的精神意志。古往今来，无数英雄豪杰，都由于具有这种浩然正气而品德高尚。《正气歌》概括了历史上无数英雄豪杰的伟大精神品格，激励人们去继承，去发扬。

王梓坤学习《正气歌》，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使他从此思索人生的意义和读书的目的。他觉得以前读书的目的有差失，他原先之所以努力读书，只是为了摆脱贫穷的处境，求得自己有一个好的生活手段。或者说，只对读书感兴趣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目的，从来不知道读书是为像文天祥做一个有正气的人，去报效祖国。如今，他觉得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比读书更重要更高级的

事。那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正气的人。这时候他想起国文老师曾经讲过的，南宋时候，这青原山有一位老和尚，叫惟信禅师讲过的一段名言：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如今得个休闲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见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7）

原来王梓坤对这段话一点也不理解，现在似乎理解了一半。看问题不能停留一方面，应该看到更高、更远，更深，应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国立十三中的学习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没有校舍，师生们全都寄居在寺院“净居寺”里，此寺里一个典型的封闭式四合院的中国古典建筑，房子还算宽敞，但现代新式学校和古典寺庙首先在气氛上就很不协调，身穿学生装的青年男子和穿裙子、短衫的现代女性，与穿袈裟的和尚在一起，恍若隔世。清晨琅琅的读书声，特别是读英语的声音与和尚的木鱼声，念经声，合成一种乱了宫调的大弦嘈嘈与小弦切切混声演奏。晚上，师生们的煤油灯光与佛寺殿上的烛光，香油灯光到处闪烁着，好象有菩萨显灵把天上的星星都洒落在这里了。和尚们反复背诵他们的经书。师生在苦读科学书。他们都在艰苦修炼，又似乎都在嘲笑对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一个蒲团，那是和尚们瞌睡坐禅的地方；用几片木板，架起简易床铺，便是师生们生活的所在。许多学生们穿着也不好，王梓坤穿得更差，一件家织粗布衣，经常穿在他身上。冬天没有棉衣，只有一件旧夹衣，用黑色单衣罩上，十分单薄。同级的罗嵩森同学送一件半新的棉衣给他。他表示十分感谢罗同学的好意，但坚决不接受。他觉得接受朋友的帮助太多了，心里很不安。他

要以自己的努力来战胜困难。一到身子冷了，就去跑步，跑得身上暖暖的。

王梓坤的妈妈为他做了一双布鞋，他觉得妈妈做鞋很不容易，白天在田里劳动，又要做家务，夜晚在油灯下一针针地衲鞋底，多么辛苦，他得爱惜布鞋，平时一律打赤脚，只在夜晚和寒冬天气，才穿那双布鞋，跑步是绝对不穿鞋的，所以在国立十三中学习 3 年，一双布鞋还没穿破。

4. 抄字典

王梓坤十分珍惜在国立十三中得到的学习机会，对时间抓得很紧，虽不说是分秒必争，但也没有随便放过一分一刻的时光，礼拜天假日从不到外面去玩。寒假到年关才回家，过了年不久，又回到学校。因为国立十三中，不像普通中学，放寒暑假教师学生都回去了。这里是以难民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他们无家可归，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寒暑假照样开支，学校里仍有不少人，只是不上课，只开展一些读书、讲学活动而已。王梓坤的家离学校才 40 多里，他也很少回家，原因之一是为了抓紧时间读书，原因之二是学校吃饭不要钱，在家却要消耗家里的粮食。

暑假，时间是很长的，这对于当时离家不远的非难民学生来说是一个回家休息与父母团聚的好机会。即使是离家较远者，也不惜长途跋涉回家去。当时国立十三中有个与王梓坤同班，并十分要好的吕润林同学，家住在湖南省安仁县，他每次寒暑假都不惜步行 5 天回家去。只有王梓坤不这样，暑假总是不回家，他母亲有时派他兄王梓青来看望一下，见情况好，家里也放心。

1946年7月初，学校放暑假了，平时的热闹气氛没有了，一切都显得安静闲适。这对王梓坤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学习时机啊，他怀着一个打算，走到英文老师门前，敲了门，老师叫他进去，敬了礼之后，老师热情地问他有什么问题。王梓坤说："老师，你借一本英文文法和英文字典给我在暑假里看一看，行吗?"老师说："可以，你利用暑假时间学习英文，很好，有什么问题，及时来问吧!"老师边说边从书架上拿出英文字典和林语堂著的《英文文法》书递给王梓坤。

王梓坤告辞了老师，回到教室里，将《英文文法》和英文字典看得爱不释手。他在上学期看到老师带这两本书来教室辅导，他就下决心要抄这两本书了。今天终于有机会，于是他拿出自己的毛边黄色的土纸订的笔记本，手握小楷毛笔，抄起来。

七月天，正是酷暑，炎热的太阳在窗外照着，热气蒸腾到教室里，火辣辣的，外面树上的知了在一声声悠长地鸣叫，更给炎热添了几分气氛。当时没有电扇，有一把蒲扇就不错了。用手抄书，就无法摇扇了。热得真是难受，豆大的汗珠从身上掉下来。但王梓坤却一心一意抄录，忘了身外一切。

抄书，是王梓坤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一方面他无钱买书，二方面他觉得抄书比读书效果强得多，"抄1遍等于读10遍"。一边抄，一边思考，一边强记，抄在纸上，实际上刻印在头脑里，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100多页的《英文文法》抄完了。紧接着又抄英文字典，一个同学看见了，对王梓坤这股蛮劲，实在吃惊。就说："王梓坤，你也太死心眼了，这么厚的英文字典，抄起来要费多大的功夫啊！我看你猴年马月也抄不完。"王梓坤说："这并不难，这字典两万多个词，我一天抄500个，大约40天就抄完了。古人说'铁杵磨成针'，我这里容易得多了。"那同学见他决心这么大，就说："我来帮你抄一半吧！两个人抄就快得多

了。”王梓坤说：“谢谢你的好意，你有你的学习计划，我不能影响你，况且，我不仅要抄，还要读呢?”

这段时间的确是一场苦战。每天早晨起床后，锻炼半小时左右，就到教室抄字典，一个小时左右，吃早饭后，马上接着抄，每天坚持抄 10 小时左右，基本上做到抄完 500 个生词。由于天气太热，到晚上，学校的老师一般不做事，常常由校长叫工人和学生搬凳子到操场开京剧晚会，或故事笑话晚会，完全是自由的，并不事先安排节目，所以开得十分热烈活跃。王梓坤本是个文娱活跃分子，他会唱京戏，也会拉琴。以前每有文娱演唱会，他都是参加者。现在暑假，夜晚，学校里如此热闹，对他是很有引诱力的，特别是听到老师和同学们唱京剧了，那悠扬典雅的唱腔，多么动听，多么诱人啊！一曲《武家坡》：“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何等高亢激越！一曲《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何等清脆亮丽。他此时在教室里不禁停下笔来，真想去参加晚会……，然而他终于控制了自己，自己有学习计划，若不完成即是不守信用，将来长大了如何在世上为人。

50 多天的暑假很快过去了，和往常一样，每个假期王梓坤在学习上都有新的成绩。这次更是突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将 500 多页的《英文字典》与 100 多页的《英文文法》抄完了。为此，他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瘦了一身肉，好像得过一场病似的。这值得么，值得，从此他有《英文字典》和《英文文法》了。虽然很糙粗，翻起来很不方便，但学习效果并无二致。而且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看到这两本笔记，他有一种成功的幸福感和获得的充实感。

他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送还这两本书给老师。当他捧着书去送还时，老师说：“你还拿着用吧，我还有几本。”“老师，不用

了，我已经抄起来了。”“抄起了，怎么，你抄起了?”老师十分吃惊地用疑惑的眼神和口气问。王梓坤说：“是的，老师，我利用这个暑假将这本字典和英文文法抄完了。”“哎呀，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我这里还有几本字典，你就拿去用嘛!”这位英文老师对王梓坤是很爱的。因为王梓坤的英文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作业又十分认真，是一个好学生。但是，她以前没有想到这个学生如此的不同寻常，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聪明和勤奋的好学生，这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决心和毅力的孩子，抄完一本500多页的英文字典，需要多少功夫啊，简直不可想象。这决不是一般的勤奋和努力所能达到的，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巨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这个平时不太做声，虽然聪明，但并不过分显得与众不同的孩子，竟然有如此超人的表现。她预料，只要不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这个孩子一定大有出息，一定会成就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来。人只要这种精神，还有什么不能征服，不能取得的呢?她感动了，感动得热泪盈眶，感动得整个的身心在颤抖。同时她高兴了，她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学生而自豪而幸福，在自己余年的教学生涯中，能碰到这样一个好学生，当是不愧为人师了。

英文老师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人的精神才智，就在于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非常的进取心和毅力。司马相如说：“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难蜀父老》）古往今来，建大勋，立大业者，莫不如此。一个人有了一种非常的精神品格，必定有非常的行为，必定能成就一番事业，不在其此，就在其彼。匡衡凿壁借光，孙康映雪，车胤囊萤，孙敬悬梁，苏秦刺股，马克思踏坏图书馆的地板，这些人后来的成功皆可以充分地证佐。

长期以来，在人类社会中流行一种命运观，认为人的成就全在于有运气，如此而困扰了许多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其实这乃

是一个弥天大谎。通向成功的道路，只有努力奋斗，只有敢于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困难，敢于做出常人做不出的壮举。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谁和我一样用功，谁就和我一样成功。"所谓没有运气的人，就是没有像爱因斯坦一样用功罢了。

王梓坤抄英文字典的事，很快在国立十三中传开了。同学们为此而十分感动，最为感动的要算王梓坤好友吕润林同学了。吕润林是慕国立十三中的大名而从500里以外的湖南安仁县来就读的，吕润林读书也很努力，常常和王梓坤互相关心，互相鼓励，他们性情很相投，勤奋、节俭、朴实、坦率、和善、热情是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吕润林的家境比王梓坤好。他常在经济上支援王梓坤，王梓坤对他也无话不谈，无事不与他商量，有了课外书，他们也互相传阅。吕润林自以为是很了解王梓坤的，但这一次他却以为对王梓坤了解还不够，他知道王梓坤平时喜欢抄文章，也听王梓坤讲过以前在小学读书时抄过书。但吕润林没有想到，王梓坤这次这么蛮，连500多页的英文字典也抄起了，这给他思想上以很大的震动。他觉得自己在学习上的钻研精神和刻苦的程度，还远不如王梓坤。他不仅觉得今后更要向王梓坤学习，而且更加敬佩王梓坤了，他觉得自己交上了王梓坤这样的好朋友乃是幸事，他想到《论语》中孔夫子讲的话："勿友不如己者"，交朋友就是要交比自己强的人啊！

其次是同年级的同乡同学罗嵩森，罗嵩森的家离枫墅村3里路，在初中就与王梓坤有交情了，考上国立十三中，也是王梓坤对他的鼓励和帮助，但不巧的是两人只同年级不同班。当罗嵩森得知王梓坤这个暑假抄字典的"壮举"之后，他感慨万端，觉得此人乃非凡之人也。后来，他在自己几十年中学教育生涯中，总拿王梓坤抄字典的事勉励自己、教育学生，如今他已进入古稀之年，与人谈起他的老友王梓坤，还是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说起这

件事。罗嵩森先生说：

“抄书苦读，在我国古代是有的，如旧时《三字经》中提到的“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就是说汉朝山西潞州有个叫温舒的人，家贫无书，就将蒲草编成席子，把《尚书》抄在上面苦读，后来终成大才。又有个公羊弘，年已50多岁了，在竹林中帮人放猪，他将竹子削去青皮，将《春秋》抄上苦读，后来也成了名，当了大官。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也有篇《送东野马生序》说的是明朝大学士宋谦抄书的故事。这在古代印刷业不发达的情况下，一般人抄书读还并不太出奇，王梓坤连500多页的字典，也抄起来了，真比古人决心还大。在现代可真是罕见的。”

罗嵩森先生还说：“王梓坤抄英文字典，还表现他有很强的上进心。他从小就是心比天高的，只想多读书，寻找机会去深造，读了初小，要读高小，读了高小，又要读初中，还要上高中，上大学。当时他家那样穷，本来毫无希望深造，但他硬要一直拼上去。本来我们当时没有英文字典也可以，因为书上的生词老师都会讲，有不认识的，又可去问老师。王梓坤之所以要抄英文字典，无疑是想学得更好一些，为了深造，考大学，我家当时较富裕，但那时我们家乡的人都不愿意送子去上大学，因为既花钱，又花时间，当时认为读了中学就很不错了，所以我读了高中，就没去考大学，而参加工作了，他却硬着头皮去考大学，而且终于考上了。他的上进心比我强多了，所以他的成就比我们大得多。”

国立十三中的学生，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成绩好的学生，他们的生活圈子比较大，活动阅读范围比较广，同学们往往带一些书来传看，学校里各种书都有，古今中外，高雅的，低俗的书都在广泛流传，这给王梓坤一个读书的好机会，王梓坤很和人，加

上他成绩很好，很受同学们敬佩，所以他能在广大同学中借书读。这时候，他除了看小说以外，还看了一些其他的书，如《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言文对照《古文观止》、言文对照《尺牍合璧》，还有《牡丹亭》《西厢记》。他觉得《尺牍合璧》和《西厢记》文字最优美，他最爱读，《尺牍合璧》即是清人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和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合订本。那两位文人用他们的锦心绣口，将一些平时应酬的短篇书信写得如花似锦，每一字一句都好像是用严寒冰雪加上春风艳阳凝炼和哺育出来的一朵朵奇特别致的鲜花，又好像从大海碧波里浸润出来的颗颗珍珠，那姿态、那境界、那风采、那情韵，像性感充溢的绝色美女一样诱动青少年的心，撩起那勃勃欲发的情愫和美感。《牡丹亭》是江西临川才子汤显祖惊心动魄的传世佳作，它是青春、爱情和美的赞歌，作者以一种超常的笔触和不羁的才气，在剧本中为处于花季的青年男女们呼唤出沉睡的青春，为纷繁驳杂的大千世界，描绘出一幅幻想的幸福人生图景，为生命缔造着迷人的灿烂锦云。这些美妙无比古典，精神佳品，给王梓坤这个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农村孩子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食粮。

他还喜欢读《唐诗三百首》，特别爱读李白、杜甫的诗，他觉得李、杜的诗最能引起他感情的共鸣，激发得他雄心勃勃。李、杜才华盖世，壮志凌云，气宇高昂，风采独绝，但他们命途坎坷，人生失意，却又不甘败退，他们的每一首诗都是一支生命进取的高歌，向命运抗争的檄文。

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孙子兵法》，他觉得孙子兵法比起其它书来乃是别具一格，别出心裁，别有天地。里面谈的用兵作战之道，全面而深刻，博大而精粹，原则而缜密，真是天下第一等文字。谈得虽是用兵作战的道理和方法，但其实乃是一本人生哲学书，它包涵了极其丰富的人生哲理，处世为人，求学做事，哪

一点都可以从中得到参照，受到启发。求学如作战，读书如用兵，人生就是战斗，命运就是抗争，哪一项战略策略却包括在《孙子兵法》中。虽然当时少不更事的王梓坤对《孙子兵法》中所包含丰富内涵还不甚了了，但他从书中明朗论析中也略知其大要。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其中所说的都十分精粹，如：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

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之道也。

王梓坤将《孙子兵法》用工整的毛笔字抄了两本，一本自己保存，一本送给一个与他要好的同学作为纪念。

第二章 上大学

1. 跋涉崎岖路

国立十三中学，后来迁到泰和县，改名泰和中学，1948 年 6 月王梓坤在泰和中学毕业，国立十三中的建制就撤销了，泰和中学的名字则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泰和中学还保存着王梓坤那个年级的成绩册。王梓坤当时毕业考试的成绩是：

公民：80 分；国文：76 分；英文：90 分；数学：95 分；物理：80 分；化学：72 分；历史：85 分；地理：75 分。

三年各科总分平均成绩是：

公民：77.6 分；国文：74.4 分；英文：89.4 分；数学：89.6 分；物理：77 分；化学：78 分；历史：83.2 分；地理：74.2 分；劳作：77 分；生物：80 分；音乐：75 分；图画：76 分。

王梓坤的成绩在全年级两个班中是最高的，总分第一，其中英文和数学成绩又是单科第一。

毕业了干什么，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这个现实，当时大家都很清楚地了解。但对于王梓坤来说，失业，似乎并不可怕，因为他考虑的不是就业，而是像他那样的社会关系条件，要就业是十分困难的，不可能得到的。所以对这个问题他不需要去考虑，他所考虑的是否能升学，若不能升学，则就失学，那是最可怕的。失学就意味着再也不能读更多更好的书了。无法再进一步了，这在好自强的他来说，是多大的失望和悲哀啊！他以前曾经一次又一次在这个失望和悲哀的漩涡中挣扎着，呼唤着，追求着，寻找着，一次又一次地走了出来，如今又怎么样呢，他十分犹豫。本来，在当时，他这个贫农子弟能有幸读到高中毕业是过望了，应该满足了。高中毕业，在 90 年代中国的今天，当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是在 40 年代的中国，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却是很难达到的。虽然工作难找，但比没有达到高中毕业的人，当是好得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梓坤的确是幸运的了。他在村庄里有多少男孩子在羡慕着他，外村外姓有多少美丽的女孩子在用多情眼睛盯着他。

然而王梓坤却陷入极端的烦恼与愁闷之中，他要自强力求进取，他爱读书，渴求知识，像一个贪婪的商人追求着赚钱一样，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在枫墅村小学，他原来想把书读到像王少诚先生那样就好了。到吉安中学，他又想书读到高克正老师那样就好了。到国立十三中，他知道学无止境，还要继续深造才好。于是他的心更高了，上进心更大了。王梓坤生来就有这样一种永不满足现状的好自强的个性。他是一棵小树，要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地不断长高长大。即使不幸长在岩石上，也要摇来四方被风吹到枝叶上的灰尘作为土壤，把根扎向一条条石缝中，汲取养料而不断生长，以挺拔扶疏的枝叶迎接那浩荡的天风。他是一条山溪，穿过层层怪石，跨过道道谷壑，越过座座山丘，历尽千回百

折，总是有进无退，一往无前地向着江河，向着大海流去。他是一只雏鹰，只要有一片蓝天，就展翅飞翔。不管有多少风风雨雨，不管有多大严寒酷暑，总要不断地凌空搏击，一直飞向那高不可测、浩渺无垠的九霄之上。他是一匹骏马，只要有一片空间就要奔驰，无论是雄关险隘、冰川大漠都不能阻挡其追风逐电般急驰的前进步伐。

然而现实中贫寒的家境却又如此这般地为难着他，困扰着他。高中毕业，下一步就是上大学。在当时，1948 年的中国，上大学，对于一个家无立锥之地贫农家的儿子来说，实在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于是一贯开朗乐观的王梓坤，日夜以思，辗转反侧，无法可设。读书深造，就到此为止了，这是何等的失意啊，痛苦啊！前进的道路上有一座大山，有一道险关无法越过去。希望自强和现实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就好像一个多情的男子，爱上了一位十分美丽高贵的小姐，爱得如痴如狂，那小姐却不爱她。他完全跌倒在失望的深渊里，不能自拔。但他却总是怀着对那小姐的单相思，总让痛苦折磨着自己的心，摆不脱，也放不开。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是的，只有心死了，希望破灭了，一切失望了，才心安理得，而不会悲哀了，心里有了追求，有了希望，才有悲哀，才有痛苦。屈原因为"哀民生之多艰"，才"长太息之掩涕兮"，才"沾余襟之浪浪"；李白因为"俱怀逸兴壮志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杜甫因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才"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所以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尼采说："希望是最可怕的，因为它延长了人们的痛苦。"王梓坤就是这样，心里有继续深造的希望，家里又如此贫困，二者的矛盾是无法解脱的。王梓坤在毕业前夕这几天来，显得消瘦多了，迟钝多了，有时人坐

在教室里神不守舍，书也看不进，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发呆，不了解他的同学，以为他是在默记英文生词和国文课本中的名文。因为王梓坤一贯有这样的默记习惯。只有吕润林了解王梓坤的心事，他知道王梓坤还想上大学深造，这本来是令人十分敬佩的，但又何等的不现实，莫说王梓坤家里那样贫困，就是吕润林这样的小康之家，也无法支付上大学的学费。

他们经过多次交谈，觉得上大学确实困难重重，觉得现在简直到了无路可走的处境了。他们没有任何条件去解决升学问题，就业，是一个幻想。40年代末期的旧中国，战争频仍、饥饿失业、民不聊生，瞻望前途是何等的暗谈。总之，贫穷的处境，将王梓坤的希望在扼杀、在毁灭，而自己又毫无一点力量去摆脱它。

贫穷，这个凶残至极的魔鬼，这个十恶不赦的罪魁，它一手制造了人类的一切艰难困苦，疾痛和不幸，它可以扼杀和窒息人类一切最美好的东西。使追求不可企及，使理想成为泡影，它毁灭思想，毁灭志气，毁灭聪明、智慧，毁灭天才，毁灭情感，毁灭理智，毁灭青春，毁灭美丽，它使本来可以成为至圣至明的贤者，变成一文不名的愚氓，使本可以成为长命百岁的寿星，变为青年就夭亡的短命鬼，使本来如花似玉的迷人美女，成为粗陋不堪的东施丑妇。它可以使一个国家临亡绝境，使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甚至陷于灭顶之灾。虽然世界上从“厥初生民”那一天起，人们就费尽心机使尽力量要摆脱它，然而几十年来，这个魔鬼，仍然像影子一样紧跟着我们，像豺狼一样地吞噬着我们美好的一切。面对这个凶恶的魔鬼，青年的王梓坤有什么办法呢？吕润林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呢？

然而他们二人仍要想办法与这个贫穷魔鬼抗争，他们要用自己的意志和青春的力量去与之搏斗。他们觉得只有抗争才有出

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抗争的历史，尽管这个贫穷魔鬼企图吞噬着人类的一切，但结果只是吞噬了那些不敢抗争的弱者，在强者面前，它却失败了。抗争当然要冒险，这里面有预料到的，还有预料不到的。如果他们一同去考大学，没有路费如何去。当时要到长沙去考大学，路途有一千多里。吃住又如何解决？考上之后又怎么去上学？两手空空能办到么？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要去闯一闯，不管后果如何，走一步看一步。他们终于大胆地决定一同步行去考大学。吕润林决定向家里要一些钱做路费，和王梓坤一起使用，也就是说一切费用由吕润林出，两个人在路上，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伙食，这个方案是可行的，然而也确实惊人的，两人一起长途跋涉，谈何容易。这使王梓坤万分激动，他非常相信吕润林帮助的诚意。因为他们互相太了解了，感情太深厚了。

吕润林这个人确是太好了，他一贯热情正直，助人为乐，为了帮助别人，他全不顾自己。这种为人的品德，甚至因此，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吕润林后来考上湖北政法大学，毕业后在湖北某县当司法人员。该县有个女干部爱上一个青年农民，准备结婚，却被一个副县长无理干涉，这对青年恋人被逼得双双自杀。吕润林对此事十分愤愤不平，反映到地区和省里有关部门，却遭到那个副县长和其庇护者的回击。但吕润林不灰心，一直告到党中央组织部。后来那个副县长被撤职处分，但过了几年，又复了职。那个副县长就对吕润林千方百计进行报复，吕润林不堪忍受，自动离职，回到老家当修理工，那时他才 32 岁，到 1979 年 20 多年后，他才平反复职，可是已垂垂老矣，只好以退休处理。吕润林就是这么一个以助人为己任，为别人甘作自我牺牲的大好人。王梓坤在一生中关键时刻，有吕润林的帮助，亦可说是一种大好运气了。

吕润林愿意帮助王梓坤去考大学，王梓坤心头的愁云顿时消散了。他想不管有多大困难，只要有吕润林帮助解决了路费问题，能够到达长沙应考就好办了。

这实在是一个非凡举措！若换别人是不可想象的。毕业典礼举行以后，毕业生就开始离校了。王梓坤和吕润林拿着行李步行40华里回到王梓坤家乡枫墅村。在枫墅村家里休息了一个星期。王梓坤把和吕润林打算去长沙考大学的计划告诉了母亲和兄嫂。

母亲毫没反对的表示，她现在已深知；这个儿子要读书的决心，是九牛也拉不回的。她只说，这样走路去，又是大热天，太辛苦了。但是她内心里还是相当痛苦。嫂子说："这几天娘天天在暗暗流泪。"她为梓坤要出远门而担心，又怕梓坤读不上书而难过。

临行前一天，母亲到外面买了香烛，几斤猪肉、一条鱼、一只鸡，十分隆重地带着全家人走进祠堂祭了天地和祖宗，母亲跪在最前面，王梓坤和兄嫂跪在后面，母亲对着祖宗的牌位献上三牲和香烛，祝愿说："列祖列宗在上，请保佑梓坤和他的好朋友润林一路平安！考中！"

第二天，他们起得很早，吃了饭，天还没有大亮就上路了。哥哥为他们扛着行李，打算送一程，母亲和嫂子送到村口，一种凄凉的心情笼罩着大家的心，母亲和嫂子忍不住眼泪汪汪了。王梓坤此一去这么遥远，又没有钱，不知要受多少苦，又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这时天已大亮了，必须乘着凉爽赶路。哥哥一直送了20多里路，还要继续送，王梓坤再三要他打回转。哥哥才依依不舍地站着看他们二人走远了，才打回转。

他们打算先到吕润林家里住一段时间，复习复习功课，然后再动身去长沙应考。吕润林的家在湖南安仁县城，他家开中药铺，一楼开店，二楼居住，住在楼上是很安静的，加上城镇生活

方便，消息比较灵通。从吉安县往安仁县走的这条路，吕润林以前在寒暑假多次走过，比较熟悉。他们步行，抄近路走，有时走在公路上，有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6月天，太阳火辣辣的，尽管头上戴着草帽，但身上还是热气很大。汗水一道道从身上流下来，他们干脆脱了上衣打赤膊。第一天走得还不太劳累。一路上，田野里吹来阵阵风，但非令人凉快，而是将一股热气从禾田里的稻叶吹来，带着稻禾的香气，吹到身上火辣辣的。这时候只有在树荫下，或屋檐下坐着，并摇着扇子，才有一点凉爽的感觉。王梓坤和吕润林背着行李，迈着沉重的脚步赶路，为了节约旅费，他们必须赶路，争取早一点到达安仁。

这种步行长途跋涉去赶考，在实行科举考试的古代，并不罕见，我们在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里常常看到这种情况的描写，但在现代交通工具发达的情况下却少见的。也许王梓坤和吕润林此一举动，既是对古老的秀才们赶考的一种现行追忆，也是现代社会的惊人奇闻。

他们沿着西去的崎岖小路，一程又一程地向前走。虽然他们也不知道此一去到底能否成功，但是，他们估计，学习成绩方面，他们是有优势的，只在经济上是劣势。只要将来能到达长沙，他们是大有希望的，他们每天走100里左右，第一天，由于和家人分别，心情比较沉重，他们走得较慢，大约只走了70多里，就在吉发县洲湖镇住下了。第二天清早就动身。这两天走得较快，大约走了100多里，晚上到了里田，第3天到湖南江西接界处界化陇。第4天，到湖南悠远，这一带是山区，沿途都是一座山接着一座山，山路崎岖，十分难走。那天天气十分热，王梓坤喝多了生水，下午肚子痛，腹泻了。走一段路又要泻一次。身体很不舒服，下午5点钟左右，王梓坤又要腹泻了。他叫吕润林在前面慢慢走，等会儿，他就会赶上来的。谁知王梓坤腹泻过

后，起身去追赶，却不见吕润林了。原来两人没走在一条路上，而王梓坤却以为吕润林走远了，快步往前赶路，结果越走离得越远了。到黄昏时，王梓坤走到一个山神庙边，还没有看见品润林的踪影。山神庙过去200米远的地方，有一座茅屋，住着一户人家。

天黑了，必须在这里住了，再走就碰不到村庄。王梓坤走近那户人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门口捆柴草，一个女人正走出来观望，就上前招呼，说："你老人家好！我是到湖南去读书的学生，走到这里天黑了，请在你老人家屋里借宿一夜好么?"那男人用怀疑的眼光将王梓坤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对不住啊，我这里不是客栈，你又是个生人，在我家里住宿不便。前面有个庙堂，你到那里去过夜吧。"没办法，王梓坤只好到古庙里去过夜了。走进去一看，阴森森的，心情顿时很紧张，幸好当天夜晚月光明亮，庙里有个大供桌，前面还有条旧长凳，借着月光，看得清庙里的菩萨，中间那个红脸堂堂，像是关公，两边一个拿着一把大刀，恶煞的，当是周仓，另一个比较典雅，当是关平将军了。看到这副模样，王梓坤紧张的心情又松弛下来，关公是一位正派的好菩萨，周仓、关平也很可爱，他们都是驱鬼祛邪、保佑良民的。王梓坤反过头一看，外面又是阴森森的虫鸣、鸟啼，庙堂里寂静空洞得令人十分害怕。又想到《水浒传》里卖人肉馒头的故事，这夫妻俩，莫非水浒里张青与孙二娘一类货色，他叫我住到庙里，半夜里就来要我的命，真是太恐怖了。王梓坤于是走出庙门躲在一边向那茅屋里观察，只见窗口里透出一点灯亮，其它毫无动静，他悄悄地看了又看，想看出个究竟，万一看到那老家伙带着人拿起刀棍，他就赶快往林子里逃命。忽然山林里一声"啊啊"的怪叫，王梓坤吓得浑身发抖，不得了，这山里莫不是又有老虎和猿猴。在庙外面躲着也很危险，看来横竖是死路一条

了。这时身体也很累了，只好走进庙堂去休息，他将行李放在供桌上。准备在供桌上躺一下。但心里还是十分恐怖的，他用那条长凳将庙门顶住，以防那老家伙闯进来，同时觉得今夜万万不可睡觉，只能坐在凳子上听动静，万一有响动，就从菩萨后面的窗口逃出去。王梓坤紧张而警惕地，在庙堂坐着，等待天明。夜深了，只听见外面各种鸟和野兽的怪叫声，真是既十分寂静，又十分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睡也睡不着。

这一夜王梓坤害怕极了，没有睡一下，就这样一直等到天亮。王梓坤打开庙门向那茅屋观看，屋里已升起炊烟，狗在门前走来走去，鸡在门口啄食，一片宁静的农家景象。王梓坤此时才觉得那个人不是歹人，就大胆地走上前去向男人道别。那男人说："你在我家吃了早饭再走吧！"王梓坤说，他还要赶路，去赶上另一个同学。王梓坤此时觉得还是应该感谢那个男人，想送点东西给他，但自己身无分文，只有一条新毛巾，是这次上路前妈妈特意为他买的，他就将一条新毛巾送给那位老人。老人先不肯接受，王梓坤一定要送给他。老人只好接受了，马上盛一大碗稀饭来，要王梓坤吃了再走。王梓坤这时也实在饿了，就喝了那碗稀饭，然后赶路。

约摸赶 10 多里，走到一条河边，渡船还在对岸，王梓坤只好在渡口等待。忽然后面有人在呼唤，却是吕润林，原来吕润林昨下午走了一段路，不见王梓坤来，就坐下来等待，等了好久还不见来，他就返回去寻找，走到原来分手的地方，也不见王梓坤，他左右四方呼唤了一阵，不见回音，天也快黑了，他马上走到一个村庄住下，向店主人问路途情况，店主人说："那地方有两条路，可能你两个走的各是一条路，但从这里到湖南去一定要经过前面那条河的渡口，你明天可走到渡口上去等，一定会等到的。"吕润林今天一早就起来拼命往河渡口走去，幸好跑得快，

王梓坤还没渡河，要是渡了河，就为难了。

两人走散了，何等发愁，现在找到了，真是又惊又喜，真是天要故意考验王梓坤一下啊！在他前进的路上增加一点坎坷的经历，让他吃点苦头，品尝到路途的艰辛，或是王梓坤的生活道路上应该有一点传奇的色彩，以备后来有一个有趣的回忆，抑或是万事万物的高潮之前必定有一个跌宕，一首妙曲起伏的旋律中必须有低音。

2. 长沙应考

吕润林为此心里十分内疚。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分开，总是形影不离地向前赶路。走了 5 天，在农历 6 月 15 日，他们终于到了安仁县吕润林的家里，吕润林的父母对王梓坤十分热情，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他们觉得王梓坤十分文明有修养，十分可爱。吕润林早对母亲说到王梓坤的优点，如今闻名不如见面，印象更好。

王梓坤在吕润林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等待考期，同时好借此时复习一下功课，特别是多记英文生字。农历 7 月中旬，王梓坤和吕润林决定到长沙去准备考大学。他们先坐船去，从安仁县的水乐江码头上船，到草市镇再进入泮水。一路上的水光山色，使王梓坤和吕润林心旷神怡。那沿河两岸的山，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林木苍翠，有的怪石嶙峋，有的挺拔耸立，有的蜿蜒曲折，有的像老人一般严峻庄重，有的像青年男子一样英武刚强，有的像少女一样婀娜多姿，有的像儿童一样幼稚天真。这了一重重山，转过一曲曲湾，然后又驶向一片平坦的田野，那里开阔，浩

翰，令人眼界开阔，远近的村庄呈现在眼前，一片绿色的稻田，犹如一块大锦缎。风儿吹来，犹如谁在摆弄这块锦缎。木船走了将近3小时，王梓坤、吕润林饱览两岸的景色，觉得有点怠倦，他们将视线转向江中，碧蓝蓝江水多么清澈。他们有了下江游泳的念头，于是脱掉衣服双双跳入江里，跟着船儿游泳。王梓坤从小就是游泳能手，吕润林也游得很好，他们一起愉快地将爬泳、侧泳、仰泳、潜泳各种姿势反复交换地玩着，大约游了2公里左右，吕润林有点累了，爬上船去，在船上喊王梓坤上船来，但王梓坤的游兴还很浓，他感到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河水这样清且涟漪，又不深不浅，没有风浪，没有脏物，又跟着船走，毫无危险，他继续游着游着，一直游到衡东县附近的吴集镇，船老板将船靠了岸，准备去吃饭，王梓坤才上船，穿好衣服坐在船舷上休息。

晚上，篷船进入了湘江码头。他们本应上岸去搭火车到长沙。但已是深夜了，不便上岸去找客栈，就在船上睡了，船停在码头的右侧，很多船停在那儿，挤挤挨挨的，真是一个水上世界。他们2人睡在一个小篷仓里，刚好睡两个人。凌晨，一阵阵夜风吹来，清凉凉的，将王梓坤吹醒，他睁眼向篷窗外面一望，只见天上几颗疏星在闪闪烁烁，月儿已经西坠，斜斜地从岸边的杨柳树枝中照来，他不禁想起了国文老师教的柳永词中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疏疏密密的柳枝摆动着，如有依依深情，青青柳叶，焕发着勃勃的生机，暖风荡荡悠悠，残月凄凉寂静。何等地牵动青年王梓坤的迷茫莫名的愁绪，何等地映衬人生道道的旷远渺茫，无情无依。

早晨起来，王梓坤、吕润林二人随便买了几个馍馍吃了，就去火车站。火车上的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他们去忙什么？去追求什么？谁能知道？他们也像王梓坤、吕润林一样

为命运而抗争，为前途而奔忙，为未来而含辛茹苦么？他们两人很快找到了座位，再没有心思去观看车箱里形形色色的人了。只是将头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听着火车开动的隆隆车轮声，等待到达目的地。

到了长沙，两人先住在吕润林的一个老同学家里。那人的父亲，当时在长沙高峰中学教书。王梓坤不便在那儿久住，第二天他就去找江西会馆。王梓坤原先得知当时在固江小学当校长的刘振兴先生，如今在长沙的江西会馆做事，王梓坤到江西会馆一说到是刘振兴先生的乡亲，会馆里的人马上热情地接待他，并安排他在会馆里吃住，随即陪他去找刘振兴先生。

原来刘振兴先生在由江西吉安人集资在长沙办的庐陵小学里任教导主任。见到王梓坤，刘老师十分吃惊，6年多没见面，王梓坤已由一个小孩子长成个大人，使刘老师一下认不出来了，但对王梓坤这个优秀学生的印象是很深的，所以，当王梓坤说："我是王梓坤呢！"刘老师立即高兴得笑起来，亲切地拍着王梓坤的肩膀说："啊，你长得这么高了，真好！你这次来……"王梓坤马上说来由。刘老师更加高兴地说："好呀，好呀，你真了不起，真有志气！不过现在离考大学还早得很呢？你来得这么早，不找点事做，怕不行吧？"王梓坤说："老师，我也正是这样想呢，你知道我家里很困难。"刘老师说："你来得正好，你真有运气。学校里正在办暑假补习班。还缺一个高年级数学教员，你学习好，又是国立十三中毕业生，正好，正好，你马上就搬行李来学校住吧，过几天就上课。"王梓坤真是喜出望外。

老天爷，怎么有这么样的怪事，王梓坤家里那样穷，生活是那样困难，但机遇却那么多，那么巧，来长沙的第二天，就居然找到了赖以生活的工作。这也许是老天爷对他特别垂怜吧，这个好学上进的年青人，感动了上帝，造化总是不毁灭他的希望，不

绝他的生活之路，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绝望的时刻遇到了希望之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又找到一条路，虽然这希望是何等的微小，这条路何等的狭小，但总使这个年青人可以有一条向前的通道。当然这条通道，其实也不仅是上帝的垂怜，造化的赐予，也是他用那种上进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断向前跋涉所踏出来的。假若他不是那么学习好，又有谁来问及他关照他呢？古人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是这个意思。

王梓坤在庐陵小学补习班代课，有饭吃，有地方住，还可以得到一些工资。这样就为他在长沙考大学做好充分的准备。9月份各大学都来长沙招生了。当时的长沙，是我国南方的一个重要城市。商业繁荣，文化发达，全国许多大学都在长沙设立招生点，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招生考试时间不一致，有先有后，这无论对学校和考生都有很大的机动选择性。王梓坤先后报考了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武汉大学、克强理工学院、武汉水利学院等5所公立大学。没有报考私立大学，因为私立大学学费收得高，他没办法去读，公立大学收费低，且有奖学金，王梓坤是抱着去得奖学金读书的打算而报考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瞄准武汉大学数学系，一方面武汉大学当时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名气很大，二方面武汉离家乡较近，离长沙更近，去的旅车费不多，这对贫穷的王梓坤是必须考虑的大问题。若去考上北京大学是无法弄到路费的。三方面数学是他的强项，学数学是多年的心愿。王梓坤对考取是很有信心的，甚至是有把握的，他学习一贯很好，不仅是数理化，还是英文，国文他都学得很好，特别是数学和英文，作文他最拔尖。每次考试，他都能进入最佳的竞技状态，有如当今我国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一样，每场比赛都打得很出色。数学和英文题目他基本能做到全对，除非是十分偏的和难度相当大的，作文他写起来得心应手，从来没有文思枯竭

的时候。

参加5个学校的招生考试，花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虽然考得很顺利，但身体还是很疲劳的。到10月中旬，各校的取录情况全都在报纸上公布了，王梓坤所报考的5个大学都取录了他。在这5个大学中他首先选择的是武汉大学。这个决心下定了。吕润林也考上了湖北政法大学法律系，他们两人互相祝贺。吕润林从此以后就与他分别了。吕润林要回家去做入校准备，王梓坤没有回家去，一方面没有路费，二方面他觉得也费时间和精力。

取录于武汉大学数学系，这多么令王梓坤高兴啊！他多年来就打算学数学，现在终于如愿以偿。这对王梓坤来说乃是生命中一次最重要的选择，也是他最佳的选择，是一生成功的关键之一，王梓坤所以成为今日引国人注目的科学院士，与这次选择是大有关系的。

的确，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有几次关键时刻的选择，如果选择得好，又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则有成功的希望，如果选择得不好，往往不但无法取得成功，甚至会遭到失败。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必须注意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首先是否能读书，是否能上大学深造，在当今这个知识极发达的时代，一个人必须读书，必须有知识，才能有干事业的基础，特别是上了大学，才有较好的知识基础，没有读大学与读了大学，在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上一般是迥然不同的，只有少数的天才加勤奋的人物例外。读了大学，就可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干你的事业。理工科不用说，就是文科也是很有差异的，没有上大学的与上了大学的看问题的方法和水平往往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连作风、个性、气质都有差异。这当然要到一定的知识高度才可以看得出来的。其次是专业的选择。专业的选择，一方面应从自己的个性爱好和长处出发，你爱好什么长于什么，你就选择什么专业，这叫做扬长

避短，只有这样才可以快进步，快出成绩。二方面要从客观的社会条件出发，客观社会崇尚什么，会给什么以充分发展的有利条件。譬如唐朝人崇尚诗歌，李、杜、元、白，才以诗歌出了大名，而小说家并不出名。我们设想一下，王梓坤若不选择数学，而去学文学，则不一定有成就，甚至肯定不能有如今这样的成就，虽然王梓坤的作文也是很拔尖的，他后来也确实写得一手好文章。但王梓坤若学文学，顶多当一个一般文学家，教授而已，若去搞文学创作，也顶多是个一般作家而已。因为我国文艺界，一贯被极“左”思想统治着，文学家、文学教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稍有出格者即视异端。而且以王梓坤坦率爽直个性是难逃 1957 年划“右派”的劫难，那么不仅无所成就，而且毁灭了才华。这样例子是多不胜举的。然而王梓坤终究是个很聪明的人，是个有见识的幸运者。他选择了数学专业，可谓“合乎人情，顺乎天理”。使他沿着这条康庄的人生道路，通过他的艰苦斗争，终于走向辉煌的颠峰。在长沙开店的欧阳伯康先生得知王梓坤到了长沙并考上 5 个大学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特意几次派人来请王梓坤到他那里去吃饭，王梓坤开始婉言拒绝，后来欧阳先生派他的外甥女婿王淦生及其外甥女刘汉芬来邀请。他已相当为难了，但王梓坤还是不愿去。主要是他一方面觉得自己考上大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艰苦奋斗的日子还在后面呢，犯不着要欧阳大伯破费银钱来请客。二方面他觉得自己过去已几次得到欧阳大伯的资助，至今尚未还清，心里总是欠下一笔帐，不得安宁，现在又去接受他的恩惠，将会使自己心里更不得安的。况且这次在长沙，多亏刘振兴老师，谋到一个代课的差使，得钱虽不多，但也勉强能将就着够去武汉去的路费，也不需人家再资助了。三方面，主要是欧阳伯康十分爱王梓坤，早有想王梓坤做女婿的打算，欧阳伯康有个独生女儿叫欧阳德英，小姐年龄与王梓

坤差不多，欧阳伯康曾与夫人商量将女儿许配给王梓坤，夫人十分高兴。早在王梓坤读小学时就通过他在枫墅村一位亲戚去对王梓坤的哥哥王梓青说，王梓青满口答应，认为自己家庭这么贫穷，而今本地有名的富商欧阳伯康来结亲，实在是高攀，而求之不得的好事。但王梓坤的母亲与嫂子认为王梓坤年纪还小，此事还不能马上定，待王梓坤长大以后再说，如果这时定下来，万一将来王梓坤不同意就为难了。因为意见不一致，王梓青就不敢马上做主，也就按母亲的意思回答了那位媒人。后来王梓坤也知道了这件事，他认为婚姻问题是人生的大事决不可轻易决定，他与欧阳德英小姐从未见过面，两人无任何感情交往。现在已是新时代，决不能由父母做主定婚姻。所以王梓坤对兄长王梓青说："此事以后再也不要提了。"因此，他兄不敢再接受欧阳伯康大伯的馈赠了。现在欧阳伯康先生又如此热情地邀请王梓坤到他家里去，说实在的，如果过去未曾提许配女儿的事，倒还是可以去的。现在若去了，恐怕欧阳大伯又提出那件事，他将是十分为难的，而且如果欧阳德英小姐出来见面，那更是十分难堪的了。所以王梓坤坚决不去，再三托王淦生和刘汉芬小姐，向欧阳大伯表示感谢。但欧阳伯康对王梓坤不来上门不但没有意见，反而认为王梓坤这个青年人实在惹人爱。他于是吩咐王淦生和刘汉芬去街上买一口好皮箱，加上毯子、棉被、床单、几套衣布，又准备40元银元，并要王淦生到王梓坤的住处去打听王梓坤何时动身去武汉大学，然后准备在王梓坤临行时找人挑着衣物皮箱，由王淦生、刘汉芬陪着去送给王梓坤。

那天，王淦生等人等了好久不见王梓坤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问他们等谁，他们说送一个姓王的学生去读书，那人说那个学生昨天下午已走了，他留了一封信在这儿。刘汉芬接了信，打开一看，里面写道：

欧阳大伯及淦生兄：

我已于今下午提前乘轮船到武汉去了。没向你们辞行，实在抱歉，对于你们的关怀与帮助，我将永记于心。

敬颂

大安！

王梓坤上

×月×日

王淦生和刘汉芬心里十分怅惘，他们没有完成欧阳伯康舅舅的嘱咐。同时已充分预料到王梓坤与欧阳德英的婚姻问题，已到无法再提的希望了，祝你们两位各得佳偶吧！

3. 樱园乐读

1948年10月×日，王梓坤来到武昌珞珈山的武汉大学报到。珞珈山，不仅是武汉市的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中南地区四省（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文化中心，那里除武汉大学以外，还有几十所其他各类的大学。各大学的楼房全掩映在绿树之中。珞珈山，三面临着美丽宽阔的东湖，有如一只大鹏鸟凫在东湖之上。美丽的湖光山色将武汉大学打扮成第一流风光胜景，又是第一流的人才摇篮。王梓坤与同时来校的几个新生在迎新人员的带领下，走过丛丛树林，座座山坡，一路领略了无限美丽的翠微山色和滟潋湖光，仿佛走进了世外桃源，洞天福地，眼睛分外明亮，心情分外舒畅，胸襟格外开阔。

王梓坤被向导带着往学生宿舍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校园情况，特别介绍了同学宿舍的情况。学生宿舍的环境是十分好

的。共分5个区，即桂园、枫园、樱园、梅园、湖边。桂园区种满桂树，枫园区种满枫树，樱园区种满樱树，梅园区种满梅树，湖边区紧靠东湖。如此5区，各以其山水美的特征而争胜。数学系的学生们住在樱园，樱园学生宿舍是一幢结构设计很有特色的宿舍，它依靠着一个高坡建成一面墙壁，楼高数层，楼顶与高坡地面一样平，是四合院式的，中间有一个院子，外边从地面向高坡修成一条石阶，有108级石阶，每层楼都向石阶开门，人们均可以从旁边的石阶破门而入，此楼坚固而封闭，幽静而典雅，庄重而秀丽，又似乎充满了欣欣生机和勃勃活力。是中国大学里的奇特建筑。

王梓坤由向导带着走进樱园学生宿舍，他看到这样优美的学习环境，心里想这样好的条件，以前在家乡，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这宽敞高大的宿舍，并不仅是王梓坤向往的所在，他向往的是学习条件。大学，这是人们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向生活历程或是成就事业过程的第一步。它表明人的知识从此开始进行专门化的深造，向有志于学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走入了向高层次前进的途径，这是王梓坤多年所向往的，也是最主要的。

武汉大学的学习条件是相当好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这里有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图书仪器设备，有第一流的教授学者，更不用说校园风景是第一流了。据说当时中国教育界对武汉大学评价很高。胡适之认为当时中国5个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学风很好，教师们教学十分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们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学术水平高，搞科研，著书立说，而卓有成就，教师的上进心和严肃认真的精神，给学生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武汉大学对学生的来源，要求严格，很讲究质量，招生时宁缺勿滥，凡是考生成绩没达到要求者，一律不取。王梓坤所在的数学系这个班才 13 个同学，都是从各省招来的最优秀的学生，江西省的中学教育质量一贯很好，但王梓坤这个班只招收了他和欧阳绵两个江西人，有几个省是空数。

王梓坤到武汉大学读书，深感机会难得，因而他十分珍惜。此时，他特别努力，不仅比别的同学更努力，而且比他过去在中学读书时更努力，他抓紧每个一分一秒，读书学习。虽然当时的功课并不多，时间也不紧张，但王梓坤认为这正是学好功课的好条件。他总是要将所学课程完全彻底地吃透才放心，而且反复地进行复习，以掌握牢固。大学里强调自觉学习，教师并不硬性要求学生作多少作业题，但王梓坤总是将课本中的作业题全部做完，有时还找些难度较大的参考题来做。

发愤往往是和吃苦伴随在一起的。王梓坤不仅要在身心方面为学习而吃苦，而且为生活而吃苦。王梓坤家里很穷，当年在家乡读中小学就因为交不起学费，穿得很差，而以穷学生出了名。如今到了武汉这样的著名的大城市，武大这样著名的大学里，他的穷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他家自从父母死后，断绝了经济来源，且连年负债，家里已不能为他提供一分钱了。从长沙来到武汉，买了船票，已是两手空空如也。衣服、铺盖都是从老家带来的旧的粗的。学费怎么办，只有靠奖学金。班中只有两个奖学金名额，奖学金并不能特别垂青于贫穷的学生，而只是奖给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王梓坤必须争取到最优秀的学习成绩才可以得到奖学金。而终于他和班上另一个同学叫刘奇志的，以最优秀的成绩得到了奖学金。但奖学金最多也只能解决吃饭和学费问题，其他费用是没办法解决的。在王梓坤看来，只要解决这两个大问题也就行了，他素来贫困惯了，清心寡欲，每天除了读书吃饭两件

大事外，别的都无所谓了。他老是穿着一件蓝布衣服，那是他父亲的遗物，裤子比较大。王梓坤的同班同学吴厚心先生回忆说："王梓坤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老穿着一条比较大的裤子。"他还有一件手工织的毛线衣，也是父亲的遗物。冬天他没有棉衣，就靠这件毛线衣过冬。武汉地方冬天是比较冷的。气温往往在零度以下，靠一件毛线衣怎么能过冬呢？王梓坤还是以前的老办法，感到冷了就去搞体育活动，或者在床上看书作习题。

洗衣服，过去在读中学，他学着农村妇女的土办法，先将衣服在温水里浸泡许久，然后用根木棒将衣服翻来复去地捶一阵，再用清水漂洗。现在到了大学，这样落后的土办法就不好再用了，得用肥皂才好。没有钱买怎么办？有个同学介绍他到学校附近的教会图书馆里去做事。那教会图书馆，每个礼拜天要开放图书给人看，需要雇人去管理，于是每到礼拜天，王梓坤就去教会里做事，他那仔细、认真、负责又热情的工作态度，得到了教会人员的好感。但是，辛辛苦苦地忙了一天，所得酬金，也只可以买一联肥皂而已。不过这也是很不错的，给王梓坤解决了洗衣服的问题，一块肥皂一个礼拜用不完，剩下的钱，积累起来，又可以用来买牙刷和牙膏，久而久之，还可以买条毛巾。这样，王梓坤的日常生活就不成问题，可以集中精力搞学习了。当时在武汉大学，教材是不用买的，一方面由老师发讲义，在办公费里开支，不用学生出钱。二方面图书馆里也有教材可借，而且应有尽有。这样的学习条件，使王梓坤感到平生有幸而乐陶陶的。

4. 迎来解放

1948 年到 1949 年正是中国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紧张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当时处于国统区的武汉市乃是国共两党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武汉曾是革命的摇篮，辛亥革命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并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北伐战争也在这里打得轰轰烈烈。此时武汉也是革命势力最活跃的地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频繁地活动着，进步思想在广大师生中不断传播着，同时国民党、三青团和各种特务组织也活动得很猖獗。王梓坤生活学习在如此激烈斗争的环境里，不能不受到影响。王梓坤家庭出身贫苦，加上读书多，成绩好，自然，最容易接受进步思想。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也常常为他弄一些革命的进步书籍来看。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这些书当时都是“禁书”，王梓坤看得很有兴趣。其中所说的理论和所描写的新人新事，给王梓坤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充满理想的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他热烈地向往着这个新世界的到来。他觉得这个新世界似乎就是为他而创造的。于是他积极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组织的宣传晚会，读书会。此时他又读了日本一位经济学家写的一篇进步文章。内容是讲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的。王梓坤觉得很有道理，他反复看了多次，写了读书笔记，并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了一篇论文，叫《奢侈品论》，后来发表在武汉市的《大刚报》上，其中内容也是揭露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恶。后来，王梓坤又写了篇短篇小说《堆在下层的落

叶》，发表在长沙《新世纪》杂志上（1948 年）；内容是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处境，控诉旧时代的不平。

一天，王梓坤看见武汉大学文学院大楼的墙上，帖有一张征文启事，内容是说武汉通讯社征文，题目是“对 1949 年的展望”。这引起了王梓坤极大的兴趣，回到寝室，他立即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去，内容大意是说，展望 1949 年，进步力量必将日益壮大，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人民“翻身的幸福日子快到了。”王梓坤当时满怀进步激情，不顾当时的紧张政治局面，不顾后果，大胆地提出了这些新观点。

文章寄出去以后，不久寄来了通知，说此文章选中了，并评上了 2 等奖，请作者到武昌地域的武汉通迅社领奖。王梓坤当时又没多考虑其它，就高兴地去领奖。但到达武昌以后，得知此通迅社乃是官方机构，王梓坤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一下可危险了，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人士迫害得很厉害。但为什么官方机构会发表王梓坤有进步观点的文章呢？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假装民主开通，容许有不同政见发表，因为还有很多右派反动观点的文章也得了奖。二方面可能此官方通讯机构也有进步人士。王梓坤当时思想相当紧张，打算不去了，但又想，即使不去，他的名字和通讯地址他们反正知道了，若要找麻烦也避免不了。同时想他们既然发表了，又评了奖，如果又要加以迫害，我则要去义正词严地评理呢？所以，王梓坤又壮起了胆子去领奖，后来到那里领奖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那个编辑还热情地与他握手，并告知了其它文章的得奖情况：其中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反动的文章，不知是何种身分的人士所撰。

领奖完了以后，王梓坤快步离开了那个通讯社，往珞珈山校址急走。一边走，一边瞻前顾后，生怕有人埋伏在前或随后跟踪。一直走到学校附近，心里才安定下来。

当时，王梓坤班上有个男同学叫齐民友，此人十分聪明，学习成绩很好，思想很进步，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他见王梓坤思想进步，且又出身贫寒。他就主动与王梓坤接触，给一些进步书籍让王梓坤看，又与王梓坤谈时事政治，多方帮助王梓坤进步。王梓坤在齐民友的影响下，参加了当时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习社”，经常去开会学习，接受进步思想。1949 年解放后，“青年学习社”直接转入“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现在的共青团）。

1949 年解放后，日月换新天，国家对高等教育特别重视，读大学，一律不要交钱，全由国家负担，这对王梓坤来说是最幸福的事。同时解放后，工农当家做主，重用出身贫苦的青年，王梓坤成了依靠对象，很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又担任数学系党支部委员，负责全系的青年工作。这对王梓坤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非常感谢党对他关怀重视，因此总是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满腔热情地对待工作，满腔热情地对待一切政治活动，同时又满腔热情地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学里政治活动相当多，土改复查，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抗美援朝宣传，参军，一个活动紧连一个活动，时间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腔热情地去对待，已是应接不暇了，更何况要搞好工作，搞好学习呢。王梓坤可是安排得有条有理，一切没耽误，一切都搞得很好。他的工作主要是青年委员，团支部书记的工作，所以他首先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这方面，不仅及时了解、领导系里各年级团支部的工作，而且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对班里的同学进行思想帮助，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早日加入团组织。他十分关心班上的同学的进步。他从来不是一个只顾个人当先进，而不顾别人的人，他总是希望同学们和他一同齐头并进，他和同学们从来是肝胆相照，不分彼此，从来没有看不起别人的表现。更不像某些政治积

极分子那样，总是将自己的朋友当作整的对象，别人讲句话，也记在心里，准备汇报，以表现自己立场坚定、政治进步。王梓坤却是同学的帖心人，同学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意对他谈，他总是帮助解决好，但从不当作话柄，去伤害同学。在我们过去的政治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某个同志有思想问题，向知心的领导畅谈，以请求帮助，那个领导对某个有思想问题的同志进行了帮助，本来问题彻底解决了。但那个领导者却常以此作为材料挂在嘴上，表自己的功，但从而造成了不好影响，伤害了那个同志。王梓坤则从来不是这样。

王梓坤还及时发现同学的困难、问题，及时解决。当时班上有个姓尹的女同学。她的父亲在土改中划为恶霸地主，遭到了镇压，当时背上了很大的思想包袱，整天情绪不高，以为自己从此没有前途了，王梓坤及时察觉了这个问题，马上对尹同学进行思想帮助。他根据自己平时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和体会，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多次反复地帮助尹同学，既与父亲的罪行划清了界限，又明确认识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与奋斗方向。尹同学从此放下了思想包袱，振作起来了，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有很好的表现，后来入了团，成为武汉大学数学系的典型人物，多次受表扬，并在系里召开的大会上进行典型发言。

王梓坤班上还有个男同学叫欧阳绵，家庭出身不好，经过王梓坤长期帮助，表现很好，结果发展入团，在支部会上讨论时，有人因为欧阳绵出身不好而提出了异议，王梓坤坚决顶往说："只要他本人表现好就可以，欧阳绵同学是一张白纸很单纯的。"于是欧阳绵顺利地入了团，后来进步很快。

王梓坤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起带头作用。解放后，大学设立了助学金，以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学，当时武汉大学助学金的指标是百分之二十五。而当时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很

多，可谓“僧多粥少”。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系党支部做出决定，凡是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评助学金时，不要与群众争利，应尽量放弃，除个别特殊困难的以外。王梓坤当时也放弃了助学金，但他是班上经济最困难的学生，家中毫无经济能力供应他读书。对于这一点，不仅他自己很清楚，他班上的同学也都很清楚，党支部成员更是清楚，所以党支部对王梓坤的问题意进行了讨论，并且反复讨论了 4 次，都一致认为王梓坤的问题应该做特殊情况对待，不能让他放弃助学金。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但王梓坤思想上背了很大的包袱，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在经济上伸手，是多么不体面的事。自己家里经济情况这么差，又不得不如此。王梓坤始终为这件事感到很矛盾，很不好过。其实，班上的同学和系领导对王梓坤享受助学金毫无异议，在校生活一贫如洗，几年来没见他穿过一身新衣服，总是那几件旧衣服换来换去，有的地方还打补钉。他若是在街上，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人们很容易认为他是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的农民，只不过衣服洗得干净，弄得比较整洁而已。几年来寒假、暑假，同学都先后回家探望父母，他却从来没有回去一次，原因是没有路费。这些情况同学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他的好友党支部委员齐民友更是感动。所以王梓坤得到助学金是完全应该的，应心安理得。而王梓坤心里老是惭愧，可见他那种谦虚克己的品格，从年青时就有了。

在武汉大学，有一件事令王梓坤很失望，就是抗美援朝不得参军。1951 年春天，学校里接到上级指示，动员一部分学生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通过几次政治思想动员和学习讨论，武汉大学校园里群情激奋，年青热情的大学生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积极报名。王梓坤当然是首先带头报名的一个，而且也是真心实意的，有很大决心的。当时在中国高校工作的苏联专家，曾向国家

有关领导部门提出，中国的工业不发达，经济很落后，理工科大学生应少去参军，以保证培养足够的优秀的人才。中国有关领导部门接受了这个意见，并贯彻到了各高等学校。武汉大学数学系领导又考虑到王梓坤工作能力强，将来留在学校里对工作大大有利，所以党支部负责人劝王梓坤莫去参军，但王梓坤坚决要求去，情绪十分激昂，而且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最后因为体验未过关，而没有去成。

本来王梓坤的身体相当好，他自己也很有自信，因为他经常坚持跑步、玩单杠和双杠。况且他自幼经过艰苦的生活磨炼，而身体很结实，很少生病，连感冒都少得过。参军体验那天，他在内科、外科检查都毫无一点问题，当检查到五官科时，他听力相当好，视力也是1.5以上，最后医生拿出一张彩色的纸，问王梓坤那中心是什么数字，王梓坤傻了眼，一时讲不出来，问了几次又换了几张，他仍然讲不出来。原来王梓坤有轻度的色盲，这下糟了，体验没有过关。没办法，只好留在学校继续读书。他的好友齐民友得知这个情况，笑着对他说："党支部想要你留下来，因为系里本没有参军任务，你自己想不通，这下子医生将你留下来了，你老实了。"王梓坤却为此感到很失望。

前面说到，武汉大学在解放前夕，政治斗争就很激烈，政治活动就相当多，解放后政治更是多得很，真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令人应接不暇，甚至常常有停课学政治的情况。加之老师们大都出身于旧社会，家庭成分又不好，他们更是小心翼翼地参加政治活动，不敢不积极，于是教学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放松了，基本上是学生自己管自己。甚至还由学生管理老师，老师进行思想改造，要学生进行评议看态度如可，再进行通过与否。在这样情况下，有些课没有完成教学任务就草草地结束，有些本来应开设的课，却没有开设了，因此学生的学习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学生认为今后主要是讲政治表现，学习成绩好不好都不关紧要了，所以不少学生对功课放松了。一些原来成绩很好，学习抓得紧的学生也跨下来了。而王梓坤在这种情况下，却十分清醒，对学习一点没有放松。凡是开设的课程，他都认真进行预习和复习，没教的部分，他也一一自学完毕，作业也不放过，每个题都作。难题要进行演算，较容易的题目也要看一遍，以加深概念，他开会较多，有时要耽误上课，他于事后一定要自动将课补好，不懂的地方问同学或老师。星期天，他不出去玩耍，总是到图书馆或教室里学习。有时候一天开会很忙，他就抓紧中午休息时间作习题，晚上睡觉前一个钟头，他总是在复习功课。即使是开会，他也带着书去的，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利用来搞功课，譬如会前等人，中间休息等。1951年春天，他和一些同学到农村去参加土改复查，他也将书带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看书，以致一切农村干部和农民都以为王梓坤是个书痴。

王梓坤在武汉大学，读书的范围很广，他除了复习好功课搞好专业以外，还读一些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学的书，他看了不少外国小说，特别是苏联、俄罗斯的小说，如契可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他对文学很感兴趣，不时到文学院大楼去看看，了解一些文学活动消息。还多次听文学院教授们主讲的文学讲座，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王梓坤如此努力读书，在同学中影响很大。他当时的同班同学欧阳绵和柏盛先后来说："王梓坤十分聪明，基础好，又十分勤奋努力，简直将一分一秒都利用上了，所以他在学问上必然有成就。"

留学苏联

第四章

1. 高明的选择

王梓坤几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地结束了，事实证明他没有虚度时光，他仍然是以最优秀的成绩领得了武汉大学的毕业证书。正因为如此，在1952年7月他被派往北京大学去读研究生。并且学校领导指定王梓坤这个又红又专的党员学生当武汉大学派往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人员的组长，由他领带30多个同学，踏上北去的列车前往首都北京。

他们到了北京，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第2天上午，王梓坤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到国家教育部去报到。接待他们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同志，她首先对王梓坤等3人问好，然后说："你们的分配方案变了。现在全国各大学都缺乏教师，部里决定你们还是到大学里去工作。"说完，她将书写的分配方案交给了王梓坤等人，王梓坤接过来一看，自己被分配在天津南开大学数

学系任助教。

王梓坤在南开大学任教才两年，就被派往苏联留学。留学前，先到北京参加俄文专科进修班学习1年俄语，时间是1954年秋到1955年夏。地点在北京西单附近的石附马胡同。他被编在19班学习。王梓坤原来在武汉大学俄语学得不错，这次进一步提高，自然不会吃力，加上他刻苦努力，整天泡在学习中，所以成绩最好。

学好俄语，以便到苏联过好语言关，能顺利地学习专业。这在王梓坤问题不大。他感到重要的问题是到苏联学什么专业，这先要自己选择好。数学科学，在当代的分支太多了，且越学得高级分支越多。在科学高度发达的现代，任何一个学者，已再不可能像牛顿、歌德那样成为在多方面学科有成就的通才了，他们只可能在某一学科的分支上，甚至只能在某个分支的分支上取得研究成果。而要在某个方面尽快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事先选择好专业，选择好进攻方向。对于这些，武汉大学的教授们曾经多次讲过，作为高材生的王梓坤也是明白的。但他当时只是大学本科毕业，学的都还是基础知识，根本没有进入科研过程，当今数学科学发展的势态如何，他还不知道。因而去苏联留学选择什么专业，他是拿不准的。他为此而多方面向人求教，有人告诉他，最好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请教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先生。关肇直（1919－1982）是我国当代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后留学法国，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他是中国泛函分析和现代控制理论的开拓者，创设了中国泛函分析专门化和现代控制理论专门化研究，及在现代控制理论及其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并开创了分布参数系统的新领域。关先生为人十分谦虚热情，喜欢奖掖后进，他培养了大批高级数学研究人才。

王梓坤去到中国科学院，找到了关肇直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关先生十分热情地接见了这个年轻人。当王梓坤十分恭敬地向关先生请教时，关先生十分内行而又十分明确地对王梓坤说："我建议你最好去学概率。一方面，我国数学界还缺乏人来搞概率论，你去学，正好符合祖国的需要，将起着填补空白的作用。二方面，苏联的概率论研究，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他们有许多世界第一流的在概率论上取得最先进研究成果的专家。你去向他们学习，则可以学到最新最高级的概率论研究成果。回国后，你就可以站在他们最先进的起点上，较快地进行最先进的课题研究，容易取得成果。"

关肇直先生的这一番话，是相当高明的切实内行之言。他好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以他久经沙场、克敌制胜的丰富作战经验和知己知彼、十拿九稳地驾驶战争风云的能力，向他的部下明确而信心十足地指引着攻克敌堡的策略。关先生的正确的分析和恳切明朗的指引，对王梓坤来说，如同初升的太阳，拨开蒙在前进道路上的迷雾，从而看到前进的方向和进攻的目标。

王梓坤以自己平时优秀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十分敬佩地认识和理解到关先生的指点是十分正确的，令人深信不疑的。因为它符合世界数学研究和发展的实际，又符合中国数学研究的现实情况。这个观点，只有关肇直先生这位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功力高深，站在当今世界和中国数学研究前沿的高明学者，才能提出来。以后王梓坤的成功就足以证明关先生见解的精辟正确和富有远见性。

在人生事业成功的道路上，太需要有高明的导师指引正确前进的方向了。有了正确的方向，才可以不走弯路，不白白浪费精力和时间，若没有选择好正确方向，则往往难以达到目的，甚至空耗精力，无所成功。特别是科学研究，并不是像哲学和宗教那

样“条条道路通向罗马”。有些路走来走去却只能通向一些寻常巷陌，有些甚至走进死胡同，只有选取好正确的道路才能快捷进入康庄大道，达到一片辉煌。

决定学习概率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王梓坤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必须走好，走得稳稳实实。但王梓坤从未学过概率，当时国内数学界许多学者也未接触过概率，甚至连买一本这方面参考书也很困难。要去苏联留学读这方面的研究生，就很为难了。王梓坤觉得，自己必须先弄一本概率论基础方面的书读，学得一些基本知识，打下一个基础才行。王梓坤到北京大小书店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一本概率方面的书，心里十分发愁。一天下午，他和一个同学去西单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看看，忽然发现有一本旧的《概率论教程》，作者是苏联的格涅坚科，我国丁寿田翻译的。王梓坤喜得不知所云，马上买下。王梓坤决心在出国前认真地读完这本书，但是俄语专科学校训练班有一条纪律，规定在校学习的学生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学习功课，凡是别的书一律不准看。在这种情况下，要自学《概率论教程》就很困难了。王梓坤是个党员，又是班干部，必须模范地遵守纪律。但他为了学习，必须千方百计想办法。若不读完这本书，到苏联留学将一定会遇到臆想不到的困难。

他觉得，在学校里无论什么时间看这本书都会引起非议，只有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到校外去读。他于是在每天下午吃了晚饭后到外面去散步，找一个适当避人的地方，将《概率论教程》一页一页地啃。星期六和星期日全天或是到公园里，或是到当地的公共场所，找个地方坐下来去读《概率论教程》，他先认真地读了一遍，了解了基本内容，后来又认真复习，做笔记做练习题，半年多时光，他将这本书已认真地读完了，对其内容已掌握得比较扎实，于是王梓坤可以说为学习《概率论》打下一定的知

识基础了。

一年的俄语训练班很快结束了，通过考试，王梓坤的成绩很好，这是不用说的。学完了俄语，就准备出国。当时国家外事部门又对这些出国留学人员办一个训练班，主要是以学习出国后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尊重苏联人民的生活习惯，如何讲究外事礼节等。

国家为留苏学生每人买了一套生活用品，包括各个季节所穿的衣服。即特制皮箱一个、皮茄克一件、毛料西服两套、衬衫皮鞋等一应齐备，想得十分周到，衣服是到北京最好的裁缝店定做的，十分合身。王梓坤以前没有穿过什么好衣服，大都是粗布衣和旧衣服，就是到南开大学工作了，王梓坤也只是穿一般卡叽布的中山装，还常穿旧时农民的布纽扣便装，他开始在学校教务处工作时，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没有学历的办事员，直到他走上台讲话，课又讲得很好，大家才感到吃惊。

如今面对这些高质量新款式的衣服，王梓坤感慨万端。他认识到，国家对留苏学生这么关怀照顾，目的是希望留苏学生好好学到真本领，回国后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王梓坤决心出国后，一定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上，一定要以优秀的成绩报答祖国。一连几天，留苏学生们在准备出国，近处的学生们，常有家长和亲友们来告别，王梓坤等离家远的，只有等待动身的那一天。不过王梓坤在这几天写了几封信，一给母亲和兄嫂，一给南开大学数学系邓汉英、胡国定同志。他这几天也真是激动，有几个夜晚兴奋得没有睡好。

2. 啊，莫斯科

1955 年 8 月 20 日，王梓坤等一批留苏学生从北京前门车站坐专列客车离开了北京。在动身之前，他们脱下蓝色中山服，穿上了毛料西服，一个个潇洒英俊，好有派头。上车时，不少学生有亲友来送行，那种执手相看、欲说还休的依依难舍之情状，十分感人。王梓坤没有亲友来送行，但是他对祖国、对首都北京、对俄语专科学校、对南开大学总是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多少年来，他为上进求学一次又一次地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亲人，并没有一点孤独惆怅之感。然而这一次却不同，这是久别家乡、久别祖国的远行，将在外国几年不能回家，他想到了年老的母亲，想到深深爱他的兄嫂，他想到了王少诚、高克正等爱他的好老师，他想到了吕润林、王寄萍等好同学，想到了武汉大学的同学齐民友、欧阳绵等，想到了南开大学数学系的邓汉英、胡国定，他想到了祖国和家乡的一切。现在都要久别了，心中何尝不有些怅惘？久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大地生活惯了，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交融，那么自然顺利，现在却要离开到生活习惯迥异辽远广阔的俄罗斯地方去。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多少年来通过许多方面和口头的传说，使人们一致认为那是一个十分美好、令人向往的地方，但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仍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我们有多大差异，自己到那儿学习有多少困难，都不得而知。

火车开动了，别了，首都北京；别了，朋友们，亲人们！火车在国内走了一天一夜，到达祖国最北的边境城市满洲里。满洲

里以北就是苏联国境，真正离开祖国进入异邦的时刻就要到了，王梓坤等留学生们此时此刻，心潮特别激荡，是兴奋、是惊惧、是难过、是怅惘，都弄不清楚，或者说是百感交集吧！

过了满洲里就进入苏联的边境城市奥特堡，于是物也变了，人也变了，一切事物都不同了，那西方圆顶式、尖塔式、三角形，乃至多边形的建筑与祖国建筑迥乎不同。火车上的服务员也全部换成了苏联人，他们大个子、高鼻子、白皮肤、金头发，男子们一个个魁梧、英俊、潇洒、文质彬彬。女子们，一个个热情、大方、美丽、富有性感。留学生们与车上服务员用俄语对话，别有意趣和情味，使曾经是多么沉静寂寞的列车里，充满了活泼快乐的气氛。

火车在辽阔广大的苏联国土上飞驰，西伯利亚大平原展现在眼前，它一望空阔、雄浑浩瀚、辽远博大、含宏万汇，仿佛整个世界都包容在它邃远无际的怀抱中。火车飞快的奔驰，大地在车后疾驶，这片茫茫大地简直没有个尽头。那绿色的草地，莽莽的森林，如同一片浩瀚的海洋，是那样幽深难测，不可方物。火车往往跑了大半天还看不到一户人家，只有那一丛丛的白桦林时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它们那样挺拔葱郁，刚劲雄豪，给荒凉的西伯利亚平原增添了勃勃生机。如同俄罗斯人那刚强坚毅、豪爽大度，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个性。王梓坤曾经读过不少的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俄罗斯草原风光，曾经是多么的令他迷醉、令他向往，如今已经真真切切地展现在自己的眼前了，这风光与那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家乡是何等的截然不同。看到如此辽阔的大平原，才开阔了眼界，才知世界之大，大不可测。正如荀子所说的："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豁，不知水之深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

火车经过7天7夜的紧急行程，才到达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莫斯科，美丽的莫斯科，伟大的莫斯科！它曾经被称作世界的曙光，革命的摇篮，人们心中的太阳，世界人民衷心敬仰和向往的地方。特别是中国人民，曾经将苏联比作老大哥，当作学习的光辉榜样。莫斯科则是光辉的象征，美好的象征，理想的象征，胜利的象征。在中国人民心中，它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它是北斗，是太阳，是高山仰止，是大海浩荡，是圣殿神宫，是伟业丰碑，是天上琼楼，九重玉宇，是洞天福地，世外桃源，是观音大士在那里普渡众生，是圣母玛利娅在那里拯救人类；那里没有黑暗，只有光明；没有污浊，只有清洁；没有罪孽，只有美好；没有卑鄙，只有高尚。它是世界上一切美的集合，一切才华和精英的汇聚。它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未来，代表着世界发展的潮流，时代前进的方向，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指引前进的道路和奋斗目标。中国人民曾经用多少美好的话语去歌颂它，用多么虔诚的礼教去膜拜它，用多少个美梦去向往它。又曾经为之付出多少不可估量的惊人代价去追求它，从它那儿得到多少的鼓舞、激励，而奋斗、而胜利。

如今莫斯科就在眼前了，那高高的巨大的红星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闪耀的光辉，已经照到人们的眼前了。王梓坤等同来的留苏学生们的心里是多少兴奋啊，仿佛此时不是坐着火车来的，而且踏着天梯登上了天堂，他们多么兴高采烈，多么欢乐自豪。

来到莫斯科，他们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外出参观城市的风光，而马上被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和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成员接见了。然后他们在向导的指引下办理了必要的手续，接着就去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入学了。

莫斯科大学是举世闻名的一座历史悠久的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她是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倡议建立的。始建于1775年，以后又经过两百余年的建设，使莫斯科大学的规模已

十分庞大，特别是1950年落成的新校舍，更是雄伟壮观。主楼高24层，主楼两旁是4栋15层的副楼。均是典型的尖型式西方建筑，均显得巍峨挺立，拔地擎天。主楼里除行政办公室以外，还包括礼堂、会议室、图书馆、教室、体育馆、实验室等设施，可谓包罗广泛、一应齐备，极为方便。主楼两旁的副楼是教工宿舍和学生宿舍，共有住房3万余间。主楼后面还有单独的物理楼和化学楼。主楼正门前面竖立着高大的罗蒙诺索夫的全身铜像，校园广场上还竖立着10名俄罗斯和苏联著名科学家、学者的半身铜像。

莫斯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历来就是相当杰出的，世界第一流的，在这里培养了许多相当优秀的科学家，甚至有不少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

列宁山，其实不是山，而是一个高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莫斯科市容的美丽全景。王梓坤被人带着走上列宁山，不禁想起当时在中国大学生流行的一首苏联歌曲《列宁山》：

年轻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
让我们迎接这黎明的曙光。
从高高山上我们了望四方。
莫斯科的风光多么明丽。
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
克里姆林宫的曙光照耀，
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
我们的首都啊，莫斯科！
…… ……

想到了这里，王梓坤似乎觉得远处在这动听歌声的曲调中轻轻荡漾，他心里十分激动，热血在沸腾，青春的热情火焰在燃烧……

3. 多布鲁辛导师

王梓坤在莫斯大学的导师是柯尔莫各洛夫，他是当时享有国际声誉的最大的数学家之一，在概率学方面研究上，有许多突破性的突出成就。但柯尔莫各洛夫只是名义上的导师，实际上全由多布鲁辛来指导王梓坤的学习。多布鲁辛是柯尔莫各洛夫的研究生。他30多岁，个子高高的，可谓魁梧身材、宽宽的前额、高高的鼻子，是个风度翩翩英气逼人的男子汉。多布鲁辛十分聪明能干，是柯尔莫各洛夫的高足，莫斯科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多布鲁辛来到王梓坤的住所来访王梓坤，了解王梓坤的情况，以帮助他订立学习计划。

多布鲁辛像一位威严和睿智的将军，来到校场来检阅他的士兵，他以热情关怀的态度来询问王梓坤的情况。他首先主动向王梓坤问好。王梓坤也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向导师问好，并且总是立正的姿势。导师叫他坐下，他也不坐下，只是以稍息的姿态站在一旁。当导师问他话时，他又立正回答，显得十分彬彬有礼，而且回答十分干净利落，清楚明白。这给多布鲁辛导师以很好的第一印象。多布鲁辛对中国留学生很有好感，凡以前来莫斯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很有礼貌，热情坦诚。现在见到这个比较瘦削的中国的学生，既显得很有英俊气，又显朴实谨慎，通过见面几句礼节性的寒暄，就可见他聪慧机灵，而且透露出一种特别谦虚、诚恳，虽然还没有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就觉得大有“孺子可教也”之感。多布鲁辛问王梓坤：“你以前学习过概率论没有?”王梓坤对这个问题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当时觉得

说学过了吧，自已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并没有学过概率课；说没有学过吧，自己实际上又自学了《概率论教程》，而且读得十分认真，着实理解了其中的内容。现在既然来读研究生，还是应该说学了才好。王梓坤就大胆地说："导师，我学习过概率论。"多布鲁辛说："你学的什么教材?"王梓坤说："我学的是格涅坚科先生著的《概率论教程》。"多布鲁辛很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学了这本书就好了!"然后多布鲁辛指导王梓坤订一个学习计划，即如何按步就班地，根据所学的内容，读一些什么书，并结合读书准备将来做论文。还有哪些参考书要看。并说，以后他每个礼拜要检查一次王梓坤的学习情况。

学习就这么定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回合的成功。但当时王梓坤并不知道他对多布鲁辛导师的回答是何等关键性的重要。后来，他才知道这次回答说是否学过概率论，决定他的命运。如果当时王梓坤说没有学过概率论，就说明他对概率论毫无一点基础。这样，去读研究生是不行的，那就要降下去再从本科学起，就太麻烦了，太浪费时间了。或者甚至要将他退回中国去，这样的情况是不乏先例的。然而王梓坤终究是聪明的，有机遇的人。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有趣的事啊！这对于王梓坤来说，又是一生中许多化不幸为有幸的成功之举，这有偶然性，然而又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的条件是王梓坤用勤奋努力来创造的。假若王梓坤不事先读完用那本《概率论教程》，王梓坤就不敢如此大胆地"说谎"，因为，他是十分诚实的人，决不敢讲毫无根据的话。退一步说，即使他敢讲谎话，也会"露馅"的。若多布鲁辛来检查他的学习时，问到概率论的问题，他却毫没入门，如此高明的内行导师难道还不会看出来吗?

多布鲁辛指导王梓坤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首先读《概率论及其应用》(Feller 著）和《测度论》(Halmos 著）及《随

机过程论》(Doob 著)，还要读“泛函分析”、“偏微分方程”，除专业以外，还要学习俄语和哲学。多布鲁辛准时在星期一上午对王梓坤的学习进行检查。他好像小学教师检查小学生学习的一样严肃认真地向王梓坤提问，既详尽细致地问了书中的内容，又提出了一些带有思考性的问题要求王梓坤回答，还要检查王梓坤的读书笔记。由于王梓坤一贯读书很认真，凡是书中提到的问题，他都一一切实弄懂，从不马虎，不管花多大的精力，也不放松。并且自己能提出问题进行反复思考。所以不但多布鲁辛提出的问题王梓坤都回答得很正确完善，而且以后王梓坤还能提出一些问题，也有较大的难度和思考性，令多布鲁辛很满意，甚至有点吃惊。多布鲁辛检查王梓坤的读书笔记是十分认真仔细的。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并不是看其大概，而是逐词逐句地仔细地读下去，一直读完。以多布鲁辛对专业的渊博深沉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很快就发觉这个中国学生的笔记做得很好，不仅能全面完善地抓住书中的主要内容，而且记得十分仔细、十分认真，这是一个相当认真、相当刻苦努力的人，而且又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人。所以接连两次检查了王梓坤的笔记以后，他就不再检查了。多布鲁辛觉得，像王梓坤这样既认真自觉努力学习，又有很好基础的学生，有什么必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呢？重要的是与他讨论读书心得，问他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答，并向他提出一些思考性问题让他去研究，以使他更好更快地读完一本又一本精典著作，争取早日进入科研。

4. 志在第一流

在王梓坤所念的书中，最难读的是 Doob 著的那本大部头《随机过程论》了。在那本书之前，随机过程的书偏于直观，理论水平不太高，Doob 第一次把随机过程论建立在测度论的基础之上。由于他是开创性的，难以把一切叙述清楚，是很自然的事，同时又因作者的水平很高，许多他认为是平凡的论断，就一笔带过，而其实并不平凡，故跳跃很多，读者就难以弄懂，连苏联人也认为是一本天书。王梓坤那时还没有找到英文版，好在多布鲁辛已把它译成俄文，王梓坤就读多布鲁辛的俄文的翻译本。为了攻读这本书，王梓坤起初读得很慢，一天往往只能看一页左右，因为书中许多跳跃性的内容都要想办法补起来，等到读了几十页之后，他的水平不断提高，也大致摸到了作者写书的脾气，于是越读越快了，最后终于全部读懂了。通过读这本书，王梓坤后来总结了如何攻读名著（难著）的学习方法。写在其《科学发现纵横谈》中（“林黛玉的学习方法——谈学，从精于一开始”），认为高水平的书，读起来虽十分吃力，但读懂了则终身受益。

王梓坤深知自己过去没有学过概率论，基础差，而苏联的研究生在读本科时就系统学过几年，读了近 10 本概率的书了。现在自己要学习这门新课，并跟苏联的研究生们一起听课，一起学习，自己得多花几倍的精力和时间，才能赶上去。所谓研究生者，乃以自学研究为主也，自己基础不好，若不花时间和精力就无法完成学习任务，将愧对祖国人民，愧对自己的师长和朋友。所以，王梓坤在苏联留学期间，时间抓得特别紧，学习效果也相

当好，进步很快。王梓坤后来回忆说：

> 当时我的学习非常紧张。每天一早就到图书馆去，每次只看一本要考试的书，如 Doob 的《随机过程论》，以致图书管理员一看到我，一等我开口，就从书架上拿出这本书交给我。我的座位也是固定的，每个座位都有自己专用的灯，除了去听课，或上讨论班，我就坐在图书馆这个位子上看书，午饭后，也立刻回来，在位子上打一会儿瞌睡，算是午休。然后又开始看书，大约要在晚上 8 到 9 点钟才回宿舍（莫斯科的时间比北京稍晚些）。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的生活尽量简单些，也尽量随便些。我不习惯吃面包，但上午和中午没办法，只好去食堂吃面包。晚上回宿舍，自己在煤气炉上煮点米饭。那时莫斯科大学买东西很方便，一包一包的排骨或其它好吃的，我做一顿饭吃几天。

当时，在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常常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如每个星期组织一次篮球比赛，留学生都去观看。每个周末放一次电影，是中国大使馆派电影放映队来莫斯科大学放映，其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往往也来观看。在外国放自己国家的电影，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节日，每次来看的人相当多，十分热闹。但是王梓坤并不是每次都去看的，除了看《群英会》、《借东风》、《天仙配》、《五女拜寿》等传统戏曲片以外，其它影片，则一般不去看，他要抓紧时间看书，只是对传统戏曲，从小时以来就有着强烈的特殊爱好。

有个暑假，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组织一次游览伏尔加河的活动，时间是 10 天左右。伏尔加河是苏联最大最长的一条河流，沿途经过许多名胜地，风光十分美丽迷人，到苏联到俄罗斯，如果不去拜访一下伏尔加河，那就简直没有欣赏到俄罗斯大地上美丽的风光，是十分遗憾的。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关于伏尔加河的

美丽风光的传说，俄罗斯、苏联的文学家、音乐家和画家对它生动感人的描写，早就使中国人为之神往了。那古老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河船夫曲》的动听旋律，更是令我们惊心动魄，激起无限的想象，真想去领略一下那异国河流的异景奇情，了解俄罗斯的性格，体察俄罗斯的精神。这对于爱好文学，并读过不少苏联和俄国小说的王梓坤来说，实在是一个具体了解俄苏风物的难得良机。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是兴奋的，那“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的《伏尔加河船夫曲》的歌声就在他心中响起，仿佛那“穿过茂密的白桦林”“河水滔滔深又阔”的“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就气势磅礴地展现在他眼前了。然而，王梓坤却做出了不去游览伏尔加河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他来说，无疑是矛盾的、痛苦的，然而他却毫不惋惜地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觉得游览伏尔加河的机会是难得的，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机会则更是难得的；游伏尔加河的机会也许还有，留学苏联的机会则只有这一次而已。10 天的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10 天，按平时读书的时间计算，在 100 个小时以上，100 个小时，能看多少页书，能弄懂多少问题啊！古人说，时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人生如白驹过隙”，在苏联留学，有多少个 100 小时？人生又有多少个 100 小时？特别是在 26 岁的青春时代，时间的珍贵更是不可以用数量和代价来估计的，所以王梓坤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去伏尔加河旅游的大好机会，利用这几天时光，静静地坐在图书馆，读《随机过程论》……

王梓坤先生晚年曾对人说到，他“一生中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而浪费时光”。这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可贵的标志，现在我们来研究王梓坤先生一生成功的原因，可以说，除了他本人的天赋以外，最最主要的就在于他抓紧了时间。从这里又一次道出了古往今来一切名人成功的秘诀，欲事业成功者，抓紧时间吧！

王梓坤不仅抓紧时间学习，而且特别注意学习方法。他的方法是：首先是专一，即一方面是一本书一本书地攻；二方面是不学懂弄透彻第一本则不去看第二本。对内容大体相同的书他只选一本为学习的样本，其余的只是做题时进行参考，例如学概率论就只看费列尔的书，并结合原来自己学过的格涅坚科的书，其他人写的概率论，则只做查阅之用，坚决不看。第二是注意看书要看透。即第一遍全看懂，时刻做笔记，认真写内容提要。第二遍记忆，将所学的内容反复体会背诵。第三遍将书全部理解了，再从中搞出一个体系来，并对其中一二个问题进行深入的体会研究。

除了自学外，还要听课，他认为听课不要乱听，在头一年他就听索伯列夫、什洛夫、科尔莫哥洛夫、普罗霍罗夫和邓肯的课，其他教授的课一般不听，只听有代表性的好课。再就是不要一暴十寒，患得患失，要听就要好好听。

王梓坤还特别注意对自己学习心态的培养，他觉得不应该在思想上有负担，不要怕完不成学习任务，弄得坐卧不安，休息时也不安心。他要把学习当做最愉快的事，兴高采烈地进行，既要抓时间，又要学得轻松。

王梓坤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习，不用说比读中学时，就是比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都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以前是“自发”地学习，只抱着要学习要学好的态度学，自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此时的学习，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他不仅明确了今后主攻的方向是概率，因而目不斜视。其次是他已下定决心要在数学科学上做出贡献，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业务上要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为了这个目标，要尽最大的努力！努力！一刻不能松懈。”

有了明确的目标，学习起来就会自觉地为此努力奋斗，他对自己要求更高了。有一次，他的苏联邻居来了客人，吵吵闹闹，

搞到深夜1点，弄得他既不能好好学习，且睡不好觉。第2天起来，情绪不正常，看不进数学书，只好念俄文，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却在日记中严格进行自省："为什么情绪不正常起来，表面上是昨夜邻居吵闹有关，实质上还是自己对党交给的学习任务认识不够，没有想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在为祖国的现代化辛勤地工作着，而我却享受着留学的很高待遇。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反而情绪不安呢？这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哪怕是第一次萌芽。"这样的自省，在今天我们看来，似乎有点过分了，但我们可以看到王梓坤当时对自己要求怎样严格，他不允许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上稍有松懈。

5. 一睹名师风采

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有许多名教授、数学家。王梓坤爱去听他们讲学，这不仅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教益，而且可以见识到他们那很有特色的精神风采，以开眼界，受到激励。正如我国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说的："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上枢密韩太尉书》）

王梓坤的导师柯尔莫哥洛夫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概率论大师，他学识博大精深，思维开阔敏捷。他一登台讲学，使众多研究生们和同行学者、教授们趋之若鹜，生怕迟缺以为憾。因为他每一讲都有很多新思想，使人大开眼界。他好象一位杰出的武林高手，站在新技艺的巅峰上表演绝技，每一出手，都有新的招数，令人为之惊叹，为之叫绝，为之目瞪口呆。凡是高水平

的学者，都对他的讲学特别感兴趣。他讲起思如潮涌，创见迭出，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淋淋漓漓，汩汩滔滔，不拘时而发，不择地而至。如高崖飞瀑，珠玉四溅；如天女散花，五彩缤纷，满目琳琅；如天马行空，不知何所来而来，何所去而去。又如宋词大师吴文英的佳构，雕琼蹙绣，无数丽字一一飞动，天光云影，摇荡绿波，追寻已远。由于新的思想多，讲起来往往不够连续，加之拙于口才，有时候突然讲不下去了，他就在讲台上大声问："谁还一直在听？""救救我吧！"然而人们并没有对柯尔莫哥洛夫大师的这种超常可笑的表现感到生厌，反而觉得十分有趣，十分可爱。因为他在世界数坛上声誉很高，名气很大。他聪明绝顶，才气横溢，不可一世。如李广治军，无固定章法，随心所欲，而出奇制胜；如李白吟诗，全凭才气喷涌而出，从不寻章摘句，而一气呵成，却如天籁自鸣。

希洛夫教授讲泛函分析，最为严谨优美，他个子高高、仪表堂堂、潇洒英俊、风流儒雅，很有学者风度。上课从不带书和手稿，只是一支粉笔。他声音宏亮，语言清晰，不快不慢有起伏，有感情。听他的课，好像在听一个优秀的说书艺人在讲故事，那么娓娓动听，那么扣人心弦，那么爽人耳目，那么令人思畅神怡。随着他的凝神而沉思，随着他的启发而豁然。最有趣的是，他讲到最得意最精采之处时，就会轻轻抛起一支粉笔，又再用手接住。好像说书人在讲故事时，给人一个情节外的插曲，而具有特别的风采和美感。

索伯列夫是搞偏微分方程的大家。他非常热情，仿佛把他整个身心和满腔热血都投入和灌注在课堂里。他一到教室，就仿佛春风扑面，那样煦煦和融，那样热切温馨。他第一句向大家问好的声音比音乐还动听。不，那不是人间的音乐，是春日黎明欢乐的鸟啭，和风吹拂时的松声簌簌，明月辉耀下的泉水叮咚。他讲

起课来，令人觉得特别亲切、温暖、无拘无束。好像儿女们听到母亲的呼唤，亲朋好友在向你讲知心话。听他的课，令人觉得数学决不是枯燥的逻辑推理；而是有感情的，是美好的，知识是美好的，世界是美好的，人生是美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亲切的，使你可以信赖的，无所不可说的好朋友。他的亲切热情的讲课，叫你很快地进入角色，忘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留学，仿佛就在自己的家乡，自己村庄中的住房里，母亲坐在灯光下衲鞋底，一边与兄嫂叨叨谈话，自己伏在桌子上看小说，听远处传来一阵哗哗哗的流水声，和一声两声夜鸦的鸣叫。

庞特里雅金教授的讲课更是别具风采，他是拓扑学和控制论的大家，然而他自幼双目失明，不知他用什么样神奇的手段和力量造就了如此渊博高深的学识，说起来实在叫人难以置信。王梓坤早就听说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有这么一位奇人，很想去一睹他的神奇风采。等到有了机会，当面见识了，果然十分奇特。这位先生当然不带任何讲稿，只靠一名助手，他在讲台上口中念念有词，那位助手则为之迅速板书，他讲得相当精美，既有逻辑性又不乏新度和深度。听他的课，仿佛就在阅读苏联著名盲人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令人一方面感到他不是盲人，因为他竟然如此智睿高明，如此大大地胜过我们这些双目明亮者，一方面又惊叹他那无可比拟的才华和毅力，一个盲人竟能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更令人惊异的是，有一次，他的助手板书错了，他忽然停下来，对助手说：“你某个地方写错了。”助手一看，果然如此。教室里听课的人都十分吃惊。莫不是这位先生有所谓第六感官的特异功能？莫不是他听惯了助手的板书，从助手的粉笔在黑板上频频转动的声音，他就能分辨出写的是什么？这简直太神奇了，太美妙了，闻名实在不如见面。

讲授实变函数的门叔夫教授，上课也不带书和讲稿，却是有

条有理，一板一眼的，黑板上写得整整齐齐，讲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恰到好处，直泻而下，一气呵成。仿佛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唱经典的拿手好戏，每一个动作、台词、唱腔都表演得炉火纯青，一个拖腔，一个板眼，一个手势都一丝不苟，无可挑剔，令人只觉得玲珑剔透，珠圆玉润。又如俄罗斯文豪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我国古代诗人杜甫的诗，周邦彦的词，一字一句，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恰如宋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祭。”

见识了这些苏联数学界雄杰们的课堂风采，王梓坤仿佛李太百梦游天姥，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深感学问之大，大莫与京。如幼时读《论语》中颜渊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第九》）

6. 毛主席接见

1957年11月18日，是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盛大节日，也是王梓坤一生中难忘的日子。就是毛泽东主席接见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一个个奔走相告，欢腾雀跃，不少人甚至兴奋得彻底不眠，等待那无比美好、神圣的一生难逢的时刻的到来。

毛泽东，当时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多么神圣、多么光荣、多么辉煌、多么亲切啊！东方红，太

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是力量和智慧的化身，他是胜利的旗帜，他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毛主席。心中想起了毛泽东，那个三更半夜太阳红，眼中有了个毛泽东，那个漆黑的山路路通。毛主席的恩情啊，比山高比水长，太阳月亮比不上。没有毛泽东，中国还在黑暗中徘徊，人们还在水深火热中呻吟挣扎。是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全中国人民都无限崇拜他，无限敬爱他，相信他。要是谁能够见到毛泽东主席，那是比什么都光荣、都幸福、都自豪的事。王梓坤等留苏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来接见他们。他们将以最隆重最热烈的礼节来欢迎毛主席来接见。

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不仅莫斯科各大学的留苏学生都集合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来参加接见，还有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派代表来参加接见。那天，早上7点，人们就像过春节一样兴高采烈地走进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使平时能容纳3000人的大礼堂，已容纳不了啦，不得不兼用小礼堂和阶梯教室。许多苏联人也闻讯而来，赶到大礼堂周围观看。会场里真是人山人海，大家都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在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中午过了毛主席还没有来。留学生们就在坐位上吃了些面包和饼干之类食品充饥。吃得虽然不好，但心里十分高兴，因为这个美好的、难忘的日子是人生中难逢的、是令人兴奋的，许多人都高兴得如醉如痴，仿佛进了美丽的梦境。《东方红》的乐曲一直在大礼堂里频频鸣奏，给会场更添了欢乐和庄严的气氛，使人们更加精神振奋，更加兴高采烈。

下午3点多的时候，一位留学生干部走上台大声宣布：“刚才接到电话，毛主席马上就到。”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终于来了，同来的还有邓小平、彭真、谭震林、李富春，以及驻苏联大使刘晓等领导同志。毛主席的到来，使留学生高兴得不知做什么，也不知讲什么？只有狂热起来，连声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同时掌声一阵高似一阵，又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形成狂大的声浪，一声高似一声。毛主席不停地、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样热闹了10多分钟，突然有人大声喊："毛主席给我们讲几句话吧！"于是刘晓大使走到毛主席身边说了几句，看来是请毛主席给留学生讲几句话，毛主席表示没什么可讲的，但留学生们一再要求，毛主席只好讲起来。

毛主席开始讲国际形势，说这次来苏联开会，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并说世界形势大好。并用一句名言来概括说："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当时大家听了这句话，感到很新鲜很有气势。知道这是毛主席比喻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强大起来了，压倒了资本主义阵营。这是十分生动优美的文学语言。后来有人考证这句话来源于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讲的话。这样说未尝不可。但也不必去寻求典故出处。也很可能是毛主席信口讲来，事先并没有想到从《红楼梦》中引用而来，因为毛泽东是很有文学修养的人，他很会写诗作文章，很有才气，他即兴讲话，可以凭借他的深远修养与才气，信口而出，就往往富有创造性，这种达到高境界高水平的人，其认识事物的水平，往往不用读书寻典故，就与古代名人的话语不谋而合，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是也。如果我们硬要扯到用古代典故上去，则往往抹煞了他创造性的光彩，而带有学究气了。

留学生听到这句精深宏博的名言，受到很大的鼓舞而拼命鼓掌。毛主席越讲越有兴致，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即兴讲的话竟然如此高明精彩，富有诗意。这一段是何等的优美，他将祖国和人民对留学生的希望说出来了，把老一辈对青年的希望说出来了，何等自信、自豪，既富有理论性又富有现实性，而且生动亲切，简直是无与伦比。这一段话后来自然广为流传，成为名人名言。

毛主席讲完了话，在学生会干部们的陪同下视察了留学生宿舍，然后告辞了，留学生们掌声经久不绝，欢呼声不绝。

王梓坤当时是留学生中的党总支副书记，是留学生的“高级”干部，他自然在学生干部队伍中去迎接毛主席，并与毛主席握了手。在会场里，他又坐在前排，这对王梓坤来说乃是一生的最大幸运和殊荣，王梓坤永远记得这难忘的时刻。过了40年后，王梓坤谈起这件事还兴高采烈，激动不已。王梓坤十分敬佩毛泽东主席的雄才大略，以及艰苦奋斗精神。毛泽东原本是一个中师生，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竟然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领导落后的中国民众赶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官僚买办和封建主义，把一个偌大的中国翻了一个身。真可谓有掀天揭地，扭转乾坤之才力。王梓坤又最喜欢毛泽东的诗词，特别爱读《沁园春·雪》，认为此词的豪放与苏、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王梓坤对毛泽东主席的仰慕比一般人更深一层。现在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又与他握了手，其喜悦激动之情，何可以形容？

7. 美好的爱情

王梓坤在莫斯科大学当选为中国留学中的党总支副书记，时常要参加党组织的一些会议，而总支书记张大可住在文科学院，在列宁山下，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哈瓦亚。王梓坤住在列宁山上，要通知他开会或传递什么信息就得要请人捎带。那时，只有本科生才天天有课上，而且要到列宁山上来上课。当时有个文学系的中国女留学生谭得伶，是文科党支部书记。她住在列宁山上，但天天要到列宁山下的文学教学大楼去上课。于是她便成了党总支书记和党总支副书记王梓坤的义务通讯员。王梓坤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开始并没有对谭得伶引起注意，后来接触多了，他便对谭得伶产生了一种不平常的看法，他觉得这位女同学有着一般女性不同的特点，她美而不媚，美得端庄、秀雅和不俗，是那样天生的质朴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成份。她单纯，单纯得如无瑕碧玉；她真诚，从来不知道人间有虚假二字。在王梓坤看来，这女同学令他分外亲切，他只希望她天天来送信。虽然王梓坤对于多开会，要占时间的政治活动是不大喜欢的，但是他总希望她天天来送通知，一天送两次更好。同时，谭得伶也渐渐觉得王梓坤这位比他大几岁的老兄式的人物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青年，他那在政治上的老练，在学习上的十分刻苦努力，简直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于是他们渐渐地以心相许，进而相爱了。王梓坤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终身伴侣应该是感情上的知音，事业上的契友，他觉得谭得伶是合乎这二者的最理想的人。莫斯科大学，这个50年代苏联的最高学府，既是青年求学猛进的好地方，又是青

年男女青春跃动的好地方，多少优秀青年男女，在这里汇聚，他们在这里施展才华，也在这里寻找他们幸福的爱情。

俄罗斯小伙子的热情、豪爽、率直，俄罗斯姑娘的大胆、多情，时时可见成双成对的少男少女，将他们的强烈感情，迷人风采毫无顾忌地展示出来，他们火一般的情怀，象西伯利亚平原开阔的胸襟一样地恣肆放旷，无拘无束。每当节假日，那迷人动听的舞曲四处频频地响，一对对男女青年拥人舞池，他们用心神、用动作、用目光、用话语掀起那爱的狂涛，撩起那爱的火焰。就是在图书馆、食堂里、操场上或林荫道上，也都在翻腾着爱的波浪，俄罗斯姑娘的无拘无束，热情妖娆，一个个像春天阳光下的蝴蝶，在到处寻找着甜密的花蕊。这一切，对于一个并非痴呆的人来说，难道没有感觉？这时，正当年青的王梓坤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想到自己的目标任务，怎么能为爱情而过多地用去宝贵的时间。汉代名将霍去病说的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何等有英雄气！对自己来说：一个人尚未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时，是不应该在爱情上太花时间的，自己应当甘于寂寞。故成大事业者，必然苦其心志。谭得伶能理解王梓坤，他们是何等地心心相印。一方面两个都是坦率诚恳的人，好学习有志气的人。二方面，他们都是祖国派到苏联这个头号社会主义大国来学习的留学生，而且他们都是年青的共产党员，在那个年代，年青人要参加共产党是很不容易的，入党条件很高，领导上往往带着严格挑剔的眼光来审核年青人。那年月入党的人毫无疑问的都是各方面很优秀的，在政治上品德上都是可以放得心的。带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他们当然要抓紧机会地学习，不容许将时间浪费掉，因此他们很难得一起出去散步，更不会一起去跳舞看戏。而是克制着，像苦行僧一样艰苦奋斗，尽量把时间都用在事业上。其实他们很幸福，最有共同语言，他们是最好的人生伴侣，一个比诗还

迷人，一个比画还美丽。

此外，他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谭得伶老家是湖南祁阳县，在零陵出生的。而王梓坤也是随父母在零陵出生的。似乎有缘份带有传奇性，简直是巧合天缘。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他们相约来到列宁山的边缘，让莫斯科大学高大的主楼的影子掩护着他们，让莫斯科郊外的夜幕拥抱着他们，他们面对着莫斯科河，让缠绵深情的暖风一阵阵吹过，和着远处动听的乐声。他们默默地对视着，没有话语，没有拥抱，只用眼神互相告诉着，爱上了，深深地爱上了。正好这时附近响起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
在这迷人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就在我身旁，
偷偷看着我不声响，
我想开口讲，又不知怎样讲，
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
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谭得伶将她与王梓坤相爱的事写信告诉了自己的爸爸，征求爸爸的意见。他如实说王梓坤有点机械，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读书，连节假日也不放过，她装着好像受委屈似的。谁知她的好爸

爸——谭丕模，这个北京师大中文系的全国著名教授，得知后十分高兴。他喜出望外地觉得女儿真有眼力，找了这么个有进取心的有志气的女婿，这个潜心于学问的老教授，感到自己的后辈中有了一个好知音，他心里十分高兴。可惜谭丕模先生过早地溘然长逝，可惜他没有看到王梓坤以后的成长发展，更没有看到今天这位乘龙快婿已登上世界科学高峰，当了科学院士，不然，他会更加高兴的。

几度春去秋来，几度花开花落，三年留学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王梓坤优秀的论文——《生灭过程的分类》，在莫斯科大学的学术答辩会上被一致通过，莫斯科大学授予他副博士学位（相当我国现在的硕士），学成回国了。而谭得伶比他早一年就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本科毕业了，回国后分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1958年7月王梓坤也从苏联毕业回到北京，当时，国家高教部组织留学生学习政治，王梓坤住在谭得伶家里，见到了即将成为岳父的谭丕模教授。谭教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王梓坤。那时王梓坤已29岁，谭得伶也已26岁，可惜谭得伶的母亲早逝了，没有母爱，没有细心的母亲来关心她。父亲谭丕模教授忙于工作，没有想到他们俩已是大男大女，该结婚了。而那时候的人，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像现在的青年人这么大胆、开放，他们不会随便提出结婚成家的要求，况且他们还刚刚回国不久，工作需要时间，经济上也薄弱，似乎条件尚未成熟，他们还不及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谭丕模先生所在单位有位女教师关心他们，向谭教授建议给他们办婚事，谭教授才恍然大悟，觉得是应该为他们办喜事了，于是马上和他们二人商量，并决定了。他们的结婚仪式相当简单，只由他们家的保姆邱云仙阿姨去买来一条床单、一些糖果和西瓜，他们花3角钱去办了个结婚证，请亲友们在一起吃糖和西瓜，就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这在今天的年青一代看

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谭丕模先生这样的一家是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是很正常的。

谭丕模先生当时是全国闻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家，湖南祁阳人，生于1899年。他大哥谭丕绩，是民主主义者，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又亲近共产党，曾在北京掩护过陶铸（著名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陶铸危难之时，给陶铸化了一个名，做临时工。其大哥的言行对谭丕模先生的影响很大。谭丕模自幼在家乡读中小学，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受到《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政治活动。1927年参加了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被特务逮捕入狱，两个月后由战友营救出狱。192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8年－1930年任北平《晨报》（宣传革命的报纸）社会新闻和教育新闻副刊编辑主任，与吕振羽（革命家、历史学家）等参加革命活动，以后又在北平教书。后经张致祥、岳一峰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北平教联。曾掩护过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刚，使之免遭军警逮捕。1930年与曹靖华、齐燕铭、管彤（张致祥）、李何林等组织北平文艺家协会，他担任理事。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长沙，与吕振羽等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战后援会。同年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和文教委员会主委等职。曾在湖南武冈县塘田市（现归邵阳县管辖）战时讲学院任课。后又到迁往湖南溆浦县的民国大学任教。1941年溆浦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他失去了与党的湘西委员的单线联系。其后他又到贵州和广西桂林等地，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解放后，当时的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同志来看望他，陶铸同志为他送来了《毛泽东选集》，后谭丕模先生任湖南大学中文

系教授（2级）兼任系主任和民国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担任长沙市文联主席和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南文联和中南作协常务理事。1950年由周小舟同志介绍重新入党，担任湖南大学党委委员，1952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谭丕模先生在学术上很有成就，除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外，还著有《宋元明思想史》、《清代思想大纲》、《中国文学史纲》等13本学术著作，其中《中国文学史纲》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1958年10月份，谭丕模先生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并应邀乘飞机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访问，到开罗大学讲学。一行6人，著名文学家郑振铎任团长，在途经苏联（哈萨克地区）时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闻讯后，谭得伶与王梓坤悲痛欲绝，他们尊敬的父亲怎么就一下子没有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而且祸不单行，同年7月底，王梓坤的母亲又病逝于江西吉安老家。这两件不幸的事，使得他们俩几个月中，一直沉陷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会当凌绝顶

第五章

1. 我爱南开

1959年9月，王梓坤回到南开大学数学系，系领导人曾鼎铄、邓汉英、胡国定和教师像欢迎亲人一样热情地欢迎他。王梓坤也感到自己好像一只曾经远走高飞的鸟儿，此时已飞回了自己的窝里，一切是多么亲切、温馨、自由、自在。

学校房管科将他安排在离校门口不远的北村2栋一楼的106号房间居住，那是一间很差的房间，面积只有9平方米，设备十分简陋，又潮湿又黑暗。房管科负责人不好意思地对王梓坤说："你暂时住在这里吧，以后为你换一间好的。"王梓坤素来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虽然他在苏联留学时住的是条件十分好的套间，与现在这间简陋的小屋比起来，简直是武松与武大、西施与东施的区别，但王梓坤所追求的是事业与学问，对于这些物质待遇全然无所谓，他似乎不当一回事，于是二话没

说，愉快安然地将行李和书籍搬进了106号小房间里，而且一直住了20年。

王梓坤在南开大学数学系，人缘很好，从领导到群众，从老年到中青年都对王梓坤很友好。系里3位领导对王梓坤都很看重，邓汉英书记、胡国定副主任待他如兄弟情谊。曾鼎铄教授是前辈式的人物，是学者，曾主任是党外人士，对王梓坤这个年青人十分看重，他认为王梓坤是德才兼备的好青年，对王梓坤的业务能力十分赞赏，见王梓坤的俄文学得很好，就在1952年冬天约王梓坤和他合译一本俄文版的《变分法教程》（苏联两位科学院士著的）。作为一个教授、系主任，愿意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青助教合作搞学术，可见这位教授对助教的看重，也可见年青助教的水平了。王梓坤当时是挤出时间译的。即他每天中午少休息半小时，提早上班，利用这半小时进行翻译，坚持下去，半年多时间就译出来了，并在1953年出版了。

当时系里还有位老教授叫杨宗磐，教函数论与概率论，曾留学日本，很有学问，藏书也很多。杨对王梓坤十分赞赏，曾多次对人说王梓坤是“后起之秀”。杨的资料，别人很难借到，对王梓坤却例外，凡是王梓坤需要的，或是王梓坤介绍别人来向他要资料，总是有求必应。不幸此老先生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使王梓坤不胜怆然。他的丧事还是王梓坤出面料理的。

王梓坤之所以一到南开大学就赢得人们的好评，是因为他既有水平、有能力，又积极肯干。他曾抽调到教务处工作，协助处长安排教师上课等教务工作，走来走去，十分忙碌，但一切工作都安排得很好，令大家很满意。

他除了在系里教课以外，还参加办各种补习班。1953年，他参加办干部补习班；他在教数学，那个班主要是学高中课程，有50多个人。当时班长是个女学生叫劳安，成绩很好。此人就

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夫人。

王梓坤认为自己这次能回到南开大学继续任教，是平生之大幸。南开，这所名扬中外的综合性大学，向来以它优秀的学风和博大的精神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特别是南开人优秀的为人作风，很好的人际关系，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传为佳话，奉为楷模。那充分地关心人、体贴人、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团结一致的优良传统，从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以来，代代相传，历久不废。据说解放前，许多名教授宁愿辞退别的学校的高薪待遇，而来到南开拿低薪待遇，原因就是南开人际关系好，总是文人相重，成人之美；从不互相嫉妒，互相拆台。王梓坤是一个十分厚道的人，而“所在厌机巧”（杜甫语），他最喜欢南开这种团结和睦的气氛。

王梓坤这次回到南开大学，比以前更成熟更优秀了。不但已到“而立”之年，处事为人比5年前更老练得多了，在业务上已成为骨干了。他从苏联获得了副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是个学位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从苏联导师那里学得了世界第一流概率论专业知识，成为“术业有专攻”的人，而且懂得了进行科研的方法，他已明确了主攻方向，选好科研课题，决心在教学与科研上大干一场。

这时的王梓坤好像一名经过严格训练的、攻防都优的战士，全副武装地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雄赳赳、气昂昂地去攻克敌垒，将是势不可当、一往无前的。

他像一颗优良的种子，已经长时间在肥沃的土壤里孕育，此时就要发芽，就要生长，长得生气勃勃、郁郁葱葱。

他像一只幼鹰，经过母鹰的长期哺育，此时已经毛羽丰满、翅翮劲健，马上就要飞上蓝天，去凌云搏击、一展雄姿。

王梓坤是党员，而且是有一定资历的老党员，所以他回到南

开大学数学系，被选为系党总支委员，当时系总支书记是邓汉英副教授，系副主任胡国定，也是党总支委员，系主任曾鼎钚教授，是党外人士。在当时提倡党是领导一切的情况下，系里的事大都由邓汉英、胡国定和王梓坤3位党总支委员来研究决定。他们3人可说是天缘巧合，有3个层次，邓汉英最大1919年生，比王梓坤大10岁。胡国定1923年生，比王梓坤大4岁。邓汉英和胡国定这2位都是十分厚道的人，他们为人正直，待人真诚，从不忌才。他们秉公办事，又十分关心人。王梓坤则是搞学问的，没有私心杂念。邓汉英早在1952年就当上了副教授，那时候当副教授是不容易的。胡国定也是学概率的，在学术上有成就，后来当了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博士导师。他们3人很合得来，邓汉英做事老成持重，认识水平高，不保守。胡国定办事很有魄力、有气度。王梓坤则聪明、点子多、有办法，无论什么为难事，王梓坤都能想出一些妥善的好办法来处理。他办事秉公，总为系里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和学校、国家的利益着想，并从长远打算，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他的点子总是可行的，总是被采纳，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

例如，南开大学过去对教学十分重视，对教学抓得紧，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扎实而且全面。但是对科研重视不够，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工作能力还不错，就是缺乏科研能力，缺乏创造性，这种做法对培养学生成才不利，特别是对培养高一级的人才很不利。这个问题在数学系十分典型。王梓坤觉得这个情况必须尽快改变。王梓坤认为高等学校一定要搞科研，首先他在数学系里提出加强科研工作，得到邓汉英和胡国定的支持，从此以后南开大学数学系由单一地抓教学转变为既抓教学又抓科研，而且只几年时间，就有明显效果，不少教师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同时系里十分重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

的质量，使大家科研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

邓汉英、胡国定是王梓坤的好同志、好朋友，他们不仅很赏识王梓坤的才华和工作能力，而且事事处处关怀爱护王梓坤，他们及时肯定王梓坤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成绩，进行表扬鼓励，并及时向学校领导汇报，将王梓坤评为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并3次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邓汉英和胡国定为了保证王梓坤在教学与科研上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他们将平时的行政琐事留给自己做，尽量不叫王梓坤做，给他省出时间来干事业。王梓坤曾多次谈到邓汉英、胡国定2位教授对他以兄长般的关怀和爱护。孟子在论述人们成就大事的条件时曾说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个人在成就一番事业的过程中，能得人和，也就是说能得到领导和朋友同志的支持，是最难得的最可贵的。刘备曾无弹丸之地，后来拥有蜀地而发展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是因为有诸葛亮等人的支持。前秦符坚有王猛的支持而强大无比，后来失去了王猛，就兵败肥水，一蹶不振。人们在世界上生活、学习、奋斗，绝不是孤立的，任何成就都难孤立无援地进行，即使是帝王将相也是如此。

人实在太需要真诚的朋友了，需要互相帮助，文人相重，团结一致，才觉得融洽舒畅，才会没有许多不必要的矛盾，才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人生是美好的幸福的，你的事业才能很好地发展。如果人们相处，总是互不信任，互相忌妒，文人相轻，今日你踩我，明日我踩你，天天搞斗争，弄得人人自危，只能把精力白白消耗，将大好时光浪费。几十年来，我们国内，运动不停地搞，人人都"阶级斗争天天讲"，结果不仅互相伤了感情，破坏了团结，而且影响了经济建设，使国家赶不上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潮流，国家长期处在经济落后的状态，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当然，人民内部也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也需要批评，需要思想斗争，但那是应该首先从团结的好意出发来进行的，决不是将别人当作斗争对象，将别人当作敌人来斗争，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好像只有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别人讲一句不同意见的话，写一篇不同意见的文章都容不得，一定要进行批判，就说人家是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观点，且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怎么能团结起来去干一番事业呢？这样的历史教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是很多的。

王梓坤能够遇上胡国定、邓汉英这样的好同志，实是平生有幸。但我们想一想，这难道仅是外部的客观条件所致吗？与王梓坤本身的主观条件没关系吗？不是的，这与王梓坤本人的品德修养大有关系。首先是因为王梓坤本人为人厚道，修养好。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梓坤也是胡国定、邓汉英一样的好人。王梓坤总是与人为善，常常关心别人，照顾别人，把方便让给别人，从不搞别人，害别人，他不谋私利，不占便宜，不搞特殊，总是谦虚热情、真诚地待人，既不争名，也不争官当。所以王梓坤每到一处都受到好评，人们都关心他，照顾他。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假如王梓坤不是有这么好的修养，就难以得到别人的关心了。

2. 六年拼搏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5 年上半年，这 6 年时间，是王梓坤搞教学和科研的黄金时间，他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在这 6 年内搞出来

的。这段时间，他抓得最紧，可谓争分夺秒、吃大苦、耐大劳、奋力拼搏，一天24小时，他除了正常的饮食起居以外，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利用上了。他是党员，又是系党总支委员，参加系里的领导工作，因而必须参加一些会议，进行一些政治工作和业务领导工作。这必须占去王梓坤不少时间，使王梓坤用于科研的时间比一般教师要少。幸运的是，从1960年以后，国内的政治运动不搞了，省得了好多麻烦。因为1958年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吹牛皮、搞浮夸，结果工农业生产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1960年出现了全国粮食不够吃，副食品短缺的严重灾情，人们连肚皮都填不饱，哪有精力去搞政治运动，再者党内那些搞极"左"思潮的人，因为搞大跃进栽了跟斗，遭到了大家的批评，特别是遭到事实的报应，此时也只得收敛一下，暂时不敢掀起政治运动。这样，倒给王梓坤一个有利条件，他可以不在政治运动中白白地耗掉宝贵的时间了。

但是王梓坤以为光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抓紧时间，不浪费一刻一分。"人生能有几回搏?"王梓坤总是以这一句名家名言来激励自己去抓紧时间搞科研。因而他在生活上一切从简，将衣、食、住、行不放在心上。王梓坤一贯对穿着极不讲究，总是随大流，买来衣服就穿，从不挑剔。他夫人和儿子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在南开大学总是在食堂里吃饭，从不自已开火做饭菜，因为要费时间。即使是冬天，房间走廊里有公共火炉可用，他也不自己做饭菜。王梓坤"吃食堂"可有很漫长的历史，学生时代不算，就从参加工作算起，一直吃了40余年，可说是高纪录，这又是后话了。即便是吃食堂，王梓坤也是与众不同地简单从事。一般人总喜欢早点去食堂，以便买得有营养的好菜。即使花长时间排队等待也无所谓。王梓坤则最怕排队浪费了时间，所以总是很晚了才去食堂里买饭菜，晚去了一般

买不到好菜了，王梓坤也无所谓，好在1960年到1962年3年困难时期，好菜按计划供应，凭票购买，不然王梓坤的营养就得不到保证，健康会大受影响。王梓坤买菜，也往往爱买盐蛋、皮蛋、干豆腐香肠之类，因为这些菜可以收藏，买一次可吃几餐，这又节省了一些时间。

那几年，南开大学的教师们总是看到王梓坤一大早就起来了，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带着两个竹篾壳子的简易热水瓶，去打开水，好像一个普通工人那样朴素、简单，甚至寒伧。他那辆自行车也实在破旧得不像样了，黑漆已大都脱落，脱得多的地方又涂了一些红色的磁漆，更显不堪看了。好友、邻居刘泽华先生笑着对他说："老王，你这辆车，不用评比，肯定是南开大学第一破车，早该不用了。你这样，恐怕是等成名后，让你家乡的人以此为材料，为你树碑立传吧?"

王梓坤也笑着说："刘老兄，这破车有个最大的特点——你知道么？——没有敢偷!"惹得刘泽华更加大笑起来了。

王梓坤住的那间房子——北村2栋106号房，也大概是南开大学第一陋室了。前面提到，那房子才9平方米。原本里面连一张桌子、一个书架都没有，仅仅一张破旧的床，王梓坤平时多在图书馆和教研办公室写作与阅读。书全堆在地上，朋友们说这样不行，会弄坏书的。王梓坤幽默地说："没关系的，比我的命长。"后来友人刘泽华为王梓坤找来一个办公桌，又找来一张双人床，作为书架。王梓坤为之十分满意，而十分感谢刘泽华。

那房子又是封闭的盒式设计，两边是房子，中间是走廊通道，通道才1米多一点，里面又被别人堆了一些东西，两个人对面而过，有时要侧着身子才行。几间房子成品字形，王梓坤对面那间有12平方米，左边那间有11平方米，都比王梓坤那间宽一些。王梓坤那间房子门的右边是一间整个楼房用的公共厕所。冬

天还无所谓，夏天则臭气很大，一打开门就闻得到，何其难受。通道里有个砖砌的炉灶，作为三家公用做饭的，不过王梓坤不用它。106 房的窗户是北向的，在这北方是吃亏的，因为天气严寒，北风很大。一般情况是向北的窗户里双层玻璃以防寒冷，但此房例外，也许是它过于简陋而配不上安双层玻璃吧。窗户不远有个锅炉房，遮住了光线，使得 106 房白天也要开灯，才可看书。但也有个好处，即挡住了一些北风，又提高了温度。后来锅炉房搬走了。每当严冬，凛冽的北风从窗缝里吹进来，呼呼作响，整个房子冷得如在冰窖之中。本来，按当地习惯和学校规定，冬天可以在室内生个火炉子，以提高室内温度，但王梓坤觉得很麻烦，要花时间，很划不来，就不生火炉，宁愿挨冻。坐在凳子上看书写作不行了，就坐在床上用棉被盖住下半身，用一个讲义夹子代替书桌进行写作。并将电灯开关的拉线接长固定在床架上，以便掌握电灯。天津的冬天冷到零下 10 度左右。每天冬天，洗脸巾和茶杯里的水也结冰了，其室内寒冷的程度可想而知，其难受难堪的情况亦可想而知。但是王梓坤总是抵抗着寒冷，坚持进行对概率论的研究。

王梓坤本是个感情丰富、爱好广泛的人，他不仅喜欢数学，而且爱好文学，他爱读诗歌，爱看小说，曾经整天不放手，看得如醉如痴。他爱听音乐、爱唱歌，特别爱看京剧。他还会拉琴，并且拉得不错，有登台表演的水平，曾多次上台独奏过。他也爱看体育比赛，也很喜欢交朋友、侃大山。而此时，除了星期六晚上去欣赏一下京剧以外，其他一切业余爱好都戒绝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王梓坤从理性上认识到，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专一，必须目不斜视，精诚致志，必须戒绝对事业有影响的种种爱好，否则，“行衢道而不至”。（《荀子·劝学》)。他明白记得，小时候跟王少诚老师读《四书》，其中有孟

子一句话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为”（《孟子·离娄》）这实在是至理名言，道出了人们治学做事的正确经验。一个人如果这样也去干，那样也去干，结果一样也干不好。

前面提到，因1958年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国民经济，特别是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农民不去干农活，误了农时，稻子、蕃薯烂在地里无人收，粮食大减产，又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浪费严重，到1960年出现全国性的缺粮、缺蔬菜和副食品，全国性的人人吃不饱饭，连北京、天津这样国家第一等的大城市也一样。当时全国各高等学校也出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缺粮少菜现象，什么东西都按计划供应，人人饿得荒。很多教师和学生因缺乏营养而得水肿、肝炎等病。人的生命已在接受严重的挑战，事实上许多地方已饿死了很多人，特别是河南省，这个办人民公社和办公共食堂的始作俑者，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提倡休养保命，当时各高等学校只坚持正常的上课，其他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前面提到，这虽然在时间方面给王梓坤带来了有利条件，但是要饿肚子，营养不良乃是一个威胁到生命的大问题，这对王梓坤是一次最严重的挑战。是将科研继续下去还是停下来休息，这是命运的抉择。如果停下来休养保命，的确逍遥自在，一天只上了几节课就可以在床上睡大觉，或者到农贸市场上去转悠，买些吃的回来，烧起火炉煮着吃了。然后去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在象看几页闲书消遣消遣，如何不好，但这样科研成果就没有了，而且1960年是王梓坤搞概率论研究一个最好的开端，他此时已进人研究的最前沿，若此时停下来保命，则是半途而废，甚至前功尽弃了。这对一个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人来说，无异于自杀，甚至比自杀更可悲。自杀了，一死了之。而活着，事业无所成就，在有志气的人看来，不如死去。王梓坤就是这样的把

事业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有志者。王梓坤总是有着不断向前的强烈进取心，要他停下来不学习、不研究是不可能的，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的，什么名利也引诱不了的，他一生中只有他的事业，他的数学，他的概率论研究。只要有一口气活下去，他就得坚持学习，坚持研究，他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和毅力。

当时，虽然面临着严重的灾难，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利用那难得的大好时光，继续坚持搞下去。·现实是严峻的，困难是很大的。每餐3两米饭，蔬菜也不够，白天忙于工作，有时还不觉得，到晚上坐在房子里看书写作，肚子饿得难受，只好喝一杯开水。后来市场有高级糖卖了，他托人去买一些，不管价钱高也要买，晚上饿了就吃几颗。后来农贸市场上逐渐有东西买了，王梓坤又托人去买些红薯、萝卜之类，晚上饿了就削一个吃，倒也很解决问题。红薯，含有淀粉，不用说可以充饥，山区农民往往以红薯为半年粮。北方的萝卜，又硬又大，可以当水果一样生吃，有营养又有甜味。这样，王梓坤过几天，或托人或自己去农贸市场买些红薯和萝卜，如此饥不择食地解决晚上饿肚子的问题。

谭得伶女士对王梓坤搞科研的支持是相当大的，当时他们正当青春年少的一对美满夫妻，可谓两情缱绻、两意绸缪之时，然而他们为了各自的事业，一个在南开大学，一个在北京师大，两地分居。他们本来可以调动在一起的，他们又何尝不想在一起，朝朝暮暮、卿卿我我呢？然而若是那样，他们双方的事业将会受到影响，谭女士是从事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北京师大是全国高校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心，她若离开北京师大，专业就要受到很大影响。而南开大学是全国高校的概率研究中心，离开了南开王梓坤的概率研究也会受到影响，何况南开的“人和”是再难遇得到的。所以他们为了工作只得忍受着分居之苦。

天津和北京相距不远，坐火车也不过两小时就可到达，他们

若要每个礼拜相聚一次，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为了事业，他们并没有这样，而只是每个月相聚一次，有时王梓坤一个月也没有回家一次，这对正当青春年少两情绵绵的夫妻来说，诚然是痛苦的。平时他们都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而每当星期天休息日，看到人家夫妻双双对对，一种离情之苦便油然而生。特别是“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时”其情更苦。王梓坤后来回忆说：他在忙了一天之后，静而休息，不禁想起柳永《雨霖铃》词中的名著：“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然而，不久又想起了秦观的《鹊桥仙》词：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是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更何况他们的情，已不完全是在卿卿我我、缠缠绵绵的儿女情上，他们的情是在两颗追求事业发展的心上，只要各人的事业有成，他们的情才得以最大的补偿，他们的心才得到最大的安慰。世界上有多少以事业上的追求来维系着美好爱情的痴者和智者啊。赵明诚与李易安，马克思与燕妮，居里与居里夫人，周恩来与邓颖超，他们都是以事业的执着追求做为他们爱情的方舟，为了事业他们不惜放弃了多少耳鬓厮磨的朝朝暮暮。

王梓坤和谭得伶的科研有成就、事业充实，他们的爱情比普通人的爱情更美好，更珍贵，他们的爱情乃是人类爱情中一支最不平凡的美好动听的歌。于今他们年近古稀了，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光，倍觉欣慰和甜密。

谭得伶女士，以一般女性没有的最大气度，支持王梓坤搞科研，她把那无穷的青春企盼，都化作无穷的慰勉。

谭得伶真可以称做伟大的女性了。她集善良贤慧于一身。人们常说：一个男人的辉煌成就后面便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为之做出牺牲，为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如夏娃之于亚当，嫘祖之于黄帝，长孙皇后之于李世民，马皇后之于赵匡胤。是的，谭得伶女士名门闺秀的出身和深厚的文化教养与道德修养，使她既有现代女性勇敢进取的精神，又有中国传统妇女的那种伟大的牺牲精神。她贤淑娴静，任劳任怨，最能够理解人体贴人。她深知王梓坤那种为事业而万难不惧，勇敢攻坚的性格和欲知人所不知的精神，而自己包下了所有的家务事，使王梓坤毫无后顾之忧，又时时从她那里得到鼓励。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王维民降生了，这将为他们增添不少麻烦，然而谭得伶女士不愿意王梓坤来分担这养育儿女的责任，在孩子没有出生前并不通知他，直到孩子生出来以后，才找人告诉他这可喜的消息。第二个儿子出生也是一样，王梓坤只是在孩子上学以后，他才开始出题目给他们做，为培养孩子他还是出了大力的。

谭得伶女士不仅担任养育儿女的责任，而且在学问上大有所成。她在北京师大任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并设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高尔基研究等课程，对20世纪俄苏文学进行了长期系统、深入的研究。培养了硕士研究生11人，正指导博士生2人。出版专著、教材、译著10余部，主要著作有《高尔基及其创作》(北京出版社)、《现代欧美文学》(合著，北京师大出版社)、《世界文学史》(合编，高教出版社)、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译著有：《高尔基文集》(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联文学史》(合译，北京师大出版社)。1992年起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虽然3年困难时期是那样空前的困难，时间又是那么长，但

由于王梓坤有极大的毅力，终于坚持抗过来了。他的所谓抗过来，不仅是活过来了的意思，而是将概率论研究搞出成果来了。等到 1963 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人民肚子可以吃得饱饱的了，一些“左派”政治家觉得又要搞政治运动了，在党的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这个最高指示贯彻下来的时候，王梓坤已预感到搞科研的时间不长了，政治运动很快就要开始了。果然，在 1964 年，已开始在农村里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城市里搞“五反运动”。或许是当时毛主席的着眼点还在经济上，还没有注意到文化思想战线上。当时的政治运动还没有在学校里开展，只是在理论上学习学习而已。这使王梓坤又十分有幸地赢得 1963 年以后的 3 年多时间，直到 1966 年下半年将他调到农村去搞四清为止。

就这样，王梓坤在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6 年上半年这 6 年多的时间内，王梓坤以奋力拼搏的精神，抓紧时间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

在教学上，每年开两门课，即《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并办了 1 至 2 个讨论班，带了 3 届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本科生。在科研上，写出了 10 多篇概率论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国家一级的数学研究刊物上，写出了 3 本学术专著，即《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前一本在 1965 年出版了，后两本因“文化革命”的原因，当时来不及出版。等到“文化革命”结束后才出版。

3. 一次难忘的讲学

60年代初期，随着王梓坤在概率论研究上连连取得新的成果的时候，王梓坤的名声在南开大学一天天上升。而最产生轰动效应的是1961年11月初，他在南开大学数学系做了一次学术报告，名叫《关于数学自学的方法》。虽讲的是自学方法，实际上讲的是他的进行科研的经验。听众是中青年教师和广大学生。这次报告会十分成功，不仅在全校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天津市各高等学校。在此以后，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师院都先后邀请王梓坤去做这个同样专题的讲学，有不少人听了一次又一次，甚至有些教授也来听了。如今时间已过去30多年了，不少人还对王梓坤这个学术报告留有深刻的印象，讲起来还啧啧称赞。

王梓坤当年才32岁，正当青春年少。这时，在别人还在科研上多方摸索，不得法门，甚至有些人还未窥其门墙，而他却在概率论研究上连连取得新的进展，达到了国内第一流，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实在令人敬佩不已。在这种进入科研顶峰的情况，南开大学数学系的领导人胡国定与邓汉英将王梓坤推出来向世人亮相，乃是十分高明的举措，有如优秀导演张艺谋，将经过历炼成熟的演员巩俐放在《红高粱》中扮演主角，而推到大名星的地位，让世人翘首以望，拭目以观。是何其盛壮，何其风光。

报告会是在南开大学数学系的一间平时开大会的、能容纳数百人阶梯教室里举行的，这次人来得特别多，不仅本系的师生全到了，还来了不少外系的师生。而且一边听讲，一边来人，坐无虚席，连过道里，窗台上，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不少人站

在教室外面听。

王梓坤当时何等豪情满怀，浩气凌云，正所谓“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胸有成竹地将自己的读书与科研的经验用精炼而具体又生动的语言一一告诉听者。讲的内容正是人们在读书与科研中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今日经王梓坤一点破，如拨云雾见青天，听者茅塞顿开。所以效果特别好。

王梓坤好像一位凯旋的将军，洋洋洒洒地向人们谈他如何克敌制胜，令人惊心动魄的不凡经历，又像是一位取得大丰收的农业劳模，在向人们传授他如何在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开垦出良田，夺得高产的经验，他是那样欣然自得，昂然自信，他虽然那样年青，却已是一个满腹经纶、身行万里、眼高四海、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学者了。他站在数学科学的最高层次，犹如站在一座高山的顶峰上，向人们指点着所俯瞰的四面山景。真是登华岳而知众山之逶迤，临东溟而知大海之汪洋，因而他的谈吐能临高境界，而发人之未发，超越流俗之上，切中于肯綮之间。

他首先说，人的读书应立志求高，不可平面徘徊，应“扶摇直上九万里”，不可只有量的差异，应有质的飞跃。读过一本书，学过一门课后，就要接着学后继高水平的课，读高水平的书，方向明确，大步前进，直到科研前沿，虽然“造极顶尚多福地”，但应“登此山已是壶天”。不要老是学同等水平的内容。正如宋代文学名家严羽所说作诗一样，“入门须正，立志须高”，须有第一等志气，第一等目标，才有第一等成果；并且只有如此，才能快出成果。

接着他十分切实地讲了如何读书和搞科研的方法。这些内容十分切中要害，振聋发聩。

他特别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深和博的问题，他提

倡最好还是博一点，但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要以订的计划为主，在这个基础上，有精力再兼顾其它。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才算读好一本书呢?”他提出要分三个阶段将一本书读完。首先是局部地读，主要是尽最大可能搞懂基本概念和定理与证明。这样当然有不少困难，那就要坚持从头到尾循序渐进，手脑并用做笔记，用手写可以帮助动脑筋，想得仔细，特别是自学者有好奇心和急躁感。同时用手写也容易发现问题，手写能使精神集中，可以专心致志。读完一遍，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搞不懂，那就多看几次，尽量弄懂，若看一两个小时仍不懂就不再看了，接着往下看，但这样对不懂的问题已有了深刻的印象。第二遍读，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第一遍读时留下来的问题进行重复读，第二遍读，要花第一遍的一半时间，如此，问题逐步解决，不懂的越来越少了。

第二阶段是整体阅读。即一要把一本书前后内容整体地联系起来，把书中的内容与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二要适当记住，最好背它一遍，在记忆时要记住例题，例题是定理的最好说明与补充。记住例题，往往就记住了定理。

第三阶段是进一步消化。最好是将第 2 章的东西放到第 1 章中去消化，他说他试验这种效果很好。他把这种方法叫“拆下安上”。这样能使他对书中的主要内容灵活掌握。

在读书中，发现一些问题或有些问题虽不是自己发现的，但知道它很重要，这些问题往往在看其它书时解决了，有些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就留下来，记录起来。而且要将其孤立起来，结晶出来，看如何解决，在哪一方面哪一点，以缩小“危害区”。

其次，王梓坤谈到“专题研究”。他认为读书不是只将别人的知识读懂记住就了事了，应该从中选专题进行研究才好。读书只是手段，研究、发现、创造才是目的，读书是为了研究。“从

读书到研究是一个飞跃。一个人的数学知识水平，不完全在于他懂得多少，而以突出尖端为主的，这是数学界所公认的。”而专题研究重要的是选题。选题有3种。1. 历史性悬案问题。如费尔马问题。2. 比较值得研究，但没有几个人去研究这个问题。3. 某些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料，但缺乏统一的理论，而价值又很高。但王梓坤认为第1、3种选题难以搞出成果，应以第2种适宜。

选好专题，就要着手进行研究了。先应有个构思阶段，以确定一个大致的研究步骤。当然以后在实践中还会改变。有了大体步骤，然后再采取各种方法进行研究。如预见结果法、类比法、选择法等。选好一个专题，要掌握大量材料，然后将自己关在房子里与外界隔绝，不分昼夜地干，一口气干几天。解决了问题最后落实成文，成果就出来了。

最后，王梓坤还特别提出两点：

1.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有些人同样寿命、智力也差不多，但有的成就大，有的成就小，主要是精力集中和不集中的问题。

2. 人的成就在于艰苦劳动。苦，实则是甜，只要钻进去，再走出来，就会感到其乐无穷也。

他这个报告，当时对年青学子，启发很大，好像一颗明星，照亮了在黑夜中前进的摸索者，好像沁人心脾的清泉，使人们饮了头脑格外清醒，决心在科学的大道上奋力迈进。

从这个学术报告中，人们还看出一个重要的特色，即不仅是在科学上以其新颖、深刻、实在的特点吸引听众，而且语言形象优美，且有文学性，王梓坤在讲话中不时引用文学典故和诗文名句来说明问题。当他讲到集中研究一个问题时即用《庄子》“目无全牛”的典故来解释，在谈到治学过程的艰苦性时，他用清人王国维关于古今成大事业的3个境界来说明。即：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人间词话》

王梓坤在报告中用这许多古人名言说明问题，既使读者听起来易懂有趣味，又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4. "四清"与"文革"

1966年上半年，王梓坤刚刚讲完《随机过程论》最后一节课，就听到消息说，学校的师生要分期分批下农村去搞"四清"，进行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梓坤此时已预料到，自己要下农村去搞"四清"了，于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什么叫"四清"呢，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不知道。所谓"四清"就是要在农村干部中"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方式是由国家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农村去。首先叫社队干部靠边站，以接受清查，通过访贫问苦，一个个揭发问题，然后叫干部们人人过关，有问题的要受处分，甚至下台。后来落实，多数是不切实际的。

要知识分子参加"四清"工作队，并不是对知识分子的信任，而是要知识分子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当时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都要进行改造，哪怕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要进行改造，改造的方法就是下农村、下工厂，进行体力劳动锻炼，认为搞体力劳动的，思想才

最先进，搞脑力劳动的，就是资产阶级。

王梓坤于1966年7月参加“四清”工作队，被下放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曾小营公社搞“四清”，同去的还有四年级学生张润楚、王祥、孙炳昆、王树筠、郑学侠、程锦英等。盐山县是当时河北省最贫困的县。他们参加了曾小营公社“四清”工作组，工作组政委一个是副县长，姓王，他妻子也在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王梓坤被分配到一老农民夫妇家里吃饭，他们家里没有其他人，屋里还算比较干净。老大爷的最大心愿是想补一颗牙，王梓坤给了一些钱给他补，他十分感谢。王梓坤在老大爷家里餐餐吃不上米饭，都是吃糠做的窝窝头、野菜和薯片煮粥，没有菜，有时有一小碗生白菜，用盐拌一下。劳动强度却很大，每天要四次出工，即早上、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去劳动，主要是挑水抗旱。每天到了下午，王梓坤和学生们都累得骨头像散了架，走一步都很艰难。当时王梓坤36岁，在工作组里年龄算最大的，更是感到受不了。况且平时在学校里教书搞科研，好久没有搞过体力劳动了，这下子突然来搞体力劳动，活又这么重，实在是为难已极了。那个王政委和张组长都是很有世故经历的人，搞运动的“老油子”，整人很有一套办法，且心狠，对知识分子又十分歧视。他们生怕王梓坤等人不服从领导，而想法首先镇住这些人。就采用十分艰苦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来折磨他们，以使他们服服贴贴。其次，要镇住村里的农民们，不使农民有任何反感。于是每天天不亮，就吹哨子叫王梓坤等人起床，集合跑步，沿着村庄绕一个大圈子，边跑边喊，一、二、三、四，喊得震天响，让农民知道工作组不是好玩的。第三是开展访贫问苦，查帐目收集干部的问题，说这个干部有问题，那个干部问题不少，调子唱得很高，来头很大，但到后来都无法落实。

王政委将大家整治得差不多了，就不叫工作组人员出工了，在家里学习文件，王梓坤等人这下子才松了一口气。但因为伙食太差了，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饿得慌，每个礼拜包一次饺子吃，大家吃得如同山珍海味，但光吃这一餐怎么行？大家真想到商店买些东西吃，但那位政委规定，工作组成员不能到商店买东西吃。那位政委和老婆住一家比较富裕的农民家里，吃得很不错，只有王梓坤和学生们在吃苦。

有天晚上，两个学生告诉王梓坤说，那位政委和他老婆在商店里买烧鸡吃，王梓坤问到底是真的么？那两个说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王梓坤想平时这两个学生很老实，觉得他们不会讲假话。于是就说："那好，我拿钱，你们去买几只烧鸡来，大家吃。"那两个学生买了回来给大家吃，大家说真好吃，如同人间绝味。

在农村搞"四清"，除了看政治文件外，其余的书是绝对不准看的。此时王梓坤最挂念的一件事就是自己那本100万字的《随机过程论》已交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并已得到发排出版的通知，现在不知消息如何，王梓坤十分挂念这件事，这是他第一次出版书，而且是一本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又在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是十分有意义和十分有幸的事。对于一位学人，一个作者来说，没有比得知自己的第1次的作品（书）将要出版的消息更高兴的事了，好像一个妇女得知自己的儿子就要降生那样喜不自胜，而且那样担心如何地生下来。

王梓坤在来搞"四清"之前，就托付了他的学生吴蓉说，如果有出版社来的信件，请一定快些转寄过来。两个月之后，吴蓉写来了信，并将《随机过程论》的清样托人带来了。信中说，她已为王先生校对了第1次，请王先生要校对第2次。王梓坤接到了信和清样以后，兴奋不已。终于看到自己写的书排成了铅字，这是他几年来努力拼搏的成果，也是他10余年甚至几十年来的

幻想变成了现实，同时这又是他今后学术大起步的开端，那高兴之情是无法形容的，使他那饥饿瘦削的面容上也焕发出异样红润的光彩，使他忘了疲劳，忘了饥饿，忘了一切不愉快的事。

然而自己如何来校对这个清样，则是十分为难的事。首先是没有时间，在那里搞“四清”从早到晚，一天安排得紧紧的，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其次是退一步说即使有时间，也不敢用来搞校对。那年月已明显地表现出只有所谓空头的政治，只要搞阶级斗争，其他一切都不要了，还要什么科学研究，还要什么概率论了，如果公开拿出来校对，一定会受到工作队领导人的批评，那些半桶水的领导人，本事就瞧不起知识分子，你若再搞业务，他会更加忌恨你，会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读书多了，越读越愚蠢，搞这些名誉，违反纪律。”或许会招来大批判甚至处分。对于这一点，王梓坤很清楚，和那些人是无法解释的，“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想来想去，王梓坤实在为此事发愁，忽然他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好办法：夜晚有被子笼住全身，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进行校对。他这样试验着，效果很好，每晚才搞两个小时以上，而且别人也不知道，连同一房子住的人也无法发现。如此搞了10余天，终于将《随机过程论》的清样校对完了。

人们不禁要感叹，王梓坤尽是创造一些人所不能为的奇迹，抄字典，步行去考大学，在9平米的陋室里写书。这些奇迹的创造说起来是十分惊人的，但在王梓坤这样一个为学习、为科学而艰苦奋斗的人来说，又是十分自然的事。他确是有着不同于一般人，即不落流俗的品格。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如此不落俗的表现。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引用宋代诗人姜白石的话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则言之，诗便不俗。”诗便不俗，就是好诗，甚至是难得的好诗。一个人也是如此，要有不落流俗的言行，才是有作为的人。所以我们从王梓坤

打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校对书稿的事，便可以得知王梓坤是一个很作为的人。而其实，当时他已在概率方面搞出了突出的成果，已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学者了。

王梓坤在河北农村搞“四清”为时半年多，直到 1966 年 2 月才回到南开大学。他在农村搞“四清”，领导美其名曰是让“知识分子在农村经受锻炼，接受再教育”，其实对王梓坤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耽误了他半年的搞科研的宝贵时光。在这半年里，他会写出一篇甚至两篇论文来的，至于对学生的教育效果更不可估计了。而且更可惜的是从此以后，王梓坤的科研与教学就告一段落了。“四清”回校以后，紧接着就是“文革”10 年动乱开始了。整整 10 余年不能搞科研了。这不仅对王梓坤是个天大的不幸，对全中国所有有志气有良心的人都是个大大的不幸。不过在王梓坤来说，又是有幸的，就是在此以前，他通过 6 年的紧张拼搏，已将科研成果搞出来了，他的概率论研究已有突出的成果，还达到国内外第一流的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重视。这是多么难得啊，这是王梓坤很好地抓住了机遇，也是王梓坤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机遇，有几次关键时刻需要抓住，如果抓住了，就能成功，没抓紧就不会成功。特别是最关键的时刻。在王梓坤来说，上固江小学、上吉安中学、上国立十三中、上武汉大学学数学，到了前苏联留学学概率，这都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关键。然而最关键的乃是在南开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5 年上半年这 6 年时间，他抓紧这 6 年时间，集中精力搞科研终于有了突出的成绩。若没有抓紧，就来不及了，一生可能就默默无闻。当时他才 30 多年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雄姿英发好用功之时。若此时没抓住，再经“文革”10 余年，他即快 50 岁了，垂垂老矣，还有多大搞的。孔子曰：“四十五十而不闻，斯亦不足畏也矣。”（《论语》）

即是说人到四十多岁以后，精力差一些了，若还无成就，想再搞就很为难了。这难道不值得人们鉴戒与深思么？

王梓坤实在是一个善于抓住生命中的机遇的人，他抓住了“四清”前的6年，乃是抓住了黄金时光。以后这黄金时光就难以再来了，这对人们是一个很切实的教育和启发。我们由此不禁想起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最后一首：杜秋娘的《金缕衣》

>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王梓坤从农村回到南开大学，已是风云突变。

中国历史上空前巨大的政治劫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劫难是由毛泽东主席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等坏人利用的。这场劫难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革知识分子的命。凡是有水平的，在业务上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在劫难逃。

1966年夏季，南开大学和全国各地一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当权派”，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此时，南开数学系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他们的矛头很明显很集中，就是向邓汉英、胡国定和王梓坤开火。邓汉英、胡国定是系领导，理所当然是被整的对象。而批王梓坤的大字报最多了。王梓坤不是当权派，但他是党总支委员，而且又是十分能干的人，人们明显地知道，系里的事情凡是有新点子者，都是王梓坤出的，何况王梓坤语文水平高，凡是一切有水平的报告文件，显然是由邓汉英、胡国定出面贯彻，而实际上是出自王梓坤的手，譬如提倡系里写论文，加强科研的良性循环等。何况王梓坤的业务水平又拔尖，已接近反动学术权威的水平。我国历次的政治运动是“枪打出头鸟”，谁拔尖谁就可能会被打倒。正

如苏轼曾在他的名作《贾谊论》中深有感叹地说："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唐代文豪韩愈地说："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原毁》)。系办公室和各教研室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揭露和批评王梓坤搞业务是走白专道路，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他自己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接班人。

王梓坤看了那一张张大字报，先是十分吃惊，他大惑不解，不知这个时代，走进了什么样的历史误区。为什么不读书，不搞科研的反而是最聪明、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努力搞教学与科研的人，反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而有罪？为什么在20世纪世界科学如此迅猛发展的时代，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居然连科学文化都不要？

看到大字报，王梓坤不是为个人的委屈而难过，而是为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感到十分遗憾，虽然他心中怀着很大的反感和厌烦情绪，但是他并不苦恼，而是泰然处之，一笑了之。

系里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说邓汉英、胡国定和王梓坤三个支委是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样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他们三个太一致了，太团结了，他们一直对数学系的工作抓得很紧，而被批评为积极贯彻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另一个重点就是集中批判王梓坤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果，认为他不应该在这方面拔尖，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他应该和平常人一样混日子，无所作为，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

一张张大字报，对王梓坤平时强调教学和科研的言行和成绩，进行揭露批评，好象要将王梓坤在南开大学数学系批垮批臭似的，似乎还要他臭名远扬。而实际上，王梓坤却由此在南开更加出名了，许多原来对王梓坤并不了解的人，了解了王梓坤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分子，而产生敬佩。据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

士导师刘泽华教授说："我和王梓坤年纪差不多，都住在北村2楼，由于不在一个系，平时毫无交往，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在进楼见面时，敷衍地点点头而已。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梓坤被当做白专典型进行批评，针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爱人原来在学校办公室工作，当时被派到数学系参加文革小组的工作，她看了数学系的大字报，回来后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里住的那个王梓坤吗？这个人原来很有学问，很了不起。从数学系对他的大字报中看出，他很厉害，他的业务水平很拔尖。我说，原来如此，只怪我们平时对他毫不了解。从此我对王梓坤肃然起敬，主动和他交往，以致后来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深入，运动斗争的对象已转向当权派，王梓坤不是当权派，所以渐渐不被人们注意，而被冷落了，后来又形成了两派，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为时长久的派性斗争，这对王梓坤来说乃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自甘寂寞，从不参加哪一派去搞派性斗争。前面说到，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正常，自己决心不卷进去，以免后患。

然而，文化大革命在南开大学搞得轰轰烈烈，一幕幕的悲剧发生在王梓坤的身边，使王梓坤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南开大学原任党委书记高仰云，被红卫兵多次批斗，几乎打得半死，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就走到相邻的天津大学投湖自尽了，尸体在外面摆了好几天。

天津大学也有人到南开大学教学楼的8层楼上跳楼自杀，死了还总是睁着眼睛，可怜至极。

南开大学的副书记娄平被打成黑帮，他多次被装入麻袋包，被人拖来拖去，轮番批斗。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多次挨打，被红卫兵用石灰弄瞎了一只眼睛。副校长吴大任，多次被批斗、毒打，弄得又聋又瞎。

数学系教授杨宗磐，是南开大学非当权派的知识分子中遭遇最惨者。他早年留学日本，教学十分认真，平时只专心念书，并不出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去劳动改造，他的下放在农村的长女又揭发他有反对毛主席的言论。于是，他的妻子与他断绝了关系。他白天在外面挨批斗后回到家，还要被妻子女儿批斗，最后被折磨而死。

赵昭彦，原来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留校任教。文革初起，被调离南开，到塘沽某中学去教书，不意档案转去，中有“反毛”材料，曾多次被批斗，当活靶子，他不堪受辱，卧轨自杀。各系的老教师如胡国定、刘晋年、曾鼎鉌、邓汉英等都被打成走资派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每个人身上挂一块大牌子，头戴高帽子，去农村下队劳动，走在前面的还要打一面“劳改队”的小白旗，出发前排成横队，由红卫兵训话，训完后每人依次讲自己的罪恶。一天早上，王梓坤路过物理系办公楼，正好碰上红卫兵在对这些“黑帮”训话，王梓坤顿时心惊肉跳，赶快溜走，那边的红卫兵正在大声呵斥，他差一点被截住。

整个南开大学都乱套了，课全停了。当时全国各大学，乃至各中小学也全乱套了，全国各个单位都停班了，工厂也停工了，一切都乱套了，正是所谓“天下大乱”了。

如此这般的天下大乱，在中国整整持续了10年，当时任何人都在劫难逃。王梓坤此时想继续搞科研已经不可能了。全国各地的大学里的教学科研已不再进行，别说上课教学，连图书馆也不开放了，工作人员已不再上班。图书馆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将图书馆彻底封存了，不然就会被红卫兵拿出来烧掉。不少教师们的藏书已被红卫兵抄走焚毁了，出版社除了出版《红旗》杂志和毛泽东著作外，一律不出其他书籍，所有科技杂志都停了刊。因为当时的政治舆论认为，科学技术也会导致修正主义，使国家

变了颜色，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是当时政治家们的精炼概括。在这种条件下，谁还可能去搞科研呢？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少有人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肉体生命去与无情的现实做孤注呢？

中国向何处走，人民向何处走，难道就如此地将知识和知识分子践踏到18层地狱，而使中国从此永远走向愚昧和黑暗？难道人民文明在20世纪的中国到此就要毁灭，再回到那“厥初生民”的原始时代？对于这一点，王梓坤是始终都不相信的。他似乎觉得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挫折，也许就犹如大河奔流千里何尝不有一曲？又如时光飞逝，何尝没有乍寒乍暖的时刻。他觉得读书还不能丢，科研还要继续搞，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绝不能放弃。作为一个爱国的、正直的、有志气、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丢掉读书、放弃科研。虽然这年月是何等粗野残酷，知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从未被如此轻视过，就连秦始皇“焚书坑儒”都只是坑了460个非议朝廷的儒生，对其它的不反对他的特别是对搞科学的并未迫害，何尝这样大面积地践踏和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呢？这难道是所谓“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吗？

王梓坤是一个执着的人，他的良心促使他不能放弃科学研究，不能放弃对知识的探求，于是他就利用这个人们不再十分注意他的时机，默默无声地回到他的北村2号楼106室，在那9平方米的陋室里，继续读他的书，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将几本当时流行的每人当备的政治书放在案头，以防万一。有人来检查时，好应付掩饰一下。

王梓坤有时也到外边走一走，他密切注意了解时局的动态发展，了解和他要好的胡国定先生等人的遭遇如何！同时也了解他们和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以及了解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

命运会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王梓坤能够如此，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了。在当时，有谁不被那种强大的历史潮流所裹挟，有谁不被那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政治信条所冲击，政治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生命和一切，一些人为它趋之若鹜，一些人为它胆战心惊，无人能免。可说是比吃饭穿衣，比活下去还要重要的头等大事，谁都要对它顶礼膜拜，谁都要像奉信宗教的教徒一样为自己的信仰而发狂，他们只有信仰，没有其他的一切。为了信仰而不顾一切。根本不会去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人们也不敢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生的价值。人们似乎都在一个昏沉沉的睡梦之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清醒的智者，才会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担忧。象屈原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大无畏者，如范仲淹那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古往今来，能有几人？这种高洁的品质，何其可贵。此时的王梓坤，我们并不敢说他已达到了屈原和范仲淹那样的高度。但是，比起那些被一种错误的见解所蒙蔽，而被任意驱使，一味地盲动得发狂的芸芸众生，却要清醒得多，高明得多。无论如何也算得周敦颐笔下的一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着自己的清白。

王梓坤进行科学研究已经不行了。于是，他转向科普工作，他将自己原来读书时随手抄录的几大本有关科普知识方面的笔记拿出来，准备写一本关于科学发现方面的的科普读物。他翻阅着，准备着，打算分若干小题目，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一方面运用他积累的丰富的科学知识，一方面调动他的文才，将文章写得既具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具体目标确定了，王梓坤就为之付诸行动，为之奋斗。

此时的南开校园，派性斗争越来越激烈。红卫兵分成了许多

个派别，有些教师也卷了进去，在进行你死我活，激烈长久的斗争，谁也讲不清谁对，谁也说服不了谁，有如天作高山，地作洪流，彼此都改变不了自己的顽性。彼此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其它各地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各种各样的小报有如雪片一样在校园里到处飞传着，大字报则有时销声匿迹，有时又突然间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校园，武斗也是不时地发生。

这是一个多么混乱的人生和世界，一个多么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流程。在这种情况下，王梓坤想到只有用庄子所说的“虚静”二字来镇住自己的心。把身外的一切都看成虚的，既要看到身边无穷事，又要“莫思身外无穷事”（杜甫）而静观万物，以达到“万物静观皆自得”、“思入风云变态中”（程颢）。王梓坤在家潜心写自己的著作。他想起了古人所谓“人是人非都不管，花开花落却关心”的名联。文化大革命中的是是非非谁也管不了，谁而也讲不清，只可静观以待，关心自己的著作的成功与否，关心流逝着的美好时光。

一段时间过去了，王梓坤写了不少文章，都秘密地藏在自己家中，此时不可以对人说，也不敢对人说。只等将来有机会再拿出来发表出版。也许这一生没有发表出版的机会了，那就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吧！想到此，王梓坤有点怡然自得了。

然而草创未就，他就被国家地震局调去搞地震预测工作了，同去的还有吴蓉、朱成熹、胡龙桥等人。他们用概率论来推算地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功准确地预报了四川省松潘地区的地震，他把研究地震预报的成果写成了论文，发表在《数学学报》和《地球物理学报》上，又与钱省玮合写了《概率统计预报》一书，后来出版了，被人们用来作预测地震的参考书。只可惜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王梓坤他们没有预测到。据他自己后来对刘泽华教授说，原因是他们没有按照当时的公式推算下去，如果按照公式继续推算下去，则会在范围之内。等到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王梓坤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就决心细心地推算一次，结果果然在范围之内，这使他十分后悔。王梓坤一生有许多的成功，令人欢欣鼓舞，他自己也感到平生少有遗憾之事。唯有这一件事情，使他后悔之至，成为终身遗憾。

5. 只把春来报

1977年11月，王梓坤由地震队回到南开大学，刚走进北村2号楼106室，放好行李，好友刘泽华先生就走来向他问好，并告诉他说："你要升教授了！"王梓坤不以为意，以为他是开玩笑，因为当时"教授"是一个贬义词。文化大革命中，"教授"这个头衔已经取消了，那些老教授都成了批斗的对象，中国当时可说是斯文扫地。"教授"这个词不再是知识分子水平高的标志，更不再是受人尊敬的称呼，而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甚至还有牛鬼蛇神的含义。后来，许多友人都告诉他这个消息，但王梓坤当时还只是一个讲师，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个升法，是升为正教授，还是副教授呢？

1977年，天津市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从各大学中挑选几个在教学与科研上成绩突出的最优秀的教师破格提拔为正教授，以树立典型。于是各个学校都挑选了名单上报，市领导最后挑选出两名，一名就是王梓坤，另外一名是天津大学的贺家李。

这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中国文化知识界元气的一件

大事，天津市是试点单位，在全国是首创。当时在全国宣传得影响最大的杰出数学家，在北京工作的陈景润，还没有被升为正教授呢！为此，天津市政府十分重视，领导上决定为让此事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特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于 11 月某日在天津体育馆召开了万人大会，其实参加的人远不止一万人。天津各界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参加了大会。10 余年来，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受到中外历史上最大的摧残，此时人们都普遍要求文化复苏。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这也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

当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的主要内容后，当王梓坤、贺家李两位教授走上讲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四起。领导同志的讲话，宣布了天津市革委会文教组“关于提升南开大学讲师王梓坤同志为教授的决定”（1977 津革文 705 号），决定中指出：

> 王梓坤同志 20 多年来，勤勤恳恳，刻苦认真，献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学术上，他致力于概率论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特别是在生灭过程构造方面的研究，从方法到结果都有独到之处。此外，在生灭过程的泛函分布、马氏过程的边界问题、遍历性、零一律以及马氏过程的其它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在国外数学杂志，以及我国的《中国科学》、《数学学报》、《数学进展》等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受到国内外有关数学家的重视。他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在概率统计的应用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他与六机部七院七所协作，开展随机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的研究，取得了成果。
>
> 王梓坤王梓坤同志与数学系的几位教师共同协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地震预报的统计方法，并在预报中取得很好的成

效，多次受到国家地震局的简报表扬。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在有关的杂志上发表了5篇论文。王梓坤同志的理论著书有：《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等；翻译书籍有邓肯的《马尔科夫过程论基础》等。对国内概率论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贡献。

王梓坤同志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治学严谨，热情负责地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对基础理论研究精益求精，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总结了历史上科学研究的经验，写了《科学发现纵横谈》一书，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

教授，这个曾令多少知识分子羡慕的头衔，它曾赢得了不仅是知识分子本身对它的尊重，而且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它的尊重。因为它代表着智慧、代表着高层次的知识水平，代表着一个人努力读书而取得的真才实学，这样的人无疑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虽然，知识分子的奋斗不是为了取得这个头衔，但是它可以激起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促使自己更加努力，为国家、为人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一个学校的教授，不仅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种鼓励和激励，而且，对于学校这个群体，也是一种光荣和自豪，是一种无形的无穷大的现实的潜在的力量。那些将学衔的设置视为“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人，若不是愚昧无知，就是有意摧残国家的知识和人才。

对王梓坤来说，在49岁这个近于知天命的年纪，得到这个教授的头衔，是太迟了。据他的水平，早在30多岁时，他的概率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时，他就应该当之无愧地当正教授了。虽然王梓坤对头衔并不太在意，但是那个时代对他是何等的不公正，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那个时代，不仅是对王梓坤，而是对所有

的在劫难逃的人都是不公正的，人们应该得到的荣誉和利益却没有得到，人们不应该得到的灾难，却偏偏让他们得到了。当把这种灾难强加于人时，还要用一些高尚的名词来美化之，这是多么深重的时代悲剧啊！但是，应该说，王梓坤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和贺家李先生在当时还是最先得到这个头衔的，他们是被当作典型来受到表彰的，而又是破格提升，其意义已不仅仅王梓坤与贺家李两位本身了，而是在于揭示出一个新时代特色的开端，其意义是无比深远的，不仅引起了国内的巨大震动，而且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当时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录相，做了专题新闻报道，香港的文汇报也向海内外做了醒目的专题新闻报道。真可说是：

化雪响惊雷，万象更新春来早；

凌寒吐奇葩，百花竞艳梅占先。

王梓坤对自己破格提升为正教授万分激动，他觉得这是党、国家和人民对他的极大关怀和鼓励，祖国的发展需要文化科学了，发展科技事业的大好时光来到了。他自今后更应该努力为祖国的文化科学事业做贡献，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粉碎“四人帮”以后，王梓坤从各种迹象看，早就预感到，祖国大地科学文化的春天到来了，自己应该为迎接这美好的春天，多做一些事。他应该像红梅那样“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除了搞好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以外，还应该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他想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写完的那些科普文章，此时正可以用来宣传一下。于是他检点起来，乘此大好时机将它写完。由于原来已写了大半，这次再审阅补充，很快就写好了，计算起来已有50余篇，可以集成一本小书了，他将这本书稿取名为《科学发现纵横谈》，准备送到天津某出版社去出版。但是，

王梓坤是个治学很严谨的人，他觉得自己写这样的科普文章还是初次，应该送给好友刘泽华先生看看，征求他的意见。

刘泽华先生以挚友的情感和文科行家的眼光，阅读了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的原稿，觉得十分新鲜、十分优美、十分引人入胜，很有价值。对王梓坤说此书一定要出版。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刘泽华先生将此书稿送给当时主管南开大学学报的娄平教授要他先推荐在学报上发表，娄平教授也不愧是一个高水平的行家，一看就觉得很好，并一气看下去，整夜不睡，十分兴奋。看完后，即告诉刘泽华先生，此书稿将会在南开学报上连载，只要作者稍作修改就行。这样《科学发现纵横谈》中的文章在南开大学学报 1977 年第 4 期上与全国的广大读者见面了。殊料，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几千封读者来信象雪片一般地飞来，向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索取这一期的学报。这些读者中有大学生、中学教师、有干部、职工，还有学界名流，连在全国赫赫有名的顾颉刚教授也来信索要，但是南开大学编辑部已经没有存书了，只好问王梓坤本人要，王梓坤自己也只有两本了，但也送了一本给顾颉刚先生。南开大学学报从此一下子订数大增，从原来的 1 万册猛然达到 5 万余册，这个空前的订数致使南开大学学报“洛阳纸贵”，名声鹊起，在全国造成轰动性效应。而且以后订数不断上升，很多人要求将以前的几期学报补齐，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只好一再地再版重印，以满足广大读者狂热的要求。王梓坤也从此在全国名声大噪，紧接着上海人民出版社致信王梓坤，表示要尽快将此书出版。于是，《科学发现纵横谈》在 1978 年 2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印数达 5 万册，以后又连续再版，共达 45 万册。后来又被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去年，北京中华书局又向上海人民出版社买去了版权，以更新更美的形式出版此书（印 1 万册）。《科学发现纵横谈》不是一般的科普读

物，而是一本构思新颖、见解精深的优秀的科普读物。此书曾经获过“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1981年），并被国家教委（教育部）、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全国青少年100种爱国主义图书之一，以后又由国家“希望工程”作为500本优秀图书之一，赠送给1万所农村中小学。

之所以说，《科学发现纵横谈》优秀，是因为在书中作者以渊博的科学知识和对科学发现的深入了解，用清明流畅的优美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中外古今各个领域的科学发现的实况，从而大大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增长了读者的科学知识。

作者以天马行空般的，汪洋恣肆的思辨能力和不容置辩的严密逻辑性，与腾天潜渊、探骊寻珠的高超手段，向读者揭示无数杰出的科学家们是如何以科学研究为天职，以创造发现为已任，而殚思竭力含辛茹苦地献身于科学事业的高尚品格，以及他们如何取得科研成就的一般规律和高深莫测的天才般的奇思妙想的特殊思维。

作者又用“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高超严谨的治学方法，洞悉历代科学发现的奥秘，结合自己长期致力于科学研究并卓有成就的切身体验，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阐明自己对科学发现的见解，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作者还用“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深层思索，将所论述的林林总总皆上升到哲学性的高度和理论的深度。从科学发现的事实，折射到广阔的社会人生，使本书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仅只停留在科学发现的单方面的阐释上，而有如诗如画般的无穷韵味。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高致逸响，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理深思，真可谓“无穷如天地，不绝如江河”。

此书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作者凭借着即理即文的博学多才的丰富知识和很高的写作能力，用文学的语言写科学的知

识，将抽象的逻辑思辨附丽于具体和华美的形象化语言表述上。或用比喻、或用拟人；或用对偶、或用排比；或用反复、或用对照；或用诗文名句增光添色、或用典故逸事画龙点睛；而文采斐然，风流楚楚。如繁花集锦、云霞在天；如莺唤起一庭佳丽，燕迎来遍地春光。且行文腾娜变化，挥洒自如，淋漓酣畅，气势飞动。令人读后不仅可以得到许多科学知识因而增长智慧，而且还可以得到语言文学艺术美的享受。因此，《科学发现纵横谈》在中国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王梓坤成为一个优秀的科普著作家，而名声大噪。我们可以说，学术里了解王梓坤，是他在概率论方面的杰出成就；教育界了解王梓坤，是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首先倡议建立教师节；而广大群众了解王梓坤，则是他写了《科学发现纵横谈》。

6. 硕果累累

1984年4月6日，王梓坤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于是，他离开了曾经工作过32年的南开大学，离开了与他多年友好相处的胡国定、邓汉英、刘泽华等好友，到北京师大去任职。

王梓坤离开了南开大学，标志着他的科研工作可以做一个大体的总结，让人们得知作为著名数学家的王梓坤到底有些什么成就，这些成就有何价值，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王梓坤的科研成就主要是：

一、发表了概率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科学》、《数学学报》和《数学进展》等国家级的高级科

研刊物上。

二、出版5本学术专著：

1.《随机过程论》　（196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

2.《概率论及其应用》　（197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

3.《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　（197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4.《概率与统计预报》　（197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5.《布朗运动与势位》　（198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出版科普著作2本：

1.《科学发现纵横谈》　（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多次再版，以后又由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新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新版）

2.《科海泛舟》　（1985年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四、发表科学方法论及科普知识文章数10篇于《光明日报》、《自然杂志》、《科学与生活》、《方法》等报刊上。

王梓坤的科研成就，主要表现他发表的20多篇学术论文，和出版的《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及其应用》等3本学术著作中。

这些论文与专著，将世界上概率论的研究在一些方面推进了一步，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使王梓坤成为我国概率论研究的主要先导者之一，是我国概率论的主要学术带头人。

是他在世界上，首创了概率论的极限过渡的概率方法，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用极限过渡的方法，找出了生灭过程中所有的延拓”。前苏联概率论专家尤什凯维奇教授在文章中评论说：“W·费勒用分析方法构造了生灭过程的不同延拓，……同时王梓坤构造了全面的延拓，……他找到了全面的生灭过

程，从而彻底地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

是他，首创用差分法研究生灭过程泛函的分布以及停时与首达时的分布，得到了深入的结果。这两项工作后来也被国内一些同行所发展，同时也为一些国外大学、科研单位所称道。

是他，还用递推方法研究积分型泛函，发表了论文《生灭停留时间与首达时间的分布》（《中国科学》1980.2），此文发表后，收到 9 个国家（美、法、西德、东德、印、捷、以、荷、意）17 个单位（大学或研究所）来信，索取此文的单行本。

是他，对马尔科夫过程的一般性质，获得了一般（非齐次）马尔科夫过程无穷近与无穷远 0 – 1 律成立的充要条件。10 年后，世界上才有人将他的研究进一步发展。

是他，在国内最早研究多指标马尔科夫过程，在国际上最早引进多指标奥恩斯坦——乌伦贝克过程的定义，并取得了较系统的成果。

他还研究了马尔科夫过程与位势论的关系，求出了布朗运动与对称稳定过程未离球的时间与位置的分布。他又研究了地震的统计预报及随机过程的模拟问题。这些，反映在他的《布朗运动与位势》和《概率论与统计预报》等专著中。

以后，王梓坤还从事于超过程的研究，并取得了“超过程的幂级数展开”等一些成果。

王梓坤还进行了概率论应用的研究，他领导南开大学统计预报组的学术研究。此组首创“随机转移预报方法”、“利用国外大震以报国内大震的相关区方法”等。曾多次报中过一次地震，特别是准确地报中了四川松潘地区的地震。受到国家地震局的重视，并因此获天津市科技 2 等奖。还结合地震进行地震移动的理论研究。此外，他还与国家军事部门合作，在计算机上模拟随机过程，作为海军导航之用。

王梓坤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国内外引用在100次以上。

王梓坤的《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及《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等3本重要学术著作，均由国家一级的科学出版社出版，从基础到前沿，构成一套完整的概率论研究体系。其中《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列入科学出版社“纯粹与应用数学专著”第5号。其英文版（与杨向群合著）已由我国科学出版社和德国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国外科学家评论说：“这是一本优美清澈的书。”这3本至今还有参考价值，还被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作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研究生学习概率论的主要教程。《随机过程论》已多次重版，印数已达10万余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也多次重版，印数超过10万册。《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虽然有“其曲弥高，其和愈寡”之难，但印数也在1万册以上。

王梓坤在学术上的成就，使他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这些荣誉是：

1. 全国自然科学奖　(1982)
2. 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　(1985)
3. “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
4. 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　(1981)
5. 三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1961年、1979年、1982年)
6. “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1984年国家劳动人事部授予)
7. “建国以来优秀科普作家”　(1990年全国科普作协授予)
8. 澳大利亚马克里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1988)

9.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1年当选）

10. 北京师范大学、汕头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11. 被云南大学、南开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聘为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

百年树人亦英雄

第六章

王梓坤在1984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标志着他在教育工作上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前面我们写的是王梓坤作为一个著名的数学家成长和取得成就的过程，然而王梓坤首先是一个教师，一位教授。他整个的工作内容都是围绕教学工作这个中心任务的。他的科研成果是为教学服务的，对于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王梓坤热爱教育工作，他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像王少诚、高克正那样为培养后代而不辞劳苦的教师。长大后，他终于成为了一名教师，并毕生为之奋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教育工作上。他最热爱教育工作，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总是鼓励北京师大学生热爱专业，他曾给北京师大毕业生题词："喜看新鹰出春林，百年树人亦英雄。"可谓豪情满怀，气势磅礴。

1. 倡议建立教师节

王梓坤担任北京师大校长后，所做的第一件

大事，就是建议在全国建立教师节。1984年12月15日，王梓坤在北京师大邀请本校的陶大镛、启功、朱智贤、钟敬文、赵擎寰、黄济等著名教授举行座谈会，倡议由国家确定在每年9月份在全国举行“尊师重教月”活动，并将该月的某一天，定为“教师节”，以引起各方面对教师的尊重，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会上一致同意王梓坤的意见。决定由王梓坤和陶大镛、启功等名老教授和北京师大部分中青年教师一起发出此项倡议，得到全国教育界领导和广大教师的热烈响应，后来经国家教委和国务院的认可，决定从1985年开始，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9月份为“尊师重教”月。这对于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提高教师的地位有很大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教育事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教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封建社会里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师地位低得可怜。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改善了广大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但几十年来党内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党的政策无法很好地贯彻，特别是10年“文革”动乱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教师的地位也下降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当时的理论荒谬地认为，解放后到1966年的17年来，我国所有大中小学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里教师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并大声呼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大学不办了，中小学也停课了。并骇人听闻地放出奇谈怪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大学生不要在学校里读书，只要到农村工厂去劳动锻炼，就是最有知识的人，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高中生上大学不用文化考试，只要

在所谓“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表现好就可以被推荐优先上大学，后来即使搞点文化考试，也仅仅是走过场，图形式。辽宁省有个中学生在文化考试中交白卷，竟被认为是英雄人物，特殊照顾上大学，大加宣传其“优秀事迹”，并提拔为领导干部。当时，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起来，认为教师教书传授知识的脑力劳动不是劳动，是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

教师应该停止教课，停止科学研究，停止文化进修。而到农村工厂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甚至要脱胎换骨的改造。不少教师被当作政治运动整的对象，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被打成“黑帮分子”、“三家村”，或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赶到“牛棚”里去劳动改造。那年月，不是教师管教学生，而是学生管理监督教师，教师是斗争的对象。教师不仅失去了传授知识、教育人的权利，而且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教师可以随便被人揪到农村和工厂或其他地方去接受批斗。

于是知识不是力量，而是罪恶，教书不是光荣，而是可耻，只有文盲才最光荣，不识字的人最革命，最可靠。这样给广大教师造成了严重的思想伤害，不少教师后悔不该读书，不该当教师，学生也不想读书。全国的教育事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的大倒退。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是教育战线是被“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许多问题还一时难以解决，那就必须抓住关键问题先行解决，解决了关键问题，其它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尊师重教”，就是首先要尊重教师的劳动，尊重教师的人格。教师受到了尊重，他们积极性就会主动地发挥出来。他们就会为教育事业充分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将国家的教育事业快步推向前进。所以，建立教师节，是我国文化教育上的一件大事。如

今10多年过去了，事实已充分证明，在我国建立教师节对于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了解和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的时候，我们当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北京师大校长，这位优秀教师，这位教育战线的劳动模范——王梓坤先生的首倡之功。

2. 办一流师大

王梓坤在北京师大任职期间（1984－1989），他所考虑的就是要把北京师大办成国内第一流的、国际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的重点师范大学。取法乎上，争第一流，历史是有大志的英雄豪杰的个性。我国东汉时代光武帝刘秀，是人们很熟悉的英雄人物，他尚未得志时，就提出一个名言，说人生在世，“当官要当执金吾，娶妻要娶阴丽华”。执金吾是皇帝的近卫将军，最接近皇上，是权势煊赫的美官。阴丽华是当时容貌最美丽、品格又最好的大家闺秀。可见刘秀一生追求之高，后来刘秀果然不仅当上执金吾，而且娶了阴丽华为妻，被传为美谈。王梓坤为人做事也总是追求第一流的高目标，他搞科研时，曾提出要“扶摇直上九万里”，后来他实现了这个目标。如今他担任北京师大的第一把手，虽然年过半百，但仍然雄心勃勃不减当年，而提出了要将北京师大办成第一流的师范大学的口号。所谓高等师范大学的第一流，即不仅要在教学方面，特别是教学改革方面要有突出的创新的成绩，而且要在科研上有突出成绩，名列全国各大名牌高校之前茅。科研，在高等学校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判断一个高等学校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科研成绩如何，一方面高等学校有科研和教学两大任务。光是教学搞上去了，科研没上去，那只完成了一方

面的任务。二方面高等学校不同于中小学，它不是搞普及教育的，而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人才的。这样，在教学中必须及时将当今世界科研最先进的成果教给学生，一方面让学生们成为合时的人才，二方面可以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以早日进入科研过程。所以一个高等学校，如果科研上不去，事实上教学也上不去。只有科研上去了，教学才能以最先进的科研水平搞上去，以走在当今世界的前列。我国的师范，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左”思潮的干扰，有只重视政治斗争轻视业务的错误倾向，二方面，由于一些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师大主要是教书育人，科研并不重要，甚至认为科研会冲击教学，从而造成师大的科研工作远远落后于综合性大学，和其它专业性大学。面对这种情况，王梓坤以他一贯认为要狠抓科研的观点，在北京师大特别强调首先要把科研搞上去，让师大更多的教师在全国全世界有名气，让师大在全国全世界有名气。有科研的先进的优秀成果带动教学工作及各项工作的大发展，向第一流的目标冲去。

虽然，王梓坤后来只担任一届（5 年）的北京师大校长，无法在如此短期内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但是 5 年来，师大的各项工作皆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是科研，据当时两年国内信息部门统计，北京师大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中排第 6 名（北大、复旦、南开、科大、南开大学在前），限于当时北京师大的教师人数，这在人均比例数上已达到最高名次。光在理科方面，5 年来，取得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平均达 20 项以上。横向科研课题每年达 200 项以上。5 年来，理科方面取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50 余项。理科方面，5 年来，编写教材 200 部以上，仅在 1989 年获教学成果奖 8 项，其中包括获国家教委特等奖 12 项。

5 年中，学生人数有较大增加，校内达 8000 多人，校外

（夜大、函授生）也达8千多人，函授生由零发展到5千余人，学生层次已齐全，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进修生、进修干部、外国留学生与高级进修教师、夜大生、函授生等。同时扩大了国际交往，已同国外50所大学有协作交流。分布在13个国家，留学生数在北京市占第4位（前3位是北大、北外、语言学院）。这些成绩告诉我们，王梓坤的确不是平庸之辈，他是个积极的进取者、开拓者，他是不仅决心干事业而且很会干事业的人。因为他做事很踏实肯干，作风谦虚谨慎，很联系群众，遇事与群众商量，且为人正派，从不谋私利，所以深得广大教职员工的拥护。王梓坤虽然以前只当过系副主任等职务，没有当过校级领导干部，缺乏这方面的领导经验。但他一方面努力学习这方面的领导经验，向内行请教。二方面他作风民主，充分采纳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从不包办代替，个人专断。在某些问题自己认识到是正确的，其他同志一时未认识到，他就向大家进行说服工作，统一认识，大胆决策，而不做群众的尾巴。

王梓坤在北京师大任职5年，给北京师大广大教师和干部、职工及广大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认为王梓坤是解放后北京师大最好的校长之一。他卸任以后，广大教职员工还深深地怀念他。王梓坤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数学家、科学院士级的大知识分子，有人担心他不会做官，不会担任领导职务，甚至有少数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不懂当官，当不好官。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高级知识分子也能够当好官，而且由于他们的知识比一般领导者高，甚至高很多，所以看问题的水平高，会干得更好，且在干的当中，他们又能以很高的知识水平驾驭事物的全过程，不断发现新问题，且发现其本质，不会被外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及时妥善处理之。所以知识水平高的人当官，并不是个

缺点，而是一个优点，不仅现实世界上多有其例，古代也不乏其例，如欧阳修、寇准、苏轼、王安石、曾子固、海瑞等都是大知识分子，当官后都很有政绩，很有能力，唐朝神童刘晏，后来长大当官，也当得很好，一代文豪柳宗元就是个政治家，即使受挫而贬永州、柳州，也很有政绩。当然也有一些书呆子式的知识分子当不好官，甚至根本不会当官，这一方面是少数，这与读书无关，这样人即使不读书，或少读书，也不会当官。所以知识水平高，并不成为当官的不利条件。关键是有没有事业心，有没有努力学习，搞好工作的积极态度，有没有为政清廉的品行和作风。如果说高级知识分子为官，不会搞官场上庸俗那一套，这倒是实在的，因为他们不屑为之。

3. 志在育人

王梓坤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国家培养一批应用数学方面高级人才，因为中国概率原来是个空白，是王梓坤和江泽培（北大）、胡国定（南开）、严士健（北师大）等从苏联学成回国才搞了起来。王梓坤想让中国的概率研究走上世界的前列，就决心在这方面培养一批人才，并建立起一个学派。他从苏联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时，就着手进行这一工作，60年代初期，他在概率论研究方面连连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才30出头就开始带研究生了。第一个研究生是施仁杰，以后又培养了杨向群，还培养了朱成喜、吴让泉、胡立德、张福等优秀进修生，还在本科生中发现了吴蓉、刘文、赵昭彦等突出人才。但正当王梓自己在科研取得一个又一个突出成果，研究生、进修生、本科生也不断进步，学有

所成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而打破了王梓坤的计划，甚至粉碎了他的理想。研究生不能再带了，施仁杰、杨向群等人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中止了学业，其他进修生也失去了联系，吴蓉又不能读研究生进行深造，赵昭彦下场悲惨。赵昭彦在数学上有天赋，接受能力很强，思维敏捷，功底又好。不仅王梓坤对他十分欣赏，而且王梓坤的高足们都自叹不如。但是赵昭彦被政治运动毁了。首先是1959年的所谓“交心运动”毁了赵昭彦。当时赵还在南开大学读本科，政治上十分单纯，他以为交心，就应当把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和盘托出，同时他以为领导上讲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说法是真话，只要讲出真话，交了真心，就是好事。结果赵昭彦在交心会上说出，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最高领导人犯了错误。其实这个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不过别人不说出来而已。而赵昭彦这个少不更事的“傻瓜蛋”说了出来。谁知一说了出来问题就大了，说最高领导人犯了错误，那还了得，当时认为最高领导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谁怀疑他犯了错误就是反革命、反党分子。连彭德怀那样具有赫赫战功的老革命家，又是身居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要职的人，都因讲最高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而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要分子而一败涂地。你这个小小的赵昭彦还能不毁吗？结果赵昭彦被内定为反革命分子，什么“言者无罪”，原来只是一句空话而已。赵昭彦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给王梓坤一个重大打击，但王梓坤出于为国家培养新一代高级概率人才，出于爱才的心理，还硬着头皮顶住，坚决要求将赵昭彦留校以培养之。同时，王梓坤又以他老练的政治修养认为赵昭彦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是青年人幼稚的表现，问题将来是可以解决的。数学系党总支同意了王梓坤的意见，将赵昭彦留校

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很多大字报批评王梓坤有立场问题，是在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不应该将赵昭彦留在身边学概率。在那种情况下，王梓坤已无可奈何了，只好让人将赵昭彦遣送到塘沽区某中学去教书。赵昭彦临走时，王梓坤还安慰他，鼓励他不忘学概率，因为王梓坤还希望将赵昭彦这个聪明学生培养成人，可见王梓坤的一番苦心了。正像杜甫诗中说的“世人皆欲杀，吾亦独怜才”那样，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还有谁敢对一个内定为“反革命”学生抱有希望呢？

谁知赵昭彦到塘沽区某中学之后，该校负责人打开他的档案一看发现赵昭彦是内定的“反革命”，于是马上将他揪出来批斗，赵昭彦终究太年轻，经不起磨炼，他不堪忍受而卧轨自杀了。王梓坤听到了这个消息内心十分难受，他痛心自己失去了一个最聪明、最有才华的学生。社会上一般聪明的人多得很，最聪明的人却十分难得，往往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万里挑一，既最聪明又功底好，还很勤奋，这样的人才就更难得了。王梓坤认为，赵昭彦这样的学生，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定可以在概率方面有突出成就。王梓坤后悔自己没有对赵昭彦在品性上很好地进行教育，他想起了在中学时读过的苏轼的《贾谊论》，文中说到贾谊本是个天才人物，但是受不起挫折，一旦贬于长沙，便悲伤不已，以至于英年早逝。苏轼更感叹说贾谊“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这和赵昭彦多么相似。

文化革命为期 10 年之久，使王梓坤培养概率学优秀人才的计划落了空。文革以后，他对培养概率学人才的计划未果一直耿耿于怀，但由于客观上当时教育事业还在开始拨乱反正，元气尚未恢复，一切制度有待建立，主观上，自己忙于行政事务工作，

不能集中精力思考这个问题。自从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这个职务卸下来以后，他便又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虽然他年纪已老，但仍然雄心勃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在计划着，思考着，也在实行着。

1991年，王梓坤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更具体标志着王梓坤在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流的地位，王梓坤自己也感到责任更大了，自己更应该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概率学优秀人才。

199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王梓坤到北京师大教工宿舍门外的街道旁散步，他走到一个报刊零售亭子边，顺便买一张小报看，看到上面有一则消息，广东省新办了一所汕头大学，董事长是香港大富豪李嘉诚。此校需要聘请一批科学院士去加强学校的教学力量，以振校名。王梓坤十分高兴，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汕头大学人事处，表示愿意应聘。汕头大学领导接到王梓坤信后，当然求之不得，马上打电话给王梓坤表示欣然接受，并接着派人事处长、科研处长和数学研究所所长3个干部乘飞机到北京师大拜访王梓坤，呈上聘书。

王梓坤以每月1万元的高薪被汕头大学聘为博士导师的消息在《汕头日报》、《光明日报》登载出来以后，全国各地的文摘小报都竞相刊载，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1万元的月薪，在当时为解放后的中国教师的工资开创了最高纪录，社会舆论评论说，这个工薪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为中国人经济收入的体脑倒挂，做了有力的反驳。当记者采访王梓坤时，王梓坤说：“这个月薪对我王梓坤说来是过高了，但对于科学院士来说，还是不高的，因为这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定的，而是针对科学院士定的。”

其实，这个工资无论是对其他科学院士或是对王梓坤本人来说，都是不过份的，像王梓坤这样的数学家，这样的科学院士，

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是不可以用工资来衡量的，他们的贡献比月薪1万元大得多。至于也有人说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则是十分错误的观点。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受到极“左”思潮的压抑，甚至迫害，这些先生不去为之鸣不平，如今知识分子的情况稍好一点就说翘尾巴了，说明这些先生们还是用极“左”的观点在看知识分子，何况这个工资仅仅是汕头大学对聘请几位科学院士而定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工资并不高，在全国各大城市，教师的工资一般都在平均水平以下。

国内有位大学负责人竟然在教师大会不点名地批评王梓坤是为了挣钱才去汕头大学的，这完全是误解。王梓坤在汕头大学，根本不是为了挣钱。王梓坤现在的经济条件很好，根本不存在缺钱用的问题，他两个儿子在美国工作，他的夫人谭女士也是北京师大教授、博士导师。何况王梓坤一贯潜心学问，从不为钱操心。而且实际上，王梓坤后来将在汕头大学所得的工资收入用来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帮助一些穷学生读书。

王梓坤之所以去汕头大学任博士导师，完全是为了完成他为国家培养概率优秀人才的宿愿。他觉得北京师大师资力量雄厚，完全有能力将北京师大的博士生培养好。而汕头大学是新办的，十分缺乏博士导师，况且汕头市是特区，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十分需要很多高级人才，汕头大学招收的优秀学生正需要自己去培养。这些学生一旦培养出来，就可以成为我国数学方面的科研尖兵。

4. 诲人不倦

王梓坤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还是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培养研究生，他不仅对研究生注意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的培养，而十分注意对研究生的品德教育，十分关心研究生的生活。他对学生们总是像父亲一样慈祥。

王梓坤对教学是相当认真负责的，他总是精益求精。本来就王梓坤的知识水平而言，指导研究生学习，早就是驾轻就熟，不在话下了。但王梓坤却总是不断地学习，经常上图书馆看资料，接受新的知识，研究新的问题。他每次对研究生讲课都有很多新的东西，博士研究生的课一般不是采取课堂上课的形式，而是采取开讨论会的形式，每次开讨论会，王梓坤先生总是先提出许多问题，供研究生做准备。在讨论时，他先让学生们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自己再做总结性发言。把当今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一一介绍给学生们，使学生们能及时接受最新的知识，从而受到启发，较快地进入科研过程。而且他总是随时提问题，每次都是系列地讲述。

开讨论会时，他很尊重学生的意见，让学生们充分将看法讲出来，不论是水平高的学生，还是水平较低的学生，他都十分看得起，没有偏爱。学生们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他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解决。有一次一研究生写文章要找资料，王梓坤手头一时没有，这份资料王梓坤知道内容但记不起名字了，他叫学生去问南开大学吴蓉教授（王梓坤原来的学生），这个学生后来打电话给吴蓉教授，吴教授说王梓坤已打电话告诉了她，使她事先

做了准备，及时解决了问题。

王梓坤还经常对研究生们进行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品德修养教育。他常将自己一生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告诉研究生们，让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他还教育学生要充分地尊重别人，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短处每个人都有，人与人相处要多看别人的长处，相互鼓励。

1996 年 11 月份，王梓坤从汕头大学回北京参加会议。北京师大的研究生学会搞活动，特别请他去做报告。内容是“名人成才启示录”。那几天王梓坤感冒了，气管发炎，咽喉疼痛，讲话已很吃力了，但他还是坚持去做报告。讲得既有理论性，又有趣味性，很切实，听众挤得满满的，有些人连位子都坐不上。他讲完了，嗓子就不行了。后来感冒又加重，回到汕头大学，又马上主持研究生的讨论会，以致嗓子一直不好，咽喉发炎，治疗了半年多才痊愈。王梓坤为教育学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了。

王梓坤对学生们的生活也很关心，学生们经济有困难，他即予以资助。曾有一个博士生家庭经济困难，王梓坤即每月按时给他几百元以使他能坚持学习。王梓坤毫无门户之见，他的硕士生去考别人的博士生，他毫无意见，反认为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长处，鼓励他们好好攻读。不论是不是他的学生，他都很耐心地教导。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侯荣生，写了一篇研究马氏过程方面的论文，请王梓坤审阅，王梓坤认真地看了，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来他们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侯荣生即去拜访王梓坤，王梓坤热情地接待了他，没有一点架子，侯荣生走时，王梓坤还送了很远，使侯荣生大受感动。

现在王梓坤已是桃李满天下了。除很多本科生以外，他已培养了硕士研究生 35 名，博士研究生 19 名，其中 60 年代培养出

来的已有一些成为学术界的名流了。如施仁杰、杨向群、吴蓉、刘文等在80年代初期就升为正教授，现在都是研究生导师，杨向群、吴蓉是博士导师。80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已开始走入学术界，将要成为我国概率论研究的人才，其中最优秀者有张新生、赵学雷、李增沪、鲍玉芳诸博士。

如杨向群、吴蓉、施仁杰、刘文等他们都是教授研究生导师，其中杨向群、吴蓉是博士研究生导师。80年代以后王梓坤先生又有了一批年轻的研究生，这些人基础好，思维活跃，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已开始走入学术界，将成为我国概率论方面的主力军，其中最优秀者有张新生、赵学雷、李增沪、鲍玉芳诸位博士。

第七章 务在成才

王梓坤从小就立志当一名教师，他对当教师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职业十分热爱，后来王梓坤真的当了教师，从1952年到现在46年了，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人才而尽心尽力。因为王梓坤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要成才”。成才是王梓坤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核心。王梓坤把毕生精力用于培养学生成才的工作上。同时他不仅尽力培养学生成才，而且鼓励朋友成才，他无论在何地做报告或随意讲话，总是把人才成才做为一个中心话题，到处鼓吹人们成才，他对儿女的要求也是成才，并且终于成才，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一个成才的过程。王梓坤最喜欢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和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有理想、高标准

王梓坤认为人生在世，应决心成才，那就首

先要有理想，“理想就是志气和抱负，它决定一个人的努务方向，奋斗目标，决定他的兴趣和爱好，并为他提供前进动力。”王梓坤认为理想是人的灵魂，“是人们心灵上的太阳”。一个人没有理想，就等于没有灵魂。

王梓坤认为一个人的理想不应该是空泛的，也不能笼统地说我将来做什么事，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要实实在在选一个自己敬佩的人做为学习的目标，做为竞赛的对手，研究他，赶上他，最后超过他。他这种观点，来源于俄国的名将苏沃洛夫。王梓坤多次向人讲苏沃洛夫的故事。他说，苏沃洛夫有一次带领军队过阿尔卑斯山时，对他的部下说：“你们要努力上进，不要松懈。鞭策自己前进的一个好方法，是找一位你自己认为最值得崇敬的历史人物，把他当作你自己的导师，同时也当作你的对手，仔细地研究他，学习他，赶上他，最后超过他。这样，你永远就不会满足，永远生活在追赶和前进的道路上。”王梓坤说，苏沃洛夫这个说法和我国一句古话“取法乎上”一个样，用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意思。

有了高标准，且有了具体的学习目标，才有前进的动力，才能有坚持为之奋斗的行动。江河永远向着海洋，才能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林木为了参天，才能经冬历春、栉风沐雨地不断生长。

王梓坤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社会的发展，就是靠无数的人才，努力做出贡献的结果。虽然人们的主观智力有差异，客观的条件也统统不一样，有的人成就大，有的人成就小，有的人可以成才，有的人难以成才，但是总的来说，都要有一种上进心才好，才对社会发展有利。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也就是说，人必须有理想，有很高的奋斗目标。士兵想当将军，他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杀

敌人建立战功，而且不但去斗勇，还要去斗智，像将军那样智勇双全，这样，整个军队的战斗素质才会提高。如果士兵们都不想向上进取，只是被动地受驱使去打仗，要取得战斗胜利，难矣。

过去我国社会有一种奇怪的论调，以为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极荒谬的。为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祖国发展经济，就是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专家，而且越多越好。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才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有才的理想大志才好。

王梓坤说的成才，当然不是说要每个人都去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人的工作性质不同，能力有差异，不可能都成为清一色的人才。但青年们要有志气有理想，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相结合。努力学习知识，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干一行爱一行，向高标准看齐，尽量把工作干得更好，以至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王梓坤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某澡堂有个搓背按摩的工人，由于自己努力学习，钻研技术，后来，不仅成了高级按摩大师，而且写出了一本关于按摩的学术著作，十分畅销。这个工人因此出了名。我国民间有句俗语："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孟夫子也说过一句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和王梓坤讲的人要成才一个样，都是说人人都要有理想、有志气去成才，以能最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要成才就必须要有高标准，只有高标准才会去出大力。王梓坤先生在文章中和讲话中曾多次地讲了美国总统卡特的故事。1952 年，卡特在美国海军里服役，工作干得不错。一天，海军上将科弗将他叫去谈工作，并涉及了许多海军方面技术、战术，和电子管、炮火射击，及时事、音乐、文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弄得卡特十分紧张。最后上级问他在军事学院毕业时考第几名？这下子卡特兴奋起来了，沾沾自喜地回答说："在 820 名毕业生中

我名列第59名。”这的确算是不错的了，在820名中即使名列第100名也是优秀的了。所以卡特自以为会得到上将的赞许。准知上级皱起了眉头，说：“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这一句话刺痛了卡特的心，使他终生难忘。事后，他一直用上级的这句话鞭策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终于当选为美国总统。1975年卡特出版了一本书，记述他一生奋斗的经历，书名就叫《为什么不是最好的》。

只有高标准、严要求，才能成大才。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普普通通，就难以成才。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故为其下。”（《帝范·四》）。过去我国社会上只强调人们去做普通劳动者，如果是从政治地位上安慰人们，认为普通劳动者和领导干部、科学家一样光荣，诚然说得过去。但是问题是当时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下放到农村中去，要他们去当普通农民，不为他们读书成才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愚蠢做法，而且是开历史倒车的一种愚民政策。

2. 勤奋、毅力、机遇

要成才，光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行动。为此王梓坤认为成才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勤奋和毅力。王梓坤往常在文章中和谈论中例举了鲁迅、巴尔扎克、达尔文、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等人勤奋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来勉励后进。

但王梓坤认为毅力也十分重要，光有勤奋没有毅力也不行。他讲不少人很勤奋，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但后来并未得取得成就，原因虽然有多方面的，但很多人是因为缺乏毅力。所

谓毅力、就是向着一个目标，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进攻。有些人缺乏毅力，当碰到一定的困难时，就改变方向，如此换来换去，虽然十分勤奋，但也终无所成。所以荀子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王梓坤还特别谈到一个人的成才需要机遇，机遇往往对一个人的成才起很大的促进作用。机遇往往很多人都有，可是大多数人都放过了，只有少数人抓住了。抓住的人是因为他具备抓住机遇的条件，而放过机遇的人，不具备抓住机遇的条件，机遇是偶然性，而具备抓住机遇的条件则是必然性，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若不具备这种必然性，偶然性就不存在。而必然性需要人们自己去努力创造才行，只有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才能创造出抓住机遇的必然性的条件，否则机遇再多，对你也没有用。

为了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王梓坤多次向人们列举了英国著名电学家法拉第的故事。法拉第原来家里很穷，3 岁就到一个订书店里当学徒，但他喜欢学习化学与电学，经常以微薄的工资买一些材料做电学试验，所以他在电学上打了较好的基础。一次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戴维来到法拉第所在的那个城市做学术演讲，法拉第想办法弄到了一张入场券，他在场听得十分认真，把戴维所讲的内容全部做了笔记，散场后回到家里，法拉第又根据自己的理解认真地将笔记进行整理，他带着这个笔记去宾馆找戴维，请戴维看看，他记错了什么，并向戴维提出了一些问题，戴维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青年工人的电学水平有这么高。戴维就介绍法拉第到皇家学会实验室去当助手。从此法拉第得到皇家学会的良好条件，又得到高水平的科学家戴维的指教，进步很快，终于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电学家。后来戴维对人们说："要说我有成就的话，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法拉第。"

法拉第被戴维发现，确是法拉第一生成才过程中的一个最关

键的机遇，也是世界科学史上最可传为佳话的机遇。然而这个机遇当时并不是法拉第一个人才有的。当时在场听课的人都有，甚至在那个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但却只有法拉第一个抓过了它，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法拉第学得很认真，不仅记了笔记，而且又回去进行整理。这些条件可能是当时听讲演的众人中，只有法拉第一人才具备的。其实机遇并不是成就事业的关键，机遇人人皆会遇到，最重要的是要在机遇到来之前，努力创造抓住机遇的条件，没有条件，机遇再多，也是白搭的。

王梓坤提出搞科研应该充分利用机遇抓紧机遇，俗语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3. 德、识、才、学

王梓坤说，一个人的成才，首先要打好一定的基础，也就是在"德、识、才、学"四个方面有较好的素养。

在《科海泛舟》一书中，王梓坤对"德、识、才、学"做了明确的解释："德，是指道德品质，主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真理的热爱，以及勤奋、虚心、努力学习"等等。

识是指见识，包括树立奋斗目标，看清方向，驾驭环境，选择道路；抓住关键，不失时机，决定哪些事情必须干，哪些则坚决不干等等。

才是指才能，即完成任务的能力，主要是科学试验包括观察和辩证思维的能力。对青年人，还应注意培养自学和写作能力。

学是指学问和知识。

王梓坤说，这四者的关系是互相联系的、辩证的。但对青年

人来说，应以学为先，学习文化知识，学习优秀人物的品德，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培养才能和提高见识。

王梓坤将德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时代的需要，是很客观的，和大多数人见解是一致的，一个人没有很好的品德，没有很好的思想修养，是绝对干不好事业，成不了才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王梓坤对德的解释，不仅像我们平时讲的只限于政治立场方面，他将“对真理的热爱，以及勤奋、虚心、努力学习等等”，特别提出来做为德的重要部分，因为王梓坤着眼于人的人才，而不是着眼于培养“普通劳动者”，更不是培养那些专搞阶级斗争的空头“政治家”。

王梓坤将“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把“学”放在“才”之后。因为王梓坤认为，有学问未必有才能，有些人书虽然读得很多，可谓“学富五车”，但并没有发明创造，写不出好作品，因此，学问并不等于才能。所以古人说“学富五车”还要加上“才高八斗”才好。他又说，“即使学问好，才华高，也未必有远见卓识，因而也不能做出应有的贡献。”他举了我国汉朝贾谊和司马迁两个文学家为例。贾谊很有学问，也很有才能，14岁就出了名，17岁学问就十分成熟了，对当时国家政治形势就有自己的见解，做出了很深入的分析。写出了著名的《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政论文，汉文帝很赏识他。但因当时的形势未成熟，汉文帝没采用他的政治主张，要他在长沙做梁王的太傅，他就十分悲观，后来梁王又坠马而死，他更自伤未尽到责任，常常哭泣，一年后就因为忧郁而死，年仅32岁，其才能终于没有发挥出来。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就感叹说：“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司马迁则不然，他因为替李陵辩护而受宫刑，遭到很大的侮辱，但他不自暴自弃，不悲观丧气，而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终于写出了史学——绝唱《史记》一书。可见

“识”在成才方面是很重要的。

王梓坤举这两个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自己的经历，也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他搞科研出成果的那段时间，是中国历史最特殊的时代，那时候社会公开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知识分子最无知”。把知识分子当资产阶级分子和阶级敌人来对待，当作“牛鬼蛇神”来横扫。很多知识分子被揪斗，被打入“牛棚”，王梓坤当时也被打成“三家村”中的“黑帮”分子，受到大字报的重点攻击。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很悲观，以为再也没有前途了。王梓坤却不是这样，他认为那种做法违反社会历史潮流，会短命的。“黑暗”就会过去，光明就要到来。所以他“静观自得”，依然发愤读书，依然坚持写作，完成多种著作与论文。后来，形势一好转，王梓坤就成为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这就是王梓坤有“识”的表现，这也说明“识”在一个人的成才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梓坤认为“识”还包括“世界观”在内，一个搞科学的人，世界观是很重要的。他指出，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牛顿世界观有问题，晚年放弃科学而去搞神学研究，走入死胡同，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何等可惜！

4. 精于一

王梓坤认为读书，做学问，首先应从“精于一”开始。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前人的经验，特别提出“学海茫茫，所获甚微，唯能自信者，仅仅从精于一开始”。又说“现代科学，面

广枝繁，不是一辈子学得了的。唯一的办法是集中精力，打破一个缺口，建立一块或几块根据地，然后乘胜追击，逐步扩大研究领域。此法单刀直人，易见成效。”

“精于一”，即具有较好的基础知识之后，就要决定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专业方向，不应该东抓西抓，在这方面，王梓坤治学的经验是很好的范例。王梓坤在高中阶段，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当时社会就业的实际情况，就决定自己今后学数学。即当时他的数学成绩最好。现在江西省泰和县泰和中学还保存着1948年王梓坤毕业考试和3年总评的成绩单。其中数学是最好的，而且比班上其它同学高5分以上。二方面王梓坤觉得在当时的旧中国工农业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学工科的和农科的大都无法就业。当教师则比较容易就业。而当数学老师又占有一定优势。因为学语文的很多，人人都以为语文容易学，若不是语文学得很好的内行，对语文教师水平的高低是难判别的。物理、化学、生物要实验仪器和实验园地，否则就教不好。英语，要出国留洋才有优势，王梓坤无法出国，所以英文无法达到最优秀。只有学数学最方便又最能显出优势。王梓坤在中学时，就决定自己学数学，就为将来精于数学打下良好的基础。此书前面说到，王梓坤的才能是比较全面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的语文成绩也很好，且很会写文章，他还爱唱京剧，会拉二胡。体操很拔尖，对哲学也很感兴趣，但他后来为攻数学，把其它爱好都放弃了，连最爱拉的琴也放弃了。像俞伯牙一样“终身不复鼓琴了”。只是在星期六晚上，去看（听）看京剧而已。

为了达到“精于一”，王梓坤说，在读书方面要特别讲究方法，即对所读的书要善于选择，同样的书，应选择最好的最经典的著作，反复读，精读，记读书笔记，对其余的则只抓其重要部分浏览而已，对一般的著作，没多大价值的书，则不要花时间去

读。读了一年，就要向高层次迈进，不要再读同一水平的书，做"平面徘徊"。这样就能一步一个脚印地递层前进。

"精于一"在王梓坤看来，应当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不要随便改动，特别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一定要选择好的课题，坚持研究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和所有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王梓坤特别强调做学问中选题的重要性，他说："选择专题，确定主攻方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王梓坤指出，为了正确选择主攻方向，需要对本学科的发展及目前的状态有较好的了解，任何科学在发展中都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及时了解当时的动态和历史的进程，才能正确地选择有价值的又使自己能攻克的专题。

王梓坤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实践，他在 50 年代，将马尔科夫过程的近代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使他自已成了我国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人物；60 年代初，他又首创国内关于随机泛函分析的研究；70 年代，开创关于地震统计预报的研究；80 年代，他又进行布朗运动和多指标随机过程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体现他选题的高水平，因此，他在这些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国内外一流的水平。王梓坤曾多次对他的研究生们说过一句名言："别人知道的，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别人不知道的，你却要知道；你才有出息，有成就。"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说一个人读书做学问，决不可面面俱到，把一切知识都弄到手，而是要"精于一"，从"精于一"开始，又突破一个"一"，使你自己更加精于一。

王梓坤强调"精于一"，并不是说一个人只学一项，对其他的都孤陋寡闻，而是要处理好"专"与"博"的辩证关系，王梓坤认为，既要专（精于一）又要博，即从精于一开始，经过博而达到多学科的精。集多学科的精，达到其一大方面或几大方面的

更高水平的精。

他说到，17 世纪以前，科学积累的知识不如现在丰富，一个人有可能从事多方面研究，17 世纪以后，科学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没有人能够充分掌握当代的全部知识，于是不少人终身在自己专业圈子里挣扎。后来不少人认识到这种局限的害处，于是又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取得多方面的知识。因为别的学科和新思想，有时会对你的专业工作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王梓坤曾多次向人们提供，学理工科的也要学些文学、哲学。他说，读些文学书可以鼓励科学工作者的斗志。“每当我们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联想起他为国奋斗的种种艰难困苦，便觉有一股热气，自心田奔腾而上，浩浩荡荡，势不可当”。读秋瑾的《秋风曲》和她的词句“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则感到“勇胆并生，视豪强若鼠辈”。

王梓坤还说：“在工作与学习繁忙之余，抽空读几页曹雪芹的《红楼梦》、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或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便觉心神飞越，仿佛进入另一境界，顿时忘掉眼前的疲劳和困难。此外《史记》的豪放，《庄子》的旷达，杜甫诗的严谨，李清照词的婉约，都各具一格，争奇斗艳，特别是当我们受某一科研问题的长期困扰而不得其解时，读一下这些作品，往往能使头脑清醒，思路开阔，有助于产生新思想、发现新线索。”

王梓坤是注意“博”的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文学方面的修养也是令人吃惊的。他看了很多文学书，抄录了很多诗词和名人名言。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老一辈科学家，大抵是先进私塾读古书，而文学功底好，像王梓坤这一辈在解放后培养起来的科学家，一般没读过多少古文，语文水平是不怎么样的，而王梓坤

却是例外地有很高的语文水平，显然是与他平时注意阅读文学书籍有关的。

王梓坤的阅读范围很广泛，历史、哲学、文学他都涉猎。他的藏书万余册，除了数学专业书以外，还有两千余册历史、哲学方面的书，四千多册的文学书。他的文学书比一般高校文学家教授的藏书还要多。其品种之多，质量之高，也是令人吃惊的。如文学方面的有《全唐诗》、《全宋词》、《杜诗译注》、《李太白全集》、《四部精华》、《太平广记》、《莎士比亚全集》、《莫泊桑全集》、《稼轩词编年笺注》、《战争与和平》、《十日谈》等，有些书不是文科专业人员，一般不藏有的，而王梓坤却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随园诗论》《诗薮》《十三经注疏》等。

泉之深者流必活，林之茂者山必高。王梓坤读书多，所以知识丰富，作起文章来运用自如，而且富于文采，看他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和《科海泛舟》，就可以知道。其中主题是谈科学，但不时涉及文史，涉及哲学，引用诗文，引用典故广而精深，亦质亦文。有些诗句，连学文学专业的，都一时弄不清出处。那其中一篇篇短文，都是精品，气势飞动，文彩斐然。最近他的弟子杨向群教授编辑了他的学术论文集，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王梓坤自己写了一个很短的序言，写得很好，现录如下：

> 我以菲才，侧身数学行列，凡四十年，用功甚勤，而所获甚少。今承湖南科技出版社及胡海青先生鼎力促成，出此文集。掩卷自思，惶愧顿生。虽然，亦略所感。
>
> 举凡科学研究，3分选题，3分勤毅，2分机遇，2分天赋。4者具备，必成上品。其实何止科研，一切大事，莫不如此。选题靠师友交流，靠信息通畅，靠个人胆识。勤奋与毅力则出于自身之理想、兴趣、热情，与自勉自制，机遇存在于环境遭遇与人际关系之中，有驾而上者，有溺而存者，

全在有所准备，及时抓住或避免。天赋与生俱来难以改变，但用我之长，避我之短，则可自择也。今我四者，皆居中游，无怪乎斯为下矣。前车之鉴，不敢自秘，谨奉告以闻。

四十年韶光已逝，来日几何？此集完成，实成为我一生科研之段落，但仍不敢稍有停顿。抚今思昔，启我入数学之蒙者，为武汉大学数学系诸师长。文集中主要之作，则完成于莫斯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汕头大学。老师指教与同事间多年切磋、互助、互励，有益哉，有味哉！长在美好记忆中。

为编此文集，杨向群教授独挑大梁，妙思增彩。文集中“编者的话”，全集疏通导读及说明与内容提要，若干篇原用俄文英文发表的，而今译成中文，以至最后定稿成书，皆出其手。导读，有助于了解来龙去脉，有益于提高可读性，此所以文集区别于一般文集者。创此新意与改进，用心良苦。工作量大，非片言感谢可尽也。吴荣、刘文、胡国定、邓汉英、刘泽华、李点炳、曾祥金诸教授，内子谭得伶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相濡以沫，情谊长青，不知相轻相妒为何物。实人生之大幸也。众多弟子，青出于蓝，教书清苦，以此足可自勉，常书“百年树人亦英雄”为座右铭以为自勉。尤忆五十年代初，我国国界尚不知概率为何物？领我入门者为导师 A·H·KONMOPOB 院士，P.L.ДобРУшИН 教授，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惜乎仙逝，报师无门矣。可喜者，近年来，我国学界，成果灿然，人才辈出，数国大国强国如旭东升，煌煌赫赫举头可望矣。

王梓坤　1997.9.1.

于南开园

此序言不仅精粹切要，而且很有气势和文采，用词造句，很见工力，有大家风度，是难得的佳品。却是出于一位当代数学家之手，实在令人敬佩和称奇。

5. 收集资料

王梓坤先生很重视资料的收集。他将收集资料作为搞研究做学问的首要工作。没有收集好资料，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凡是学而有成的人，都是广泛地大量地收集了资料的。

王梓坤认为收集资料的最好方法是记笔记。他说："要善于在平日逐渐搜集对日后有用的资料，把它们写成笔记。有各种各样的笔记，有些是简单的记录；有些加进了自己的见解，成创作的一半成品；而另一些则是相当完善的精致短篇。零件既备，大器何难！一旦需要时，就可以将它们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有价值的著作。"

王梓坤说，收集资料有四种方式：

一是鲁迅式的从文献中收集。他说："为了研究中国小说史，鲁迅从上千卷书中收集寻找所需要的资料。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书，就是他辛勤收集资料的成果。正如他自己所说，'废寝辍食，锐意穷搜'，鲁迅积累资料的勤奋态度和认真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二是蒲松龄式的向群众索取。蒲松龄"喜人谈鬼，闻则命笔"。其《聊斋志异》就是这样写成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实践经验多，见闻多，多向群众学习，收集资料，可以得到很多奇特的十分宝贵的资料。《聊斋志异》中那许多稀奇古怪、惊世骇俗

的故事，只有向广大群众打听收集才可得到。一个人坐在家里，无论怎样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来的。

三是达尔文式的直接向大自然索取第一手资料。达尔文远游海外，研究生物遗迹，观察生物习性，前后达27年，终于写出了《物种起源》一书。这是一种紧密联系实际的作法，也是直接进行科学实验的作法。科学是实验的总结，掌握大量的实验资料，才可以进行比较、鉴别、分析，然后才可以进行总结，离开实验，科学研究就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

四是李贺式的随得随记，逐日积累。李贺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充满幻想性，是浪漫主义的。据说，他每天背着书包骑马外出去游玩，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他就写下来放在书包里，天黑归家，将书包里写的整理加工，就成为一首好诗。

王梓坤根据前人的实践经验，归纳起来的四种收集资料的方法是十分宝贵的。

王梓坤本人也很好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收集资料，他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一个有心的人，他经常带着笔记本在身上，经常跑图书馆，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他就抄录起来，即使开会休息时间，访友的悠闲片刻，他都不忘收集资料。几十年来他收集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光是笔记就有20多本，而且是分类记录的，翻阅起来十分方便。他还长期订阅了一些报纸杂志。其中《参考消息》从60年代到如今一张也没有少。他买那么多书，实际上也是收集资料，为了收集而买，并不是盲目、滥买的。

为了收集资料，王梓坤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1964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学校门前有一个书店，他隔三差五就到那去看看。把有用的资料或是抄录起来，或是将书购买下来，以充实他的资料库。

高怀若霁月　雅量洽春风

第八章

凡是和王梓坤先生打过交道的人，无不为他的高尚品格而感动，而敬佩。他工作踏实认真，责任心很强；为人谦虚、热情、率直、诚恳；胸怀宽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生活艰苦朴素，不事浮华；办事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乐于助人。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高怀若霁月，雅量洽春风”。“度比江河，细流兼纳，气如春夏，群物发生”；“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淡泊名利，惟求进取。“冲天原有志，出岫本无心。”

一个人能做到这样，实在是难之又难的。王梓坤先生的高足弟子、原湘潭大学校长杨向群教授说：“有些人学问上去了，品德却下去了，王先生却是学问品格一齐上去了。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当了王先生的学生，我不仅向王先生学习了知识，还学习了他的为人品格。”王先生的另一高足弟子董昭博士说：“我们这些后辈学生们，要将学问搞到像王先生那样的程度，也许还是能够了；但是将品行修炼到王先生那样的高境界，则是很难的。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1. 谦虚待人

对于一个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的名人来说，恐怕第一重要的品格就是谦虚待人了。一个人要做到谦虚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一个人有了成绩出了名，受到群众的赞扬和尊敬之后，要做到谦虚就更不容易，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对我们有很多教导，孔子曰：“谦受益，满招损。”毛泽东将这句话说得更加通俗明白：“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道理说起来是令人明白的，但要做到实在不容易。因为一个人有了成绩，就容易自得自负，自以为是。若不这样，必须是很有智慧很有修养的人。

王梓坤先生是科学院士，中国的著名数学家，在概率论方面取得的突破，成就不可谓不大矣，他又当过北京师大校长，地位不可谓不高矣。但他每到一处，与任何人接触，都表现为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平民百姓一样，毫没有一点架子。而是最热情的待人，最充分地关心人。

王梓坤先生每次回到家乡，总要挨家挨户地去拜访那些农民乡亲，向他们问好，在他们那些低矮的房子里坐坐、喝茶、畅谈家常。他家乡的农民反映说：“王梓坤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一点没有变，还是和我们手拉手，心连心。”王梓坤一回家乡，还一定到家乡的学校里去与广大师生见面，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和教师们交朋友，十分真诚热情，家乡的教师、干部乃至农民，和他交为好朋友者，有好几十人。

1988 年，王梓坤在家乡的吉安师专讲学，突然接到通知要

回北京开会，吉安师专马上派保卫科的一个青年干部连夜到南昌去为他买飞机票，王梓坤拿到飞机票后，马上问是谁费心给他买的，尽管时间很紧，王梓坤还亲自找到了那个青年干部，向他表示感谢，并问长问短，还将那青年干部的姓名和通讯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那位青年干部十分感动，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来，都对王梓坤先生的谦虚为人十分敬佩。

和王梓坤一起工作的一位老干部说到，他自己曾在台上有权时，有些干部对他十分恭敬，见面时点头哈腰，好话连篇。后来他退休下台了，这些干部就不理他了，相见好像碰到陌生人一样，但王梓坤却依然如故，甚至态度比过去还要热情，老远就大声问好，而且还不时征求他对学校工作的意见。

王梓坤的学生——张新生博士在汕头大学任教，一次请客，王梓坤先生应邀出席，王先生到了饭店，对服务员一一问好，王先生在汕头很有名气，但服务员并不认识他，后来一打听，原来这位热情的老先生就是王梓坤院士，都十分感动而肃然起敬。

王梓坤对过去教过他的老师十分尊重，永远不忘他们的恩情，他到武汉大学时曾到李国平、路见可等老师家里一一拜访。路见可先生比王梓坤年龄只大几岁，可以说是同辈人，但王梓坤总是对他以师事之。吴亲仁先生曾在武汉大学教过王先生的课，后来调到郑州大学，王梓坤先生曾多次在写给高足弟子施仁杰教授的信中，托他代向吴亲仁先生问好。吴先生已 90 多岁了，得知王梓坤已是著名专家，科学院士，还这样不忘老师，十分感动。他对王梓坤先生过去在武大的学习成绩和品质修养赞不绝口，吴老先生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十分自豪。

王梓坤先生对他小时候读中、小学的老师也十分尊敬，他常常对人们说到教他读小学的王少诚老师，如何爱护他，对他如何要求严格，并极力鼓励他上进，教他读初中的高克正（女）老

师，如何帮助他在没有交学费的情况下，读完初中，他对这两位老师永远不忘，为此写了文章《悠悠师生万古情》、《百年树人亦英雄》怀念他们二位，发表在刊物上，后又收在他的文集中。

1982年王梓坤在西安讲学，就便去看望当工人的亲家（长子王维民的岳父），王先生买了一瓶茅台酒做礼物。亲家十分紧张，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学者。但王先生却像普通工人一样与亲家话家常，并不断地说维民的不足，夸儿媳的优点。使那亲家紧张的心情马上放松了，如同见到了自己的兄弟一般。

即使是对待学生，王梓坤也是很谦虚的。当他发现他的研究生们学习中的错误时，他从不进行批评指责，也不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而多是以商量的口气说："你那样做是否妥当？你看这样好些么？你觉得怎么样？"

2. 乐于助人

王梓坤对人十分热情，很关心人，助人为乐。他的老同学欧阳绵教授，在武汉大学搞数学情报研究要办一个刊物。王梓坤得知此事，立即表示大力支持，既为欧阳绵出主意，又介绍欧阳绵认识美籍华人当今世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说："欧阳绵先生是我的同学。陈先生因之也大力支持，得到两位数学家的帮助，欧阳绵教授主办的刊物《数学情报通讯》很快就问世了。"

王梓坤对家乡的农民朋友十分热心，他们一有困难，王梓坤都会尽力帮助。他村子里有个40岁左右的农民叫王德厚，其老婆被人拐走了，留下小孩无人照看，生活很困难，王德厚十分痛苦，王梓坤先生得知后，立即寄去300元钱，给王德厚解决暂时

之困难。同时又趁到广州开会之机，为王德厚在广东省公安厅报案，且花去几百元，历时年多，仍未找到。王梓坤又多次写信安慰王德厚，鼓励他树立信心，重振家园。

王梓坤家乡有个高中毕业生，1980年参加高考，因某种原因，虽上了录取线而未取录，意志消沉，深感前途渺茫没有出路，偶然想起他曾读过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像王先生这样的名人，也许可以为他指点迷津，于是他大胆地给王梓坤写了一封信。他当时也不过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并没有奢望得到回信。谁知过了半个月，他竟然接到了王梓坤的回信。王梓坤在信中安慰他，不要悲观，并列举了很多自学成才的名人事例鼓励他。王梓坤回家乡还特意去看他，再三进行鼓励。后来他果然自学成才，当了国家干部。王梓坤与其素不相识，竟如此热情地关怀他，足见王梓坤谦虚热情的高尚品格。

王梓坤自从出了名以后，接到的来信很多，光是《科学发现纵横谈》出版后，他就接连接到一千多封信，王梓坤都一一回了信。王梓坤对人来信必回，而且是马上回信，绝不延迟。这是王梓坤与人交往的一个原则，王梓坤说，“如果对别人的来信不及时回复，这就是怠慢了人家，这是极不礼貌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王先生总是这样做，凡是与他通过信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但是当今社会上有不少人，自以为当了一官半职，而十分傲慢，不仅对别人来信不予回复，而连对群众来访都十分厌烦，对照王梓坤先生的行为，这些人真应该惭愧。

即使是这一些生活小事也表现出王梓坤的谦虚热情地待人。王梓坤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后，60年代，随着他在科研上连连取得丰硕成果，名声鹊起。当时有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女同志，曾是王的同学，她的弟弟患白血病，要到天津血液病研究所治疗。

这位女同学写信请王梓坤帮助。王梓坤将患者安排住院后，又安排患者的两位姐姐借宿在南开大学数学系女教师宿舍，并常到医院去看望那姐弟3人。后来，那位弟弟因医治无效而病故了。王梓坤先生不仅帮助死者的姐姐料理好后事，而且还特地将那两位姐姐用过的被子抱走，请人拆洗干净。

王梓坤先生就是这样，不以善小而不为，他热情地帮助别人，即使最不起眼的小事，他也去做，为别人考虑得无微不至，王先生的高足弟子施仁杰因远在西安工作，他爱人谢吟秋在南开大学工作，因工作较忙，有时要她老母亲去食堂买馒头，一次王梓坤在食堂买饭，看见谢的妈妈正迈着蹒跚的步履来买馒头，王梓坤即要老人家回去，免得有排队等待之苦，他去买好，再为之送回家。施谢二人得知此事，心里的感动，无法形容。

王梓坤不仅热情地谦虚地待人，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而且对一些细小的问题也考虑得很周到。他的女研究生鲍玉芳有一次因多问了一些问题，回家时，天已黑了，途中要经过一个花园，地方比较冷僻，王梓坤提出要送她走过那花园，鲍小姐面对这位慈祥的年老的导师，生怕麻烦他，就绝不要送，但王先生却怕她发生意外事故，坚持送她走过那冷僻的地段才放心。

王梓坤的母校，吉安市白鹭洲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它所在地白鹭洲在吉安市的赣江之中，风景十分优美，这里原来南宋名臣江万里开办的白鹭洲书院，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年青时曾做为江万里的学生，在此书院就读，对于这一古迹本应予好好保护，但当时吉安地方某些领导人打算将白鹭洲中学迁走，而将此风景区卖给香港富商邓氏兄弟以开发为旅游区。白鹭洲中学的校友，对此种做法很不同意，曾多方提出反对意见，毫无效果，于是他们联名写信给王梓坤。希望王梓坤写信给当时的地委主要负责人。王梓坤是怀旧的，最爱自己的母校——

白鹭洲中学的。他当即写信给吉安地市有关领导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同时也将群众的意见转给他们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王梓坤对那些群众来信都将信中的姓名和信封上的来信地址剪掉而为之保密。王梓坤先生为这些"小民"考虑得多周到。吉安地市领导一贯对王梓坤先生十分敬重，对他的意见十分尊重，他们很快地答复了王梓坤先生，白鹭洲中学不再迁走。虽然如此看来王梓坤先生剪掉姓名和地址的做法似乎过虑了。但现实社会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群众向上级机关（甚至中央机关），反映本单位或下级机关的问题，上级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往往为了省事，就将群众来信原封不动地退还那群众的单位处理，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了所在单位领导对反映问题的群众有不好的看法，甚至进行报复。按理说上级机关应当为群众来信保护的，结果反到帮了倒忙。这样的事，王梓坤先生当然多有所闻，所以他的做法可说是"仁者爱人"，实在是可嘉啊！这样的事，也只有王梓坤这样谦虚热情的人才能做到啊！

王梓坤对别人进行帮助，往往达到不顾自己的地步。他年轻还在读书时，有一次回家探望母亲，得知近邻有一对叔伯辈的老夫妇，眼睛瞎了，生活十分拮据，他就将自己身上仅有的留做返程路费的10元钱给了那两个老人，自己以后再向朋友借路费。他母亲对此有意见，王梓坤说："他们比我们更困难，他们二位太可怜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这样，王梓坤的母亲也为儿子的做法感动了。这种精神真是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3. 永不忘恩

王梓坤还有个特点，就是别人对他有恩，他永不忘。王梓坤小时家贫，交不起学费，曾得到欧阳伯康和王承厚的资助，他一直怀着报恩之心。他永远记得一句名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到他参加工作以后就付诸行动，他曾先后多次寄钱给欧阳伯康，当时解放了，欧阳伯康没有在长沙经商了。回到吉安，家里成分又不好，王梓坤通过别人将钱转交给他，欧阳伯康接到王梓坤的钱，感激不尽。王梓坤的哥哥王梓青曾对王梓坤说："欧阳伯康的事就算了吧，反正我们借了他的钱后来都还清了，不欠他的了。"王梓坤说："钱是还清了，但人家对我们的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报答不尽的。"

欧阳伯康的女儿欧阳德英嫁给一个农民，儿女多，家里想修房子，当时批不到木料。有人告诉了王梓坤，王梓坤于是想办法找到了吉安县林业部门的同志为欧阳德英批了五立方米的木材修房子。王梓坤不仅对欧阳伯康报恩，而且报答到欧阳伯康的后代身上去了。

王承厚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当时情况下，王梓坤不便与王承厚多接触，以免有同情右派之嫌，也是通过别人将钱转交给王承厚的。王承厚死后，王梓坤每年在过春节前总要寄一笔钱给王承厚的妻子，并对王承厚的子女也多有照顾。

欧阳伯康是地主，王承厚是右派，给这样的人寄钱，在当时是有阶级立场问题的，当时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为了和父母"划清界线"，而不敢与父母联系，在经济上也不管。王梓

坤可不管这些。虽然党的政策并不是要人们不和地主、右派等接触，也不是说其子女友人不可与之有经济联系，而主要是指在政治上划清界线。王梓坤明知这样做会招来非议，甚至要冒风险，但他并不理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梓坤的从不忘别人对他的恩惠的美好品格，为了报恩他全不顾及自己。这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王梓坤的兄嫂对王梓坤读书，十分支持，王梓坤父亲死后，即是兄嫂完全担负家庭的重担，王梓坤就是兄嫂培养起来的，他们兄弟嫂叔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王梓坤永远牢记着兄嫂对他的深恩。

王梓坤自 1952 年 8 月参加工作，开始每月按时给家里寄钱，以补助兄嫂的生活费用。当时每月寄 15——20 元，月月不间断，一般在发工资后一两天就寄，后来又随着工资的增加而逐步加多。在苏联学习时间，王梓坤托南开大学数学系，每月按时寄钱回去。至今已 48 年了，如果将那些汇款单收据叠起来，已有近半人厚了。

无论何时，王梓坤都惦记着兄嫂，当他还在南开大学工作时，因工作需要买一只国产手表，回到家里后，他就收在袋子里，从不拿出来戴在手上。他嫂子发现了，问他为什么不戴在手上，他说："哥哥还没有手表，我不戴。"1953 年，他与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曾鼎钚先生合译了一本外国数学书，出版以后，得到 300 元稿费，王梓坤一点也没有用，全部寄给哥哥，给家里买了一头牛。

在寄钱给兄嫂时，他也想得十分周到，他常常分开寄，免得两位老人发生矛盾，他兄去世后，就将钱寄给侄女，交给他嫂子，并在信中再三嘱咐侄女，一定要如数交给老人，由老人家自行安排，绝不可私扣。王梓坤对如此细小的问题都考虑得很周

到，更见报恩之情是何等深切。

王梓坤经常对人说起，资助他读书的王寄萍和吕润林同学。他曾多次到王寄萍家看望，并送以礼物。又曾接吕润林到北京游玩，在他家留住20天之久。以后还常用电话和书信联系，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4. 俭朴廉洁

王梓坤生活十分节俭朴素，他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和节俭朴素的习惯，到成名后一直保持不变。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在北村2栋106那间简陋不堪9平方米的房子里一直住了10多年，虽然后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住到对面稍大的一间房子，但这间房子也只是向南开窗户而已，其余条件仍是与106室一个样，王梓坤又在这里从1966年住到1977年，1977年11月王梓坤升为教授，学校房管科要他搬到一个面积较大的单间去住，王梓坤却不愿意搬，说在这里住得很习惯，但校方怕社会舆论批评，硬是要王梓坤搬到二层楼上面积较大的一个单间去。后来南开大学又建了一座教授楼，要王梓坤搬进去，王梓坤又不肯搬，让别人先搬进去吧。学校房管部门说所有的正教授都可以搬进去住的，王梓坤说，那就让他们先挑选，最差的一套留下给我住吧。最后王梓坤确实住了一套最差的——北向最高层的。

1984年，王梓坤到北京师大当校长，按当时该校的做法，校级领导干部可以住四室两厅的房子，可是王梓坤先生不要，仍住谭得伶先生原来分得的一般化三室一厅的比较陈旧的教授住房。

1992年，王梓坤到汕头大学应聘为博士导师，按学校规定，他作为科学院士、名教授，应住四室一厅的房子，但王梓坤只住两室一厅的普通的宿舍，校方对他说，李嘉诚董事长要求看望，若住房不达标准，校方会被李嘉诚批评的。这样，王梓坤才住进为他安排的房子里去。

王梓坤先生在住房上所表现的朴素精神很值得人们学习，本来条件许可，当领导干部的住好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当今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廉价买住房让国家吃亏，搞了一套又一套。有些人还用公家的钱装饰自己的房子，政府机关个别领导干部在本单位为自己廉价购了一套房子，又功立名目，到下属机关、学校去为儿孙买廉价的房子。这种现象与王梓坤真不可相比了。

王梓坤先生自己家里的电视机已老化了，亲友们劝他重新买台好的，他总是不肯，他的洗衣机也相当老化了，也不愿换新，后来谭先生因为被撞伤了腿，王先生的侄女来照顾，见洗衣机实在不好用，才自己做主趁王先生不在家时，买了一台新的回来。

1995年春节，王梓坤先生做为科学院士，应邀出席国务院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各界人士茶话会。当时去的人都是国内外知名人士，大家都是乘小汽车去的，而且多是名牌货，一辆比一辆更好。王梓坤也就可以叫北京师大派小汽车送他去，无论怎么也不过分，但是王梓坤不叫学校派车，而是自己乘公共汽车去。当他走进友谊宾馆，服务员问他的小汽车停在何处，以便看管好，王梓坤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家离这儿很近，散步来的。"其实友谊宾馆离北京师大有20多里远的路程。

1995年某日，王梓坤从汕头乘飞机回北京师大。在京郊下了飞机，即被出租轿车司机叫上去，往北京市内走，走到市内，王梓坤先生即下车，司机感到很奇怪。原来王先生觉得到了市

内，则可以坐公共汽车，为公家节省点钱。其实也只是几十块钱的事，但王先生这样一心为公、节俭朴素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在今这种物欲至器、追求享受的世风下，人们除了笑王先生是个“傻瓜”以外，否则难以理解。

王梓坤先生对自己的生活是如此节俭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小气”，但帮助别人却十分慷慨大方。他家乡的人谁有困难，则有求必应，他村里那所小学，经常得到他的资助，他送了1000多册图书，设立3000元奖学金，在每年教师节时寄2000元给该校教师过节，一般教师每人100元，评上优秀教师者每人200元，还每每在信中特别写明，做炊事员（临时工）的欧阳大嫂也有份。去年，他又捐了一笔巨款给该校修教工宿舍之用。

王先生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家里请了保姆，洗衣服本是不需要自己家里人动手的，但他一定要孩子们自己洗，不许孩子们养成依赖的习惯，从小就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更不许孩子们有半点骄傲情绪，所以，他的两个儿子——维民和维真，都很成材。维民在师大附中读书成绩一直很优秀，并当班长，文革中下放到陕北农村中劳动，因表现好，被推荐参军。1979年恢复高考，军队里推荐一些人去报考，维民被推荐了，他所在的师只有3个名额。其他2人没有考上，王维民却考上了陕西师大物理系，1985年又考上了硕士研究生，1991年通过托福考试到美国洛杉机留学。老二王维真也是学习成绩优异，品德良好，在美国跟邓肯学概率论。

5. 淡泊名利

王梓坤先生淡泊名利，他十分欣赏诸葛亮的名言：“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王梓坤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平生最不想做两件事：一是不想去经商，二是不想去当官。经商、当官，历来是争利求名的好途径。不用说在过去，就是当今，当官也是人们最好的职业，有权有利，又实行终身制，一当就是一辈子，连中下层小官也是终身制，即使全无政绩也照样当下去，毫无后顾之忧，犯了错误，不要紧，调动一下就行，甚至照样提升。况且权力不受监督，个人可以说了算。不仅自己占便宜，亲戚朋友也大占便宜，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在我国当官最受益。不少人对当官简直是昼夜以思、梦寐以求。不少青少年从小就立下“长大了要当官”之志了。

王梓坤不愿当官，可算是特别奇怪了。而且这不是他故作姿态，而是事实。80 年代初期，王梓坤在国内已名声大噪，那时国家正选拔知识分子当官。天津市委即选拔王梓坤去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是直辖市，副市长是省级干部，这个职务可说十分高了。这在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但王梓坤却不愿去，天津市委领导多次找他做思想工作，他都不愿意，最后，王梓坤还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组织部表示拒绝任职，他将这封信寄给天津市委书记说：“我应该服从分配，但也有申诉权，请在给中央的任免名单时，把我给中央组织部的信也同时报上去。”在这种情况，天津市委才放弃要王梓坤当副市长的打算。

当然，王梓坤若当官，则一定是个清廉能干的好官，这对国

家和人民都有好处。不少人对此很惋惜。但人各有志，王梓坤这样淡泊名利，则由此可见了。

王梓坤先生因为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了很突出的成果，而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极大关怀，曾 3 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又被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 9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又获得全国性的科学奖与科普读物奖，1984 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的荣誉不可谓不大矣，地位也不可谓不高矣。但是他对这些荣誉和地位都看得很淡。毫没特别的表示，好象没有得一样。他每次从市里开劳动模范大会回来，就马上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回到工作岗位，努力工作，和同事谈笑风生，并且见到同事们老远就亲切地招呼，令人们觉得王梓坤特别谦虚自然。他从北京开完党的九大会议回来后，也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和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处之泰然，而且与好友刘泽华谈到，不应该将林彪做接班人写进党章里去，可见他又何其有胆识。其实一个普通群众当上党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十分不容易的，简直是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之中挑一，据说当时天津市知识界只有两个名额。莫说当上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当个市县党代表大会的群众代表也是很不容易的。社会也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一旦当上了什么代表就以为了不起了，走起路来也趾高气扬，摆与众不同的派头和架势来。

我们还往往见到不少这样的人，在他当普通群众时还比较谦虚热情，一旦当了个什么长字类的官职时，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而应高人等了，不用当了县级干部，即使是当了科长副科长、乡长副乡长，甚至是当了中小学校长这样的小官，也自以为了不起而官架子十足，讲话打官腔，有人找他办事待理不理的，甚至一边与你讲话，一边做他的事，十分怠慢，群众来信，不予答复。笔者曾见到这样一位县级干部，他常常在接见别人时，一边与之

握手，一边昂头望着别的地方，大有不屑一顾的样子。这样的态度，实在令人生厌。

王梓坤先生当了北京师大校长级别很高，但他仍是平头百姓一样，毫无一点架子，见人老远就热情打招呼，谈话热情自然，好像你的亲友一样。记得在1988年，王梓坤先生到老家吉安地区讲学，住在吉安宾馆，中午休息时，他从食堂吃完饭由人陪着回宿舍，笔者当时在宾馆开会，正好碰上王先生，笔者当时与他并无交情，只是在我校教学大楼听他做过学术报告而已，笔者一向有回避名人的习性。每次看到王先生也试图马上走开以回避，但想不到王先生却老远就向笔者打招呼："你是吉安师专中文系的李老师吧，来，到里面去聊聊。"笔者因此大受感动，而马上向王先生问好，并随之到他的住所聊天。在谈话中他既热情又直爽，就像老朋友一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据说你们学校教师愿意当干部，其实我们北京师大教师大都不愿意当干部，我这个校长也只一届就下来。"他老先生将北京师大校长这个职务也看得很轻，可见名利对他毫无价值，因之，笔者对他十分敬佩，笔者与王先生的交情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的。

王先生认为，人生一世，不过几十年时间，名利乃身外之物，应该淡化它。最切实的是搞学问和做实事。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王先生最喜欢读《庄子》，笔者问他为什么如此，他说，读《庄子》就是为了淡化名利。一个人不能不追求事业，不能无所作为，但又不能追求名利。读了《庄子》就会将世事超脱，所谓"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王先生这些见解实在高妙。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有学问的贤者，都将人的品格放在第一位，王梓坤先生也总是如此，他认为道德品格的修养比学问和事业更重要。所以王先生总是特别注意道德品格修养。他有一段自勉的格言做为座右铭说：

我尊重这样的人，他们心怀博大，待人宽厚；朝观舞剑，夕临秋水。观剑以励志奋进，读《庄》以淡化世纷，公而忘私，勤于职守，力求无负于前人，无罪于今人，无愧于后人。

这一段话，实际上是王梓坤先生为人的写照，他就是这样一位心怀博大、待人宽厚、不断励志、以求进取的人。

附录

王梓坤主要论著

1. Ван Цзы-кун. Кпацнфикадия всех процесв размножения и гибепи. Научнью покпады выcдыeи Шкопы. Физ.-Матем. Hayки. 4(1958). c.19-25.
2. Wang Tzu - Kwen, On dizributions of functionals of birth and deatk proces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theory of quecies. Scientia Sinica. 1961, 10(2), 160 - 170.
3. Wang Tzu - kwen, The Martin boundary and linit theorems for exceroire funotions, Scientia Sinica 1965, 14(8), 1118 - 1129.
4. 王梓坤．随机泛函分析引论,数学进展．1962,5(1):45 ~ 71
5. 王梓坤．生灭过程构造论,数学进展．1962,5(2):137 ~ 179
6. 王梓坤．马尔科夫进程的零一律,数学学报．1965,15(3),342 - 353
7. 王梓坤．常返马尔科夫过程的若干性质,数学学报．1966,16(2),166 - 178
8. 王梓坤,吴蓉等．地震迁移的统计预报,数学学报．1974,17(1),5 - 19
9. 王梓坤、吴蓉、钱尚伟．预测地震的一种数学方法．1975,18(2),118 - 126
10. 王梓坤．二参数 Omstein - Uhlenbeck 过程,数学物理学报．1983,3(4),395 - 406
11. 王梓坤．生灭过程停留时间与首达时间的分布,中国科学．1980,(2),109 - 117

12. 王梓坤．布朗运动的末遇分布与极大游程,中国科学．1980,(10),933－940

13. 王梓坤．对称稳定过程与布朗运动的随机波,中国科学．1982,(9),801－806

14. 王梓坤.二参数 Ombtein－Uhlenbeck 过程的转移概率及预测,科学通报．1986,31(23),1761－1764

15. 王梓坤．暂留马尔科夫过程向无穷大的徘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3),21－24

16. 王梓坤．超过程的幂级数展开,数学物理学报．1990,10(4),361－364

17. 王梓坤．论随机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27(1),119－127

18. 王梓坤．超过程的若干新进展,数学进展．1991,20(3),311－325

19. 王梓坤．二参数正态过程的马尔科夫性,科学通报．1992,37(15),1345－1347

20. 王梓坤．多参数无穷维 OU 过程与布朗运动,数学物理学报．1993,13(4),455－459

21. 王梓坤．布朗运动的首中与末离的联合分布,科学通报．1994,39(13),1168－1173

22. Wang Zikun, Multi－parameter OHzsteun－Uhlenbeck Process, In, Dorichlet forms and stochastic Procerses Walter de, Gragter ,Berlin ,1995,375－382.

23. Wang ZiKun, Some joint distrilbutions for Morkoz Proces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 1996,41(16).

24. Wang ZiKun, Yang Xiang Qun（王梓坤,杨向群）Birth and Desth Proceses and Markov chians, springer－Verlag Science press, 1992.

25. 王梓坤:《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科学出版社,1976(1979 再版)

26. 王梓坤:《随机过程论》,科学出版社,1965(1978 年再版)
27. 王梓坤:《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科学出版社(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著,第 5 号),1979
28. 王梓坤:《布朗运动与位势》,科学出版社,1983
29. 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82 再版)《科学发现纵横谈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0. 王梓坤:《科海泛舟》,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王梓坤年谱

1929年4月30日　生于湖南省零陵市。

1936年　随父母从衡阳迁回家乡江西省吉安县枫墅村；读一年私塾，然后在枫墅村上小学。

1940年　初小毕业，在吉安固江镇县立第三中心小学念高小一年级。

1942年　高小毕业，考入江西省吉安中学，念初中。地址在江西吉安市白鹭洲。

1945年　考入国立第十三中学，念高中。校址在吉安县青原山。

1948—1952年　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

1952年　大学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任助教。

1955年　去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攻读概率论专业。

1958年　获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7月回国，仍回南开大学任教。

1961年　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首次招收研究生。

1977年　提升为正教授。

1978年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状"。

1980年　当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

1981年　作为访问教授去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访问四个月；5月去新加坡参加国际数学会议；获"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1982年　获"全国自然科学奖"；第三次评为天津市劳动模

范。

1984 年 5 月至 1989 年 5 月　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84 年　访问加拿大里贾纳（Regina）大学、马尼托巴（Manitoba）大学和温尼辟（Winnipeg）大学访问。建议全国在 9 月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建议九月的一天为全国教师节，并提出“尊师重教”，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85 年　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

1986 年　去澳大利亚接受麦克里（Macquare）大学授予的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1990 年　被评为“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

1991 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3 年　除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外，同时应聘为汕头大学教授，数学研究所所长。

1996 年　参加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上海大学、南昌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九校进入“211 工程”预审，并任后五校的专家组组长。

1997 年　发表论文《马尔科夫过程的若干联合分布》（科学通讯英文版），《随机过程论》（上　下卷）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98 年　完成数学论文《多参数无穷维》（RS/DU 过程），8 月在昆明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科数学教育研讨会上作了《论随机性》和《对文科数学的几点建议》的报告。

参考文献

1. 袁向东，范先信，郑玉颖．王梓坤访问记，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0，4
2. 唐旬．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谈该校的发展目标．1986，7，11光明日报
3. 高新．含辛茹苦为祖国——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数学家王梓坤．1984，10，2中国青年报
4. 任克．王梓坤和科学发现纵横谈，科学与生活．1981，3新华文摘
5. 于文娴．枫墅村飞出了金凤凰——记数学家王梓坤教授的故事，少年科学．1981，5
6. 马锡骏．十年愚勤，一枝奇葩——浅评科学发现纵横谈．1978，11，5天津日报
7. 刘文．王梓坤教授近况，数理化信息．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第2辑
8. 刘文．王梓坤世界数学家思想方法，解恩泽、徐杰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9. 刘判龙．风雨五十载．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
10. 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1. 王梓坤．马尔科夫链与今日数学．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ｗａｎｇｚｉｋｕｎ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２１１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９．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２／ｄｉｓｋｒｃｉ／ｒｃｉ６６／０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